

甘肃史志



2014.1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甘肃省志《文化志》《税务志》《气象志》《检察志》 和《广播电影电视志》5部志书通过终审



副省长张广智主持终审会

4月21日，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张广智主持终审会。会议终审通过了省志《文化志》《税务志》《气象志》《检察志》和《广播电影电视志》5部志书。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5部志书主审人对志书复审情况的汇报，从内容、体例等环节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

张广智希望各承编单位对志稿中的重要史料进行再考证，保证省志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风格的一致性、规范性，努力把每部志书打造成精品佳作。

唱一首五月的歌

九日

捧一掬五月的雨
洒向那一片片干涸的土地
那里有我日夜操劳的父老乡亲
那里有我正在耕种的兄弟姐妹
他们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他们把脊梁从春季弯到冬季
他们用汗水浇出五谷丰登
他们用乳汁养育华夏儿女

扯一缕五月的风
吹向那一座座火热的工地
那里有我四季忙碌的父老乡亲
那里有我正在流汗的兄弟姐妹
他们把高楼从城北盖到城南
他们把大桥从河东架到河西
他们用血肉筑就都市繁华
他们用双手托起乡村腾飞

采一束五月的花
献给那一樽樽灿烂的奖杯
那里有老师们走过的平凡足迹
那里有科学家做出的伟大创举
他们把飞船从地面升到太空
他们把舰艇从水面潜入海底
他们用智慧推进人类文明
他们用生命写出祖国万岁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4 年第 1 期
(总第 17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唱一首五月的歌 九 日(1)

特载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4)

志鉴编研

略论第二轮修志中政治部类的编修 张世民(5)

对历史负责 使领导满意 让读者喜爱
努力编纂出权威性特色型的精品年鉴 朱克雄(7)

理论研究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学习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
..... 陆奇(12)

经验交流

甘肃体育史的绚丽画卷
——《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评介 ... 荷重(16)

史海钩沉

伏羲与华夏文明 张 元 张克锁(19)

西安事变在兰州 史 言(21)

乡土民情

徽县习俗拾趣 李 星(25)

兰州民间节日习俗 (31)

陇南马社火四题 彭战荻(35)

录

陇原人物

吉鸿昌就义见证人林少文的身前身后事 ……张 慧(40)

史地考证

试论文县白马人与古代仇池氏人的历史渊源

……………魏泽民(44)

汉代临泾县城考 ……………段安邦(48)

再论西汉阳周在正宁 ……………路 笛(52)

西汉天水郡平襄县碧玉关沿革再考 ……………郭汉彪(56)

西周太原的地理位置 ……………薛方昱(61)

历史回眸

甘肃的古代工业 ……………安文迟(65)

1958 年镇原县“许、张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镇原县地方志办公室(68)

志苑随笔

甘肃之旅(十首) ……………世氏(73)

陋室读书笔记 ……………潘硕珍(74)

史志动态

酒泉华夏文明概论出版发行 ……………(77)

金塔县地方史志工作稳步推进 ……………(78)

瓜州县启动地情信息网建设工作 ……………(79)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成立 ……………(80)

《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出版发行 ……………(11)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期责编:王 旭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子邮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李克强作重要批示 刘延东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于4月1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她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刘延东指出,地方志工作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有着悠久璀璨

的历史,有着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传承文明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光荣使命。

刘延东强调,要把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切实抓好。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发挥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提高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志。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略论第二轮修志中政治部类的编修

张世民

一、政治部类在地方志中的关键位置和重要作用

政治部类是志书的思想——政治灵魂,也是牵扯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中枢神经的内容。因此,政治部类处于地方志的核心位置,具有很强社会意识形态性质,这也关系到志书政治质量是否合格的问题。人们常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由社会——经济基础来决定,但是政治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历史上,历代地方志工作者无不注重政治问题,对于历代政权的业绩表述,总是相当用心的。譬如明代陕西康海《武功县志》最富特色的内容,恰恰在于对历代职官的褒贬评价。

近代以来,政党政治走上历史舞台,对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要重点记述。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地方志就不能不突出其政治领导,不能不突出其道路选择,更不能不突出国体、政体。当代地方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宏观上有所把握。

按照《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志要反映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其中政治部类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群众组织、公安司法、军事等。在这里,政治活动、兵役战事等重大事件,党政军群人物等重要人物,也都是政治蕴涵较深的内容。其特点在于涉及面广,记述难度大,在把握上要求力求严谨、严肃和严格。尽管人物将在《人物志》出现,事件将在《大事记》或《要事记略》处理,但是在实际采编时,都不能不预先注意,以供总纂剪裁。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规定志书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赌博、暴力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同时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法律、法规及政策未作规定的,要经由有关部门审查把关,正确把握记述尺度。这些都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

第二轮地方志中有续修、新修也有重修,在记载上也存在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尽管志书最可读的未必是政治部类,但其编写仍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人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历来政治社会人物对身后评价都非常在意,这也集中体现在政治部类的具体表述中。

二、地方志政治部类的记述层次和重点内容

所谓政治,就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根据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架构,政治部类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主,大体涉及三个层次:涉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构成了第一层次;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等构成了第二层次;其他公共社会管理和服务机构,如群众团体、社会团体构成了第三层次。至于军事机关,可以纳入政治部类,也可作为独立部类。

按照上述顺序进行规范表达,符合现代国家政治活动的基本逻辑,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1. 涉及政党(特别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组织,属第一层次

近代中国的党派,一般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等。我们必须重点写好中国共产党,

写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及自身建设状况。这既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也包括各项制度建设。尽管我们说党的政治领导在整个志书中都有所体现,但政治部类中的集中记述无疑是最关键的。

中共地方组织包括下列项目:组织沿革、历次代表大会、领导机构、领导人更迭;领导活动,领导决策;党的建设,诸如党员队伍、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党的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决策部门等,都可以在这里加以介绍;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合并,但要有参见说明。

在历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强化的过程。其中组织机构、党员状况、干部管理属于组织建设,包括党校教育在内的宣传教育属于思想建设,纪律检查属于作风建设。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合署办公之后,其功能、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中。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还要对国家政权、社会事务、经济生活、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政治领导,因而要格外重视政治决策,关键是写好中心工作,写深写透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重大会议则要写出决策结果和落实状况。至于编制、档案管理,则可归属行政或文化部类。

政协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统战方式,可以列在这个环节处理。由于政协组织是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的主要场所,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平台,所以可考虑将其列入《党派群团编》。政协不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来记载。内容包括机构设置,历届政协全会、常委会,委员遴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文史资料等政治活动,也要记载。政协涉及的重大政治事件,也要用纪事本末体集中展现。

民主党派依序排列,要着重写组织建设、历次代表大会、政治活动如参政议政、自身建设等。个别重大事项或主要建议案,也要加以介绍。民主党派的党员队伍,可以纳入组织建设之中。

至于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和三青团地方组织,作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执政党及其外围组织,也涉及组织建设、历次代表会议、政治活动等。在重修志书中也将涉及这个命题。

2.涉及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等内容,构成了第二层次

国家权力机关,主要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首先记载本区域的人口分布状况,以及根据国家有关选举法的规定,可以参加投票选举的人民数量及界别分布。按照宪法规定,地方人大具有多项职权。内容包括代表选举、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常务委员会)会议等。对于代表视察、办事机构等,以及有较大作用的建议案,也要介绍一下。此外,基于《共同纲领》而确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也要重修志书中加以关注。

至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其记载模式相近,但分目差异较大。地方行政机关,重点是人民政府。包括历届人民政府及直属机构、基层机构、事业机构;行政事业编制,包括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施政要略,可以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

至于政府部门,不管是涉外事务管理机构、公共安全管理机构、社会事务管理机构、政府事务管理机构、行政监督检查机构(监督、监理、稽查、检查、查处等),乃至国防事务管理机构(安全、军事、人民防空),都可以单独列出。要记述好各级地方政府,既要明确机构设置、政府届次及其职官更替,更要记述好施政业绩,可以选取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事件列为《要事纪略编》,将党委决策、政府主持、社会监督的重大举措,用纪事本末体裁加以集中记载。对于地方性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发展结果,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概括,给予读者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至于安全、公安和司法行政,均属于政府政务活动的一部分,最好不必与检察院、法院并列。基于党政分开、政法分开的原则,也不要用法政概念合并归类。

3.公共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构成了第三层次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属于这个层次。群众团体又称人民团体,属于政治团体,不必向政府民政部门注册。大致包括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工商业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等。对于农民阶层的社会组织,过去有过农民协会和贫下中农协会,在重修志书中也要予以记载。其排序在工会组织之

要能用。起点、结果和现状,时间、内容不能少。提法变化和节点,记载一定要详细。掌握长编关键点,节省时间省气力。要写好初稿,不仅要整理历史档案,搜集报刊资料,还要跳出原始文献,考察行业志、事业志和部门志的差异。比如总工会,必然涉及产业工人状况,其中也包括农民工维权。工人状况属地理视角,而农民工维权属历史视角,两者要结合起来。至于青年团、妇联及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均应按照这个双视角相结合的办法来加以处理。首先要记载青年、妇女等在整个人口中的地位和比重,妇联史料也要拓展视野,注意妇女状况及写在大地上的妇女活动。

5.关于行业史料和综合史料的问题

志书政治部类的史料,不独涉及本部门、本行业,还涉及综合性的史料。比如政治人物史料,除了要撰写行业条目外,还要注意具体的人物事迹。重大事件也可为之增加新的内容。除文献史料外,还有图片资料。图片包括地图和照片。为了做好资料工作,必须重视行业衔接和业务协调。业务协调,包括市委、市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也包括承编部门内部的业务协调。做好业务协调是地方志编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志工作的综合性和复杂性。

6.关于保密安全和资料处理的问题

对于国家安全部门、反邪教组织办公室等是否要记载?如何记载?适当记载很有必要,但要讲究方式、方法。一是直接记载法。可采用公安机关取缔角度来记载;另一种是间接记载法。可以在民族宗教中,通过尊重信仰自由来加以记载。在中心工作中,列举反邪教组织活动,从政治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凡是公开的内容可以记载,未公开的内容,不必记载。保密工作,涉及直接泄密和间接泄密,也涉及有意泄密和无意泄密。所有资料长编,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除军事机关外,党政机关的保密也应引起重视。

四、志书政治部类所涉及的几种社会意识

1.就区划意识而言,要注意将撰写篇目或条目所涉及的地理区划和地理背景加以介绍。自然地理部分,需要有自然地理区划,具体门类如地质、土壤、气候等,也有相应的区划内容。又如行政上要有行政区划,农业上要有农业区划,城市功能上有城市功能区

划,在党政群众团体所涉及的人员分布,同样存在着基本政情与区域分布双重反映的问题。

2.就资源意识而言,要注意从资源总量与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认识问题,避免从部门或行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地方志要记载自然地理,更要记载自然资源。这个方面的认识,要体现在志书的各个门类。譬如产业工人、农民(农民工)、青年、妇女等人口数量等,都是介绍群众团体时首先要注意的。同时也要注意人文资源,包括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记忆遗产。

3.就文体意识而言,也有一个最基本的著述要求。志书条目与历史著作有同、有不同。两者均需要以资料为依据,按时间来书写,但区别点在于分类居先,按时间顺序撰写居后。横排竖写,是志书的一个特殊要求。志书条目与年鉴条目有同、有不同。两者同在条目的诉求,均讲求条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但其区别在于跨年度性和溯源性。地方志条目不是工作性条目,而是记事性条目。志书条目与辞典条目也有同、有不同。两者都力求内容简练,条理清楚,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志书条目要求因事设目,不必为词条定义,也不必进行定义说明或阐释,更不必全用名词或名词词组立目。

4.就特色意识而言,包括地方、专业、民族和历史等方面。所谓特色,也就是一个区域与别的区域的比较优势或劣势。诸如在民族特色方面,既要介绍少数民族,也不可忽视汉民族的记载。涉及汉民族的区域迁移,也值得注意。至于历史特色,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也有内涵赋予。

5.就称谓意识而言,涉及国家机构名称、领导人职务、历史地名、企业名称等,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具体处理。不要以后来的变化,来表达历史性的内容。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不因后来职务变化而随意改写。历史上的地名如某某人民公社,可以夹注今天的地名,但不能任意使用。涉及境外的国家、地区、人物、党派、机构、报刊等译名,均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没有新华社的译名,第一次出现时要括注外文原名,并在上下文保持中文译名的一致。

(作者单位:陕西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对历史负责 使领导满意 让读者喜爱

努力编纂出权威性特色型的精品年鉴

朱克雄

怎样才能编纂出权威性、精品化、特色型年鉴,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使领导满意、让读者喜爱?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这是因为仅仅要达到其中的某一方面要求,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如果要达到三个方面的协调统一,就是难上加难的事了。但不管怎样难,既然我们从事着年鉴编纂这一工作,就必须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

首先,对历史负责是年鉴编纂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就要求年鉴编纂者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编纂态度,准确把握年鉴的要素与选材,确保所选取的资料和数据的真实可靠、全面系统,努力做到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当代和后代负责。一是必须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在“广、深、高”上下功夫。所谓“广”,就是要从平时做起,广泛积累各类原始资料,如年初的计划、部署,年内的汇报、简报、小结、调查、评比、会议、统计、新闻报道资料,年末的总结、报表等,都要及时收集、整理。只有这样,写起来才能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所谓“深”,就是要对大量原始资料做艰苦细致的鉴别筛选、分析比较、综合归纳、加工提炼工作,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质,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只有这样,写出来的年鉴才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所谓“高”,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地区、部门(单位)决策人或负责人的高度,对所写地区、行业(事业)或学科的历史与现状、优势与劣

势、困难与潜力、问题与对策,作鸟瞰式的审视与思考。只有这样,写出来的年鉴才能高屋建瓴,给人启迪。二是必须强化对内容要素的把握,在“全面、稳定”上下工夫。所谓“全面”,就是既要反映综合情况,又要反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症结所在,为了解、分析、解决问题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另外,还要尽量体现发展趋势,对地区、部门(单位)、行业(事业)未来的发展进行科学预测,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所谓“稳定”,就是内容要素要相对稳定,所选的指标要尽量保持连续。从横向比较,既要反映本地区、本部门(单位)、本行业(事业)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指标,又要体现各自的具体情况和主要特色。三是必须提升对编纂人员的要求,在“严谨、负责”上下工夫。所谓“严谨”,就是真正让年鉴客观反映某地区、某部门(单位)、某行业(事业)全面情况,尽量体现该地区、该部门(单位)、该行业(事业)总体布局和发展趋势,努力为研究地情、行情和领导决策服好务。所谓“负责”,就是要为当代和后代负责。由于年鉴是连续出版的,所以刊载的资料和数据要与以前出版的年鉴进行对比。再加之年鉴信息密度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数据体现的,数据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年鉴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对有些确实无法对应和吻合的数据,就要说明具体原因,诸如统计指标的更新,行政区划和统计口径的调整,年报和快报数据的差异等。

其次,使领导满意是年鉴编纂者应该做到的

起码要求

这就要求年鉴编纂者要在注意准确领会领导意图的前提下,注重年鉴编纂的框架设计、内容把握、体例规范等重要方面,在独特性、广博性、得体性上做文章,努力编纂出质量上乘的年鉴,以此来赢得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一是注意框架设计,做到独特鲜明。专业年鉴有专业特色,综合年鉴有综合特点。无论是那种年鉴,只有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出发,才能抓住地方强项和独到之处,真正设计出颇具特色的框架。二是注意内容把握,做到广博丰满。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内容资料的博大精深是年鉴的优势所在。无论是那种年鉴,只有通过开辟新的栏目、扩大附属资料选题选材的时空范围,有计划、大幅度地增加文献资料的品种和数量,才能使年鉴内容显得更加充实和丰满。三是注意体例规范,做到得体和谐。年鉴是按一定的规矩编纂而成的,这些规矩的总和就是年鉴的体例。体例不但决定年鉴的表现形式,而且直接影响年鉴的内容质量。无论是那种年鉴,只有通过改进体例,完善体例,从严掌握文稿编写的体例规范,精心梳理和编排,不断拓展检索渠道,才能使年鉴的表现形式更加得体、和谐,可读性明显增强。

再次,让读者喜爱是年鉴编纂者不懈追求的最高标准

这就要求年鉴编纂者所编纂出的年鉴不但要为官方服好务,而且要为公众服好务,真正反映民生所需。基于这种思想,在设计整体框架时,每年应根据信息变化,充实和调整部分篇目。在遵循年鉴编纂体例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开设特色栏目,淘汰过时栏目,尽可能为读者所想,为读者所用,增加贴近读者、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信息,突出年鉴的实用性和时代特色,真正使年鉴赢得读者的喜爱,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一是主动走近读者,准确把握读者心理。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全方位、多侧面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应听取各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是年鉴的主要读者;也可以通过发送征求意见表的方式,检测年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解读

者对篇目安排、版面设计、出版发行等各方面的想法和要求。编辑部应努力成为广大读者的思想库,主动了解读者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特别应了解他们对年鉴的要求。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例,其读者主体是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包括本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和本级机关干部,下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和同级机关干部,基层乡镇(街道、社区)和村社(居委会)及企事业单位干部,他们是地方年鉴的主要读者。其次是部分社区居民和外来投资者,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教师、青少年学生等。前者是年鉴内容的记述主体,也是年鉴的忠实读者,他们渴望自己的工作在年鉴中有所体现,自己的形象在年鉴中得到充分展示。后者这部分读者使用年鉴,是为了了解一个地方的全貌而参政议政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学术研究、教学投资的需要。前后两部分读者心态和需求是不一样的。编纂人员只有了解了这些不同读者的需要,并且与他们保持经常的思想沟通,交换意见,编辑思想和辑录内容才能贴近现实生活的需要。二是主动满足读者需求,积极转变编纂理念。根据领导干部求胜的心理,年鉴编辑应该以张扬成绩为主,突出年度工作实绩,注意点与面的结合。努力克服年鉴资料收集不全面,记述深度不够,缺项多,信息资料支离破碎,甚至专设存在问题的现象。根据领导干部求名的心理,应该突出领导干部的事迹,努力办好“荣誉榜”、“人物”、“形象特载”等栏目。现在一些年鉴人物栏目比较单一,设立的标准太高,编纂者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拦掉了许多读者,应该适当扩大其内涵和外延,除新闻人物外,还应加上领导班子人物,先进模范人物、高级技术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新任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形象特载应降低收费门槛,扩大宣传领域,加大宣传力度。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有的年鉴在部门资料之后设置领导班子名录和将宣传彩页置于本部门资料之后,使部门的资料与形象化宣传融为一体的做法。我们应根据读者求实用、图美观的心理,进一步加强服务性资料栏目,扩大单位和个人的形象展示,增加随文照片和宣传彩页的篇幅。在服务

后。对于群众团体的记载,首先要有一个总体概貌,如工人状况、农民状况、青年状况、妇女状况,以及工商业者状况,科技工作者状况、文化艺术工作者状况、社会科学工作者状况等等。这些政治——地理区划分析,也是转变角度,扩大视野的必要途径。然后涉及其政治——社会活动,诸如组织建设、历次代表大会、政治活动等。其他社会团体,诸如科协、文联、社科联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大多属于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团体。至于宗教组织,涉及人民信仰、不信仰自由问题,均可放在社会部类来处理。

4.军事机关,可以列入政治部类,也可以单列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但又有独立的发展规律。所谓军事,就是指一切同军队或战争有关的事情。诸如国防建设、战争组织和准备、军队组织、编制和装备、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军事地理和军事工事等。军事志涵盖了兵事、兵役、军事设施、军队组织和军事装备、军队驻防、战事(包括具体战争和战役、战斗等)和军事地理等。还包括民兵、人民防空、军民共建、军地双拥等。其中需要着重介绍的,是军事地理、历代兵事、人民军队参加地方工作等。对于和平时期的军事工作来说,军地双拥、军民共建也是重要的方面。

军事活动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涉及武装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计划和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等;战役或战例,包括历史上的重要战争、战役及战例,以及交战双方的利弊得失等。此外,军事志还要严格遵循军语规范和保密意识。

三、志书政治部类编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问题

事件的记载离不开人物活动,而人物活动中又体现了社会活动,人物的重要性正在参与重大事件的产生于解决过程,所以政治部类中的人事关系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可以考虑设立《要事纪略编》,系统记载历次政治活动和中心工作。涉及政治事件的记载,可以是重大事件的独立叙述,也可以是连续事件的综合叙述,以及作为一个时期中心工作或重点业绩的概括叙述,所以不可片面理解。对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政治运动的记述,必须是在历史进程中出现,需要记载历来的事件发展和历史演变。首轮志书中缺少上述重大事件、中心工作的,重修志书中也要予以增补。同时,涉及党政军群主要领导人的介绍,不能限于姓名、性别和任职时间,还要记载其出生年月、文化程度、民族和党派身份等。党政军群主要领导人的介绍,可以在政治——军事部类记载,也可以在人物传录表中记载。凡是列传的领导人,均应介绍实际业绩,以及必要的身后点评,而入录的健在领导人,一律以履历介绍为主,不必点评。至于人物录的篇幅,一般少于传记,但如个人履历复杂,也可略长一些。

2.关于党委决策和政府施政的问题

党委决策、人大决议和政府施政,是地方中心工作的形成链环,也是政治卷重大纪事的核心所在。按照历届政府顺序撰写施政事实是一种模式,但不易操作。建议用纪事本末的体裁来处理,依照党委决策、人大决议所确定的若干施政方略,来撰写政府施政的重大纪事条目。重大纪事条目的撰写,需要适当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将政策出笼和施政实际相结合。要选择事关区域发展的若干重大事件,源源本本,首尾贯通地加以叙述,可以跨越届次。施政纪略条目的撰写,要注意重大叙事和部门工作的关联与分工,既要综合反映部门重大事实,又不要替代部门或行业的具体纪事。

3.关于中省政策和地方实践的问题

政治卷中不管哪个门类,都牵扯到贯彻落实中省政策的问题,志书不可用政策来代替实际,更不能覆盖一切。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问题,中央政策的变化,必然带来施政方略、工作思路的调整。均应注意典型事件或案例,注意现实意义和后续影响。在地方志的行文中,必须记录法律法规和基本政策的变化,但是不能唯政策之马首是瞻,照搬各个不同时期的政策观念。要注意政策的连贯性和可变性,注意政策演变所标志的理政方略的变化。政策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志稿的表述,影响到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评价。

4.关于资料长编和初稿撰写的问题

有人总结资料长编撰写口诀:长编为撰稿,关键

性栏目,可以在附录中增加“统计公报”、“文选选编”、“服务机构名录”等便民指南内容,便于读者的读鉴用鉴。在方便读者使用年鉴方面,还应该加强目录、资料、相关链接等辅助手段,增加图、照、表等有直观视角的版面,使年鉴图文照典并茂,做到“史册、手册、画册”的完美统一,真正把年鉴编纂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工具书、广大百姓收藏的案头卷。三是积极应用市场化方法,努力做好出版发行工作。出版容易发行难,是年鉴发行中普遍碰到的困难,究其原因,也是没有了解读者和依靠读者所造成的。年鉴的编纂出版一般都是由政府主

持的,离开了各级领导的支持,我们的年鉴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我们能依靠分管领导和撰稿员完成组稿,那么我们的出版发行为什么不能继续依靠这支力量呢?我们应该紧紧依靠分管领导和撰稿员,把他们看作是编纂人员的一部分,请他们来座谈听取意见建议,对他们进行感情投资和交给具体任务。我们都知道,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只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而不给他们权利和好处,很难把发行这种依托关系长久坚持,只有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才能真正达到利益双赢。

(作者系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 出版发行

2014年1月24日,由甘肃省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的《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隆重举行首发式,正式出版发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省体育志编委会顾问田鸿章,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副主任车安宁,出版发行处处长张正龙,甘肃省体育局局长、省体育志编委会主任杨卫,副局长、编委会副主任石生泰,原副局长、编委会副主任兼主编马赛敏,副局长刘新平,纪检组长钱万杰,副巡视员、编委会副主任张钧瑞及14个地(州)市体育局局长,运动校校长,西北师大体育学院副院长陈青,老体育工作者,机

关各处(室)、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共100多人参加了首发式。

《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编纂工作于2006年正式启动,历时六年,六易其稿,于2012年12月27日,通过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终审。全志共设7篇36章107节,约52万字,附照片243幅。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91—2007年间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记录了在贯彻国家《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开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中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提供了一部观点正确、体例严谨、资料翔实、装帧精良的省情巨著。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学习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

陆奇

四月的北京,春意盎然,万物茂盛,鲜花璀璨。4月19日至20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以来的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全国地方志工作,讨论修改并通过《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布置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和地方志书、年鉴评比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重要的批示,巨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召开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她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刘延东指出,地方志工作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传承文明与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大地

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光荣使命。

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批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进一步阐明地方志文化的中华特色。明确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国情书,对于各朝代的统治者来说修志是“官职”、“官责”。中华民族特质的地方志书编修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千百年来连绵不它系统地全面地记述了中国5000年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在历朝历代编纂了规模宏大、浩如烟海的各种志书:通志、府志、州志、县志、里镇志系列,现存以各种行政区域命名的旧志有8500余种、10万卷以上,约占现存古籍总数的1/10。另外,20世纪80年代编修新方志以来,全国共出版省、地、县三级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约400多部;同时,纳入地方志工作的地方综合年鉴、各类行业年鉴、部门年鉴、专业年鉴约5000多种。还有,各种地情书丰富丰厚不计其数。总之,地方志文化成果巨大,是中国乃至人类的一项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二、进一步阐明地方志文化的重要作用。明确史志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被称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具有独特的存史、育人、资政的社会作用。因为地方志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无论它是属于历史学范畴还是属于地理学范畴,它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社会科学功能。开发利用好地方志资源,为国家和各地的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文化强国都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志文化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和地方志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不断与日俱增,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三、进一步阐明地方志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明确“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充分肯定全国两方地方志专业人员、十万辅助人员的修志大军,包括一批专家学者的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埋头苦干,力创佳绩的精神。寄希望于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坚定信念,不辱使命,提高能力,勇于奉献,勇于担当,做好编纂、管理、应用工作,促进中国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繁荣。

高度的重视,历史的继承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的战争胜利、建设发展、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非常重视利用和发挥地方志取之不尽的重要作用,都将地方志作为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科学决策的法宝。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传统被很好地继承下来。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视地方志的重要作用

早在战争年代,每解放一个县城,毛泽东主席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看。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前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专门指示前线总部,要保护好以收藏明代方志和善本书而著称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个藏书楼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调阅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辑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与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系统地整理地方志,把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1959年4月,周恩来再次指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

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

1959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的修志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提出各县要修县志,并说地方志应成为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又提出,要修好一个地方志,先修简志,重点放在经济方面。

二、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重视发展地方志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地方志的编纂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就方志的编修工作不断作出指示,提出要求。

为支持年鉴事业的开展,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即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明确提出编修新方志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从国家到地方建立了各级地方志编纂组织领导机构,并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志工作,把中国的地方志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

1983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他还说:“我们不能让编纂方志的历史传统中断。为给后世保留这一精神财富,同时编纂好新方志,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责任。”“编纂新

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1996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在接见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新编地方志工作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态度。要注重调查研究,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要充分利用档案材料,也要注意搜集各种活材料。各地都有一些老同志,他们亲自经历了革命战争以及解放以来当地的历史变化,要通过采访把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下来。”

199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修志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市、县政府主要同志的职责,是两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要坚持‘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特别是职称)、条件到位。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三级定稿制度。”

李铁映要求:“修志必须反映时代的特点”,“现在,我们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又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场声振寰宇、光辉史册的伟大创举”,“编纂方志,应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

2005年8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同志在给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作序中指出:“方志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同时,现在又具备条件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科的大好时机。”

2006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发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并在全国颁布实施。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视编史修志的重要作用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法制建设、外交方略、改革开放、反腐倡廉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重大问题,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讲话广征博引、引经据典、格言警句、名言典故,讲话思想深邃、内容丰富,显示了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讲话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指导性、学术性、艺术性。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很多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立信史、存真史提供了遵循理论。党的历史是党的生命、党的旗帜、党的形象、是党的力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了如实撰写党的历史,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科学对待党的历史,重视学习党的历史,善于运用党的历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2014年2月25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考察工作,习近平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领导的重视,认真的落实

当前,全国地方志系统正在认真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刘延东同志讲话要求搞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学习要领会精神实质,要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要有体会有见解。贯彻要真正抓实干事,要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要有行动有实效。为此,笔者认为应着重在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认真学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会议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

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同志于2014年3月6日在北京调研工作讲话中提出的地方志下一阶段工作的八个方面要求,即第一是坚持好方向,第二是履行好服务,第三是总结好经验,第四是安排好规划,第五是完成好任务,第六是培养好人才,第七是搞好学科建设,第八是研究好理论。

三、省地县三级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应进一步提高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一纳入、五到位”的地方志工作机制,其中增加工作经费很重要。自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财政拨款的单位切实加强廉政,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三费”即会议费、接待费、出差费普遍减少30%以上,这是很好很必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志工作坚持科学发展观,其内容应该是既有重点又全面。即坚持“修用并举”的工作方针,逐步形成了“志为主体、史志鉴多元一体,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和以“以史书志书为主体,以综合年鉴为主导、以服务社会为支柱”的总体思路,拓展到“志、鉴、刊、报、网、库、馆、研、管、用”十个方面、“十业并举”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体现文化事业为主与文化产业为辅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中央一再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那么节省的经费应该适当地投入到文化建设中,其中地方志工作的摊子铺的大了,各项经费还是很不足的,并且还有很多地区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存在诸多困难。现在各地经济条件和领导重视程度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例如机构级别、经费、工作条件等差别很大。总之,地方志工作普遍未受重视,是“无权无钱单位”,要资料很困难,有能力的人不好调入,在职人员想着“人挪活”。总之,要切实提高修志的工作条件和职工待遇,增加凝聚力,特别对

贫困地区要加强倾斜。

四、各地区地方志工作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做法和成果,加强本单位政治思想建设、工作作风建设,编纂水平建设,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建设。因为目前,大多数史志办公室已经纳入政府公务员系列,所以工作人员基本没有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问题与动力,有些人一门心思奔着升职,这在某种程度影响了人们提高编撰能力与组织指导能力,沾染了机关守着“铁饭碗”,过安稳日子的习气。

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严三实”的要求,即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我们方志人应牢固树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的敬业精神,应强化质量第一、编纂名志佳鉴流芳久远,应编纂更多的地情书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应做好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为基层服务,应加强宣传报道的经常性时效性扩大史志鉴社会影响,应把方志馆建成多功能的社会图书馆、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为更多的大众服务。将“委身斗室十年苦,秉笔志坛千古传”的传统发扬光大。

浩卷宏文汇百家,纷呈异彩耀中华。当前,全国地方志系统随着学习贯彻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随着学习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正在掀起中国地方志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方志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方志人愈加立新功,展风采,奋力追求中国梦中的方志梦。让满天方志之星闪烁着智慧与知识的交辉,让神州方志之花绽放着艳丽与夺目的馨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作者系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

甘肃体育史的绚丽画卷

——《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评介

荷重

继甘肃省志《人事志》《林业志》《社会科学志》之后,由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甘肃省志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甘肃省志·体育志(1991—2007)》(以下简称《体育志》),又于2013年9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甘肃省志续志》中率先编就出版的又一新的成果,是展现新时期甘肃体育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幅绚丽画卷,可喜可贺!

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省志办主任李虎在《体育志》首发式上首肯该志“门类齐全,资料翔实,语言朴实,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印刷装帧精良,是一部精品佳作。”

体育是人民快乐和健康的载体,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志》记述的1991—2007年这一续修周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战略部署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甘肃体育事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方兴未艾、体育管理不断加强的辉煌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使全省各族人民群众的体质得以增强,民众爱国主义的情怀得以激发,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进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以翔实的资料、志体的笔法,全面、系统、客观、准确的记述甘肃体育事业的发展轨迹,无疑是《体育志》编修者的光荣使命。令人欣喜的是,在省志编委会和体育志编委会的领导下,该志编纂人员不辱使命,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将这部50余万字的专业志书奉献给了读者。

展开《体育志》的厚重册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图文并茂、内涵丰富的体育长卷。

一、壮丽翔实的历史缩影

——以全民健身为主体的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志》以8章17节的篇幅,详记了体现社会主义体育为民服务本质的群众体育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导和发展规划实施下,步入空前活跃、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的情景。“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体育意识和社会力量兴办体育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每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元旦、春节百万农民奔小康体育健身系列活动,百万青少年、百万职工、百万妇女、百万老年人健身系列活动和新春体育大拜年、全民健身带头人运动会以及“全民健身日”等各种类型的活动,已形成制度。《体育志》引用的数据表明: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已从1994年的771万人,发展到2007年的988.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也由2004年的32.12%上升到2007年的41.65%。在农村体育中,突出推进甘肃丝绸之路体育健身长廊“千乡(镇)农民健身工程”。1991—2007年,各地有组织的农村体育活动达1.27万次,参与者达580万人次。涌现出“全国武术之乡”2个、“全国田径之乡”2个、“全国拔河之乡”1个,有13个乡(镇)被命名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学校体育启动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阳光体育活动”,使学生每天锻炼不少于1小时。社区体育、职工体育、老年人体育遍地开花。晨晚练活动已成为市民体育生活的主要形式,数千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形成了城市体育“志愿者”大军,太极拳、锅庄舞、健身秧歌已成为城市居民参与的重要项目。职工体育与社区体育融合发展,相互推动。民间、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保护和传承,天水伏羲武术大会、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临潭万人拔河等形成了享誉省内外

的品牌赛事。甘肃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由改革开放前的不足 2000 人,发展到 2006 年的 20 万人以上,残疾人竞技体育项目由 6 个发展到 13 个,860 人次在参加国际大赛中,共获得奖牌 663 枚,其中 7 人 11 次破超 7 项世界纪录,18 人 26 次破 128 项全国纪录。

——以奥运争光为目标的竞技体育屡创佳绩。省体育主管部门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探索符合甘肃实际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模式和途径,形成了“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注重人才,科技领先,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基本思路,充分发挥甘肃运动员吃苦耐劳的品质优势,重点保障力量型、耐力型和投入小、见效快的项目,同时兼顾发展一般项目,推进潜优项目,培养新的发展增长点。在开展的 14 个大项 122 个小项中,就突出了自行车、中长跑、摔跤、曲棍球等优势项目。甘肃竞技体育以奥运带动全运、全运促进奥运,实现了奥运、全运两个目标的全面突破。1991—2007 年,甘肃运动员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共获得 411.5 枚金牌、391.5 枚银牌、428.5 枚铜牌,累计获得 19 个世界冠军、67 个亚洲冠军,有 23 人 25 次打破全国纪录、13 人 12 次破亚洲纪录、2 人 3 次超世界纪录。在 1988 年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上,甘肃两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并获得女子手球第六名,改写了甘肃无人参加奥运会、无人在奥运会上取得名次的历史。1996 年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上,甘肃的 3 名垒球选手又获得银牌,实现了甘肃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在七至十届全运会上,甘肃的金牌数保持在 2—4 枚,在全国 40 多个体育代表团中排位在二十二至二十四位之间。《体育志》用多幅彩色图片再现了为国争光的陇原体育健儿风采。

——以中国体育彩票为主体的体育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甘肃体育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体育志》以全民健身服务业的应运兴起、竞赛市场的日趋活跃、体育彩票形成支柱产业、民营体育产业比重逐渐加大的史实,记述了甘肃体育产业方兴未艾的发展情景。自 1995 年 3 月开始销售体育彩票以来,甘肃体彩共筹集公益金 5.396 亿

元,依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有力地支持了体育事业。1995—2001 年,共从省级提留公益金中支出 1430 万元,用于组织群体活动、修建全民健身工程和青少年俱乐部配套、弥补大型体育赛事等。随着体彩销售额的不断增大,2007 年全省筹集的公益金达到 1.61 亿元,除上缴国家财政和地县提留外,省级提留 5295.21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的 64.22 万元,主要用于了全民健身 1900 万元、弥补大型运动会 600 万元、整修和新建体育设施 2450 万元、体育扶贫 260 万元、后备人才培养 120 万元、运动员救助 18.26 万元。

二、存史资治的文化财富

存史资治是中国方志的传统功能。作为体育文化的成果,《体育志》在编纂中非常注重通过详录 1991—2007 年我省体育发展史实,帮助体育界及读者“认识体育、理解体育、发展体育和振兴甘肃体育”。如该志以大量表格汇录甘肃省运动员参加全国七至十届运动会、一至三届体育大会、二至六届城市运动会、十二至十五届亚洲运动会、二十五至二十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姓名、成绩、名次;在八至十一届全省运动会中破纪录、获运动技术等级及各项目团体和个人前三名的单位、姓名、成绩;在国内外田径、摔跤、柔道、垒球、武术、曲棍球、射击、铁人三项、现代五项、赛艇、皮划艇、自行车、无线电测向、跆拳道等单项冠军赛、锦标赛、大奖赛中取得前三名的成绩者;全省 9 所高校体育院系、11 所体校培养的体育人才;在国家开展的历次国民体质监测中甘肃成年人、幼儿体质监测及达标人数的统计;截至 2007 年底全省田径、自行车等运动项目的最高纪录等相关资料。特别是四次全省竞技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确定的指导思想及运动项目的调整、奋斗目标制定,以及促使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平衡发展的措施,“甘肃丝绸之路体育健身长廊”工程的构想及组织实施等等,都具有较强的存史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是一笔极为宝贵的体育文化财富。

三、精益求精的史志力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体育志》

的编纂人员在编修过程中,通过参加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上举办的修志培训班,学习领会续志的全局要求,掌握续编的技术要领;借鉴体育辞典、文献汇编,熟识体育科学的外延内涵,深入体育院系和直属单位收集资料,向内行请教;试写初稿,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等方法,较快地拿出了送审稿。对于编写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绝不轻易放过。省优秀运动队一些运动员同音而不同字的名字多处运用,如“风”与“凤”、“慧”与“惠”等,均与运动队领导以至运动员本人查询核实。在收集的图片资料中,凡说明词中涉及的人名、地名、日期也认真查对,不以讹传讹。如1994年在古玉门关待发的全国摩托车拉力赛,原图片资料将地名称为“天下第一墩”,经多方核对作了修正。《体育志》的问世,还包括着省志办审稿者的宏观把关,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字斟句酌,兰州新华印刷厂的精心印制。他们的担责劳动和锦上添花,共同创作了这部体育画卷。

在记述甘肃体育较快进步和取得成绩的同时,《体育志》也实事求是的指出了尚与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不相适应之处:一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体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体育事业尤其是大众体育投入不足。二是体育设施和场地数量少、标准低,难以满足全民健身活动的需要。特别是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市,还没有承办全国性大型综合体育赛事的设施。截至2003年,全

省各类体育场地面积人均平均比全国人均低0.19平方米,人均建设资金投入比全国人均低92.41元。三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较低。四是竞技体育的发展条件与先进省(市、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优势项目逐步减少。甘肃省虽已有运动员入选国家奥运代表团,但至今尚未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五是依法治体、依法行政力度不够,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六是体育科研发展滞后,社会办体育程度尚低。七是体育产业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和成长初期,发展体育产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体育志》的编纂虽经多方把关,但仍遗留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诸如:由于《甘肃省志续志》的编纂仍沿用上届“由省上各有关部门、单位、相关学术机构和社会人士承担”的办法,由省体育局承编(包括印刷、发行)的《体育志》,也难以摆脱“部门志”的束缚,“专志不专”的通病亦未能从根本上“防治”。另如,有些篇章的资料未能深挖补齐,像“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尚缺精确统计和列举;“国际体育交流·出访”有年无月,数据不全;“体育社团·单项运动协会”中只有理事会人员名录,而无其主要活动情况简介。有的图片画面还不够清晰。对此,该志编修者已作了专题总结。

(作者系省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干部)



伏羲与华夏文明

张元 张克锁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被尊称为“人文始祖”,是一位有着非凡贡献的创世英雄。

太昊伏羲氏,相传其人首蛇身,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为人类的始祖。由于伏羲是蛇身人首,故有“龙的传人”之说。“龙”那坚韧不拔、威武雄壮的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中华文化最伟大的标志。“龙”是将“龙的传人”凝聚在一起的最好的纽带和动力源。无论何时何地,“龙的传人”始终是中华民族寻根先祖的归结点和民族团结的“粘合剂”。中华龙所体现的统一、团结与和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中国5000年来持续发展、从未中断的根本原因。伏羲所创立的“龙”图腾,将各民族的图腾元素融合于一身,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象征。今天,我们应当努力继承弘扬中华龙的精神,发掘与弘扬中华文明史,凝聚全球华人的认同感,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甘肃省天水市是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华黄河文化的发源地,古称“成纪”。上古时期,伏羲、女娲都降生在这里,故又称为“羲皇故里”“龙的故乡”。天水市保护完好的历史古迹随处可见,遍布全境——古风台(伏羲诞生地)、女娲洞(女娲诞生地)、葫芦河、龙马洞、卦台山、伏羲庙、秦安大地湾等等,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中华历史文化遗存。从这些遗存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的有力史实。

“古风台,地方碎,伏羲皇帝头一辈,身穿桑叶儿一身黑,伏羲爷出生在古风台。”这是流传在甘

肃省甘谷县的一首民谣,它讲述的就是有关伏羲的传说。

古风台,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白家湾乡,只有几十户人家,在当代方言中,“碎”即“小”的意思。“古”字,在甲骨文中解释为一个民族的族号;“风”,姓也,伏羲即姓“风”,“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唐司马贞补《史记》之《三皇本纪》)“台”:上半部是一跪坐的人,下半部是一大“口”,所以,“台”即表示有权力的人在台上讲话。古风台,一个很小的地名,一个很“碎”的地方,却包含了伏羲时代神秘的生产生活信息。“伏羲皇帝头一辈”,则表明了伏羲的地位,承认了伏羲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肇启华夏文化之开端,奠定了中华文明之基石,伏羲的历史也就是华夏文明的历史。

卦台山,地处天水市西北的三阳川最西面的渭河入川处,形如龙首。相传伏羲具此台放眼三阳,象天法地,妙悟八卦。他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意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他把自己当时已经认识的对天、地、人和自然环境的知识,巧妙地融合在一个以太极图为核心,由八组“—”和“--”划痕组成的,内圆外方(实为八边形)的几何图案,就是我们今天尊称的“伏羲八卦”。伏羲“一画开天”,开创了人类从实物记事走向书契记事的新纪元。他“仰观象于天,俯察于地”,认为“天创生万物,地负载生命”,人要发展,一定要适应天与地变化之规律。按照这种“顺天应人”的规律,伏羲帝“始创历法、节度四季”,引导我们的先人们按“四

时(季)八节”划定的时序,从事农耕生产,极大的推进了中国农业的向前发展。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大地湾,人们发现并发掘出距今5000~8000年间的大量原始文明遗存,出土大量的彩陶罐、石器、骨器、炭化的藜、粟、油菜籽、纺锤、纺轮,以及乐器等众多文物,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这些发现用确凿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地湾原始遗存所显现的史前文明与传说中的伏羲文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那些刻画在彩陶器上的许多符号,印证了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确立了伏羲“一画开天”的始祖地位,一些陶器上的鱼纹和石网坠,则可以引证伏羲“结网罟以教佃渔”;石灰坑中的猪下颌骨、猪骨,则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的发达,印证了伏羲“养牺牲以庖厨”。大地湾考古中编号为F405的房址面积达270平方米,F901房址更是惊人地达到420平方米之阔。在当时,这绝对是属于超大型建筑,建造者非“大庭氏”莫属,而伏羲之后沿袭伏羲氏名号的部族就有“大庭氏”的称号,这充分说明了伏羲部落与大地湾的关系。

仅仅通过大地湾只占总面积5%的实物考古发掘,结合甘肃天水民间历代相传的传说,就已经证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是一个历史真实的存在,将中华文明史再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同时也彻底否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外来之说。

伏羲庙,在今天水市区西关,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专门祭祀伏羲的宗庙建筑。目前,天水伏羲庙每年有两次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一是农历正月十六日,相传是太昊伏羲氏的诞辰,城乡数万民众前往伏羲庙进香祭祖朝圣,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间祭祀活动。二是每年夏至日(6月22日),由甘肃省政府举办的公祭伏羲大典,盛况空前,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伏羲庙也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1992年8月,江泽民来天水视察,为古成纪题下了“羲皇故里”的碑文。

先祖伏羲,他用自己的智慧,成为华夏民族的首领,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恪尽孝道,不忘感恩,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品德。

先贤圣哲,先烈先辈,代表的是一种血脉和精神。

孔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秦代开始,历代都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主持祭祀,每年春秋两季以太审之礼,按照严格规范的祭祀程序和礼节制度,隆重祭祀先祖伏羲。

伏羲及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团结和谐不仅是广大人民的愿望,而且也是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之根本。如今,“龙的传人”遍及五湖四海,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无论他们受到何种文化的熏染,这些“龙的传人”们始终也无法忘记自己是伏羲的后裔,是华夏的儿女。

(本文摘自《志苑》)



西安事变在兰州

史言

一九三六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就在西安爆发事件的同一天,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东北军五十一军奉张学良之命也发动了突然事变。它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兰州被称为“兰州事变”。

一、事变发生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重,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国民党中央仍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北上抗日会师陕甘,国民党调集各路重兵“围剿”,遂使西北地区骤然成为当时抗战与内战的斗争焦点。“西安事变”(包括“兰州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张、杨二位将军率东北军、西北广大爱国官兵发动的。

在甘肃地区,一九三六年政治、军事诸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随着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以及红四方面军西征和鏖战河西走廊,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二十五师、九十八师及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等部相继进入甘肃,国民党各系统、各种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加剧。为了推动和引诱东北军积极“剿共”,蒋介石委任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甘肃省府主席,同时又任朱绍良为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予以节制和监视。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长征途中宣传的影响下,甘肃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意识在逐步增强,甘肃地方实力派人物面对民族危机和甘肃的复杂局面也忧心忡忡,进入甘肃“剿共”的国民党军队中,厌倦内战的情绪也在逐渐扩散,尤其是东北军中,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蒙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加之一九三六年九月东北军与我党团结抗日秘密协定的订立,红军、东北军、

西北军在西北“三位一体”局面初步形成,“反对内战”“坚决抗日”“打回老家去”就成为广大官兵的思想主流。

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是一九三五年秋进入甘肃的,(该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三师驻防兰州,其中师部及六三九团驻兰州东教场,六三八团驻兰州南关,六三七团驻拱星墩,师长李振唐;一一四师驻靖远至永登一线,师长牟中珩;一一八师驻定西以东地带,师长周光烈。)①军长于学忠在东北军中屡建战功,深得张学良信任,成为东北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重要人物。该军“九一八”事变后撤驻天津一带,东北沦陷的苦难及在天津遭受日军强暴欺凌的亲身经历,使该军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激昂,对蒋介石一味对日妥协和将该军推到西北“剿共”的险恶用心极为愤慨。当时,五十一军中已建立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东北军内秘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派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共党员解方。不少中下级爱国军官参加了这个组织,一一三师三个团长中,就有两个是同志会的骨干,在后来的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②。

五十一军控制兰州地区,为以后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我党影响的深入,东北军内抗日热情的高涨和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为发动事变准备了条件。

二、事变的经过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张学良亲驾飞机自西安经平凉、固原飞抵兰州,了解了甘肃和五十一军状况,与于学忠进行了密谈③。十二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于学忠及部下三个师长奉召赴西安开会,五十一军军务由军参谋长刘忠干(孝同)负责,甘肃省府工作由秘书长周从政(达夫)代行。在西安期间,于学忠参加了东北

军高级将领秘密会议，赞同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定^④。

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总部电令五十一军向兰州收缩部队，监视和戒备国民党中央在兰单位和部队。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行动得手后，张学良总部急电兰州，告知扣蒋成功，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兰州绥靖公署、中央军各部及省会公安局的武装，扣押重要党政军首脑，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通电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切实控制兰州，与西安相呼应^⑤。

五十一军接电后，即于当日下午由刘忠干、周从政召开各师参谋长、军部各处长及部分在兰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坚决服从张学良将军的命令，通知一一四师、一一八师火速向军部靠拢，在晚上七时开始行动。会议研究了具体步骤，分配了任务，确定由刘忠干、周从政分别负责军事行动和政治措置^⑥。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统一行动开始前，由周从政设计先行扣押军统特务头子、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而后，为团结和中立地方势力，周从政电话告知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假称兰州与外电讯联系中断，为防不测，五十一军将在当晚派部队通夜巡逻，请新一军各部岗哨退避，以免误会而冲突^⑦。

晚上七时，按预定计划，于五十一军军部（原址在今省政府后院）大开宴席，宴请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因朱绍良到西安开会未归，绥署官员由参谋长章亮琛率领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伏兵突出，五十一军未发一枪，顺利的扣押了赴会官员。

与此同时，城内枪声四起，以一一三师为主力的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希哲）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在突然进攻下，绥靖公署经过短暂的激烈交锋，即为东北军占领，击毙绥署监印官、副官、卫士队长等数十人；解方率队冲入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电台及许多重要文件^⑧。对甘肃军警督察处、省会公安局及各分局、中央军第八师留守处、二十四师留守处、交通兵二团、监察使公署等

处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未遇激烈抵抗。在东校场和飞机场战斗较为激烈，在冲突中中央军徐、蔡二团长被打死，东北军亦有数十人伤亡^⑨。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五十一军派出部队分头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社等要害部门，予以监视和戒备^⑩。

按原定计划，在军事行动后，五十一军即明确告知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兰州行动的原委，宣读了张、杨“八项主张”。此后，邓宝珊所部遂按兵不动，对事件持同情的静观态度^⑪。

至十三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在行动中扣留了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总参议张春浦、交通处长李蕴华、军官处长何晓宣、副官长拜伟、军警督察处长兼新一军参谋长张性白、甘肃国民军训会主任、特务头子胡维藩及省会公安局局长史铭等一千人员，打死绥靖军需处长王式辉、绥署参议、特务杨陟岗以下数十人，俘虏一千二百多人，中央军系统在兰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缴械，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七百余支，步枪数百支^⑫。

军事行动结束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同时，五十一军和省政府连续召开各种会议，以争取同情，稳定局势。

十三日上午，枪声刚刚停止，省政府即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周从政主持，刘忠干及省政府委员邓宝珊、刘广沛、陈端、张维、喇世俊、田炯锦、许显时等人参加。会议宣读了张、杨通电，介绍了西安情况；刘忠干介绍了兰州行动经过。在当时情势下，与会者虽感震惊，但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举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⑬。

同日下午三时，周从政以省府名义召集中央在兰单位负责人开会，中国农民银行、邮局、电报局、无线电台、税务局、盐务局等机关负责人到会。会议要求安定秩序，各单位收入暂时封存，不准向中央报解。与会者表示愿照省府要求去办，“在兰州，说兰州，不会自外生节”^⑭。

十四日上午,省府又邀请地方士绅、社会名流水梓、裴建准、杨思、邓春膏、王廷翰等二十余人及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办事处处长进行座谈,多数人表示了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

同日下午,周从政偕教育厅长田炯锦,在教育厅召开各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百余人参加的大会。周从政除介绍“西安事变”情况外,着重介绍了西安广大学生抗日请愿游行状况和张学良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与会教员、学生反应强烈,情绪激动,喊出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国共合作”的口号。田炯锦讲话则要求学生“关心国事中不忘求学”。^⑮

与此同时,五十一军在全城加强了军事防务。高度戒备,搜捕漏网人员与散兵溃勇。并派人对事变中被扣、被俘人员进行宣抚工作。要员中除个别人外,多数集体移住邓宝珊住宅或新一军军部,安定了他们的情绪^⑯。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民众的拥护,以切实控制兰州,五十一军以省府名义下令停止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强令省党部控制下的《甘肃民国日报》登载张、杨“八项主张”(以后该报因登载汪精卫攻击各国人民阵线的文章被勒令停刊;一说因该报后来登载蒋介石《对张、杨训话》而被勒令停刊^⑰)并派出人员到各大、中学校进行抗日讲演,散发爱国传单,讲解危急国势,宣传事变意义。通过东北籍教员和学生,在兰州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发动青年学生在“满市遍贴五色之标语”“容纳各党各派”“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震动了全市^⑱。

事变发生的第四天(一说十四日),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返回兰州,进一步稳定了兰州形势。此后,于频繁往返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参与西安事宜,一面处理兰州工作^⑲。

“兰州事变”期间,由于五十一军和省府配合紧密,军事设防严密,政治措施得力,迅速稳定了局势。广大市民对事变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人心安定,兰州街市秩序基本良好,除个别情况外,市民生活未受到过大惊扰。随着西安局势的发

展变化,兰州局势也忽而紧张,忽而和缓。当南京何应钦准备进攻西安时,西安紧张,兰州也紧张;当宋子文兄妹和端纳到西安后,西安和缓,兰州亦和缓,总的趋势是从紧张到和缓。

十二月二十五日,五十一军忽接西安总部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二天,飞机从西安送来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各部队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

张学良将军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动,引起五十一军和兰州各界人士的震动和担忧,以为这是一件“奇事”,一致盼望能从此出现“内战中止,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报告蒋介石已答应张、杨条件,“兵谏”目的已达。鉴于西安事件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惟史铭暂不恢复职务),发还收交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遂告结束^⑳。

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张学良将军后,东北军在严峻的形势下,内部失去重心,矛盾突起。蒋介石遂乘机派出人员奔走东北军各部,国民党军政部参议陈贯群奉蒋令到兰州活动,但于学忠一本初衷,陈氏碰壁而还。

一九三七年二月,蒋介石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三月间陆续东调离开甘肃。

三、事变的影响

“兰州事变”的发生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在省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天津大公报等报刊辗转登载了兰州事变的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和关注。

五十一军在兰州行动的同一天,东北军平凉驻军也奉张学良命令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了全城,并与南下的红军罗炳辉部一道,开展了群众性的救亡宣传活动。兰州和平凉行动相配合,东北军掌握了从兰州到西安的公路大道^㉑。在省内其他地区,“兰州事变”使国民党反动势力惶恐不安,天水

国民党驻军中央军三十七军扣押了于学忠委派的官员,军队高度戒备,如临大敌。正在河西同我红军西路军作战的马步芳、马步青闻知兰州情形,十分惊恐和仇视东北军,他们攻击这是“赤化”。于学忠省政府委派的专员、县长等人员皆被驱逐或逮捕,其中酒泉保安副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张掖公安局局长范某等人被马步芳以“清共”名义残酷杀害^②。

“兰州事变”的突然发生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势力,促使国民党营垒中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产生了共鸣,一些人实际上对事变表示了同情和支持。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通电支持张、杨“八项主张”;新一军军长邓宝珊。虽未公开表示支持,但该部在兰州驻军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邓又下令将原驻静宁的新十一旅撤到榆中,给东北军让开了西兰公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邓宝珊还奔走西安、南京间,协助杨虎城处理善后^③。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也在后来被国民党中央认为对事变态度暧昧而予“改组”^④。

“兰州事变”的产生使甘肃各阶层爱国民众受到一次强烈的震荡,五十一军以其实际行动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呼声,为广大群众所赞同。事变期间的抗日救亡宣传,有力地促进了兰州抗日救国思想的发展,并且间接地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对以后甘肃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极大。

“兰州事变”的爆发,也引起了我党的高度注意。在国民党准备武装“讨伐”张、杨之时,我党中央从西北“三位一体”实际出发,应张学良要求,曾电商正在河西血战的西路军,拟令西路军东调,靠近兰州,取得于学忠部武器、弹药等物资的帮助,以固甘援陕,此计划虽因形势变化等原因而中止,但西路军血战河西和兰州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互相形成了有利的态势^⑤。

“双十二”事变是张、杨两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发动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双十二”事变重要组成部分的“兰州事变”是东北军五十一军的爱国行动,在国民党中央军重兵云

集兰州,马步芳、马步青盘踞河西的险恶形势下,五十一军广大爱国官兵受民众爱国热潮激励,以区区三师之兵毅然追随张、杨二将军发起事变,保证了西安后方的安全,解除了张、杨后顾之忧,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五十一军发动的“兰州事变”将以其爱国义举而载入史册。

注释

①⑤⑧刘忠干《兰州事件的回忆》

②王万里《解方将军与“兰州事变”》

③孙汝楠《我和张学良将军两次会见记》(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④《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⑥⑦⑬⑭⑮⑰⑱

1. 周达夫《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

2. 刘忠干关于“兰州事变”情况的复函(存兰州市委党史办)

⑨⑩⑫

1. 《兰州事变记略》

2. 赵日新《西安事变中兰州情况补零》(载《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⑪见刘忠干关于兰州事变的复函

⑫⑲

1.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2日载“兰州城内变乱一幕”

2. 王新潮、孟炼百、王自治《双十二事变在兰州》(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⑩《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甘肃政协合编,第13、49、82页)

⑰⑱杨力雄《十年报人纪要》(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⑳

1. 《解放前甘肃五十年大事记》

2. 《甘肃双十二事变时的社会情况》(甘肃省档案馆:革命历史资料卷75)

㉑李维汉、习仲勋、汪锋《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及杨子实、石佩玖《记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载《邓宝珊将军》一书)

㉒见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中所引中央与西路军文电。(载《党史研究资料》总74期)

(本文载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徽县习俗拾趣

李星

一、婚姻习俗

徽县传统的婚姻习俗多为男娶女嫁，也有南方到女方家的，称为“招女婿”或者“倒插门”。男方到了适婚年龄，父母亲朋会留意合适的对象，或者请媒人帮忙物色适合的对象，有了中意的对象后，男方家会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若没有异议，媒人会约男女双方见面，通过见面互相认识。改革开放后，提倡自由恋爱，到条件成熟时，再由双方父母商议，举行仪式。一般的流程为：

1、请媒：男家看中某家之女，即备礼物请合适人选为媒，俗称“请媒”。也有女家看中某家之男主动请媒的。

2、提亲：媒人受托之后，上女家说合，探视女家的意向，俗称“提亲”。

3、盘八字：女家表示联姻的意愿后，男女双方即请算命先生生辰八字，八字合，联姻程序继续进行，不合则中止。

4、踩门，两家人对亲事都认可的情况下，通过媒人沟通商定，请人看好日子，女方去男方家踩门。踩门一来是看男方家家庭情况，另一方面两家商量礼金、男方家要给女方准备的衣服、首饰，需要置办酒席的规模、档次，喝酒、娶亲的日子等事宜。

礼金，也称彩礼，20世纪90年代初期，彩礼一般几百元到几千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上涨等，礼金的数目也有所上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21世纪初期到2013年间，彩礼数万元已经是很平常的，也有十几万的。

酒席的规模和档次一般是办喜事的主家家庭情况而不同，20世纪90年代，普通人家的酒席一桌几十元到上百元，酒店承包宴席的定价从80元到几百元不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物价上涨，酒席的档次也有所提高，普通人家的酒席一桌的价位大概在300到500元之间，21世纪初期到2013年，酒席价格也有上涨。20世纪90年代农村酒席大都喝玻璃瓶的陇南春，一般5元左右。到了21世纪初期到2013年间，三星、四星金徽酒已经是席间很常见的酒了。

5、稳壶，男方家给女方家送酒，女方家里会拿一个酒壶或杯子、碗之类的东西，放置在家中堂屋的桌子上，若7日后酒壶安安稳稳、完好无损，家中人也都平安无事，则说明这门亲事家中的先祖们都没有异议，（徽县方言说“没有其它的搅打”），亲事就可以继续进行。若是酒壶摔破了，或是家里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就说明这门亲事不成。

6、插戴（也叫喝酒），插戴是娶亲的前一天，女方家招待亲朋好友，这天女方家设宴，酒席由男方家出资，农村里在家做酒席的，男方家备齐酒、肉、蔬菜等货品提前送到女方家里。女方家准备好嫁妆，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供亲朋好友参观。这一天新女婿要上老丈人家去给亲朋好友敬酒，女方家的亲戚会想方设法把新女婿灌醉。

7、送亲：陪送新娘出嫁为“送亲”（送亲人数一般为双数）。送亲人徽县俗称“娘家人”，“娘家人”由新娘的姑舅亲朋组成，新媳妇出门前，男方家迎亲去的人要给丈母娘红包，俗称“离娘钱”也叫“针工伴女钱”。女方家陪嫁妆，嫁妆会有两个箱子，所

以前去接亲的男方家人,会有专门的“背箱子的”新媳妇到男方家后先不下车,要等新郎给了“下马洋”(男方家准备好的红包)方才下车。男方家要给新娘的姊妹给“姊妹钱”,新娘的兄弟要拿“羊头”“羊尾”,娘家人送亲的小孩要拿“羊毛”。“羊头”“羊尾”“羊毛”分别为数目不等的红包,羊头、羊尾的数目由两家事先商定,羊毛的数目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农村和城里也有区别,20世纪90年代羊毛一般1元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3年间羊毛数目逐渐上涨,城里一般10元。还要准备赎钥匙的红包等。在农村酒席结束后娘家人返回时,男方家在大门口放一个长凳子,挡住大门,凡是娘家人要从大门出去,必须要喝男方家敬的酒,徽县俗称“挡门酒”。

8、迎亲:男家正婚日,男方家会挑选属相合的男女亲友前去女方家(一般为单数),并且事先请一位属相合且“命大”(意为父母双全、有儿有女,生活幸福)的人前去迎亲,(迎亲者徽县俗称“陪客”,通常为中年妇女。)迎亲者代表新女婿,去时带上一把红伞,一件红衣服,新媳妇给娘家先祖、父母磕过头,拜别父母出来后,“陪客”给新媳妇把红衣服披上,打上红伞,新媳妇会要事先准备手帕等东西,路上遇见其他的新媳妇要互相交换,表示互相祝福。

迎亲这天男方家里设宴款待亲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大多是在自己家里请厨师来做酒席,21世纪初,很多人家都开始选择在酒店办酒席。在这一天也有人把新郎的父母亲装扮一下的,起初是给新郎的父母用口红涂上红脸蛋,头上挂上辣椒,披上大红的被面,用毛笔上一个“我家有喜”之类的横幅挂身上,渐渐地承办酒席的酒店开始备有戏服、官帽、等东西,化妆用品也由起初的口红、鞋油而变的越来越多,越专业,请婚庆公司的会由婚庆公司的化妆师化妆,化妆主要以滑稽、喜庆为主题。

9、闹洞房,新婚之夜,亲戚朋友,不分长幼,于新房内逗乐新郎新娘,徽县俗称“耍新媳妇”。

10、回门饭,新媳妇过门后第三天,要回娘家吃饭,徽县俗称“回门饭”。

11、认亲,新婚后,前三年的春节,每年正月初二,新媳妇和新女婿要到媳妇的娘家去,拜访娘家的亲戚,徽县俗称认亲

12、躲灯,新媳妇婚后的第一个元宵节,要回娘家过,徽县俗称躲灯。

13、追节,从男女双方亲事定下来以后,每到逢年过节,男方要去女方家“追节”,追节也就是带上礼品去对方家里拜访,婚后每逢年节也要到媒人家里去追节,需要追节的节日有春节、端午、中秋。

14、谢媒,婚事成了以后,男方家要置办一桌酒席,答谢媒人,并准备答谢礼,答谢礼一般为烟酒,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等,也有直接给现金的。

随着打工潮的掀起,徽县许多外出的小伙子带回了外地媳妇,姑娘也找了外地的婆家,结婚事宜也有所改变,相比传统的婚俗有所简化,大多都是先订婚,再选好日子举行婚礼,省去了许多传统的规矩。

待客方面,县城里边多是男家和女家同一天在同一个酒店举办婚礼,有专门的婚庆公司策划婚礼仪式,请婚礼主持人、司仪等。农村里也有在酒店办酒席的,2000年后,农村开始有了专门承办酒席的固定场所,收取一定的费用,提供场地、厨师厨师和酒宴需要的帮工等。

二、丧葬习俗

徽县丧葬习俗,葬法为土葬,葬式为墓葬,葬具为棺木,葬制为单身葬。解放前大姓旺族设有墓地,普通老百姓都是散葬。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墓地依照生产队的形式,每个生产队留有墓地。丧葬的仪式规制因死者的辈分、年龄而别。年龄较长孩子已经成年的男女去世称为“白喜事”。“白喜事”一般从人咽气(咽气为徽县话)到出殡三天时间,人去世后,儿女会请阴阳先生看墓穴、出殡、下葬时间等。一般人死后第三天下葬。(也有第三天日子不好的,会在3至7日内择日。也有极少数寄埋。)

1、送终:养老送终谓第一大孝事。病人垂危之际,儿孙守护于前,静待逝世。病人一死,儿孙即长跪床前,焚烧“落气纸”,全家放声哀哭。给死者净

身整容,穿戴寿衣、寿鞋、寿帽,下塌,点长命灯。(也有病重时,提前净身,穿好戴寿衣、寿鞋、寿帽的。)寿衣、寿帽等有自己做的,也有在丧葬用品店买成品的。

2、报丧:人死之后,孝子随即向亲友报丧,即报告死讯、丧期、葬期等有关事宜。孝子登门报丧时,到了亲友邻居家要在正屋,中堂前磕头。

3、入殓:俗谓“装棺”“进棺”。发丧之后,亲友纷纷前来吊唁,待死者的至亲好友到齐之后,即行入殓仪式。入殓时,先将纸灰均匀撒在棺底,铺上“盖尸被”,再将死者搵入棺内,按迎卧睡式放置,盖上“盖尸被”,揭除“盖脸纸”,塞紧四周,然后斜盖棺材盖。

4、坐草铺:设好灵堂后,在灵柩两边铺上麦草,所铺的麦草要一次拿够,不能再添。孝子坐于草铺上守灵,徽县俗称“坐草铺”。到出殡的时候,草铺用的麦草要在坟前烧掉。

5、出纸:请来的阴阳先生制作好“桶儿纸”,一般在人去世后第二天(一些地方在出丧前几小时),由长子从灵堂背着“桶儿纸”到门口,孝子们放声痛哭,到大门口后,将“桶儿纸”悬挂于大门口,“桶儿纸”按照逝世者的年龄决定圈数,一圈代表10岁,六圈起步,(比如80岁就是8圈,如果是七十几岁也是按80岁来算。)

6、吊唁:凭吊上香磕头,平辈作揖,晚辈跪拜,孝子陪吊。

7、封棺:出殡前,道士(阴阳先生)擎幡引孝眷绕棺三周,盖棺,封口,钉子母钉。俗谓此时为生离死别之时,丧眷大恸,嚎丧不止,满堂悲凄。

8、出殡:俗谓“出葬”“出柩”。启灵时,孝子扛幡抱灵,跪于门前院子里,丧夫用丧绳托起棺材,一声吆喝,三进三退,抬至院中,停于长凳之上,绑扎龙杠,丧家鸣放鞭炮,向外打扫灵堂。出殡队伍按序排列,一般是扛幡抱灵孝子、灵柩、孝子、其他孝眷、鼓乐班子、送葬亲友。出殡途中,鸣放鞭炮,抛丢钱纸(徽县俗称丢买路钱)。中途歇息日“落马”,孝子跪拜。柩至墓地,绕穴三周,随即安葬。葬毕,孝子沿出殡路线返回,安置灵位,俗谓“安灵”。至此,丧事结束。

9、超度:徽县俗称“做道场”“做法事”。人死之后,孝子即请道士设置灵堂,超度亡灵。“法事”一般有迎神、开路、设灵、开生方、破地狱等。“法事”一般做1—7天不等,也有做“七七四十九天”的。

10、守孝:死者安葬之后,第三日孝子要去上坟,为“复三”,七日要去坟前烧纸,为“头七”孝子要居丧,徽县俗称“守孝”。一般守“七七”(49天),过完“七七”为止。也有守一年的,做完“周年”结束。守孝期间,孝子不能艳装(也有守孝期间不能洗澡、洗衣的说法),不能饮宴,不能娱乐,也有不外出的。

11、三周年:长辈去世后,满百日要举行“家祭”“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均要举行祭奠,一周年和二周年规模较小,只在家里设小宴,招待前来拜祭的亲朋,三周年为大祭,一般都设宴招待前来拜祭的亲朋,规模和办丧事时相差无几。孝子到坟前脱了孝衫,守孝结束。

在举办丧礼三周年祭奠的时候,有的大姓家族制有族谱的,会请出“族谱”,在去世三周年过后,会由专门掌管族谱的人把去世者的姓名添在族谱上。

三、节日习俗

春节

春节徽县人俗称“过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又称小年,小年这天晚上送灶王爷,送灶王爷准备“灶糖”(用麦芽制作的糖)、灶饼。灶饼一般12个,也有24个的。意为每年12月,每月都有吃的。灶糖又甜又粘,意为灶王爷吃了嘴甜,去了天上多说人间的好话,粘是希望把灶王爷的嘴黏住,灶王爷去了天上不说人间坏话,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送走了灶王爷,家里就可以百无禁忌,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家家户户开始彻底的打扫卫生,徽县人说“扫霉”。平日里不能动的地方和不容易够着的地方,都可以毫无顾忌的去打扫,打扫完卫生。就开始置办年货,一般家里都会把养了一年的肥猪杀了,再做上一个豆腐,准备一些挂面。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煮肉、炸油、炼臊子,挂肉、腌肉,蒸馒头。

腊月三十家家户户贴对联,守孝未三年的

人家不能贴红色对联,大多贴白色、蓝色的对联,也有的地方贴绿色对联。晚饭要吃宽面,徽县俗称“宽心面”,意为吃了宽心面宽宽心心过年。“宽心面”一般都会多做一点,稍有剩余,意为年年有余。腊月三十晚上家里所有的灯都要打开,院子里或者屋檐下挂上红灯笼,家人聚在一起守岁,直到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家家户户燃放鞭炮。腊月三十下午给逝去的亲人上坟祭拜,亲人逝去未滿三年,也就是三年祭日未过的,徽县话说家里有灵的,要接“先人”回家过年,从坟头燃一根香,一路持香回家,香要不断更换,保持香不能灭,正月初三下午,再持燃着的香送到坟上祭拜。

正月初一早上,大人小孩穿上新衣服,小孩子给家里的长辈磕头,长辈会给小孩子压岁钱。这一天不能串门子,家人们都聚在自己家里,中午饭一般吃饺子。初二开始“走亲戚”,平日里不常见面的亲朋好友这个时候都要走动走动,互相拜访。家里有“灵”(意为家里有长者去世,三年服孝期内的。)的要在家里守孝,亲朋都要去“交灵”(相当于去拜祭死者。)正月初三下午,有“灵”的人家到逝去的亲人坟头拜祭,守灵就结束了。正月初四开始“走亲戚”。回访前去“交过灵”的亲朋。

正月初五社火开始排演,正月初八社火“出窝”(排演好的社火正式开始表演。)徽县传统的社火分为白天的社火和夜社火,白天的社火有“马社火”“高台”“踩高跷”。社火演出前,先有探马下帖子,探马敲着锣,身着古装,戴着大头面具,给预备演出的地方放下帖子,人们就知道社火要来,准备些点心、饼干等东西接待社火,在点心饼干等包装外还会放上数额不等的钱。马社火:在表演中用马匹、骡子和驴装饰挂彩、表演者穿上古装戏服,扮演成戏剧人物组成一队社火,队伍最前面的手持“天官赐福”的横幅,其次有八仙过海、张果老倒骑毛驴、刘海洒金钱、三国、西游记等人物,随着农村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马社火所用的马匹被四轮、三轮等农用车辆代替,演变为车社火。高台:传统的高台社火用木杆钢筋竹竿等绑扎,下面用方形木架支撑,表演的人物亦是装扮成哪吒闹海、白蛇传等传统戏剧人物,刘海洒金钱和天官赐福是必

不可少的。用绑带等把表演的人固定在绑扎好的高台架子上,表演时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四人或六人、八人抬着前行,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台不再由人力抬着前行,而是直接装在汽车、三轮等交通工具上。踩高跷:徽县方言也叫“高脚子”,表演者身穿古装,手持道具,扮演成神话或者传统历史人物,脚踩高脚腿,组成一队,在锣鼓手们敲击的锣鼓声中,踩着鼓点扭着秧歌前行,队形变化多样。

夜社火是晚上表演的社火,一场夜社火由“划旱船”“舞狮子”“跑马”“腊花舞或秧歌舞”“云朵舞”“唱小曲”等节目组成,节目又因地域和乡镇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江洛镇的夜社火必有云朵舞,而有的乡镇没有,有的乡镇为秧歌舞,而有的乡镇为腊花舞。但表演形式总体大同小异。

从正月初八晚上小孩开始打灯笼,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碰灯”(小孩们互相打着灯笼碰对方的灯笼,在碰的过程中,灯笼会烧掉。)正月十五晚上社火最后演出,正月十六社火“收窝”年也就此过罢。

春节期间的禁忌:正月初一不动扫帚,正月里不动剪子。正月初一至初五不干活,只管吃喝玩乐。(意为干了活会劳碌一年。)

20世纪末期,电视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人们过年的习俗也有所改变,腊月三十晚上的守岁添加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一新内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餐饮业推出了年夜饭等春节项目,腊月三十晚上去酒店吃年夜饭也成了很多人家的选择。

元宵节

元宵节徽县人也叫正月十五,这一天的习俗有:

1、吃元宵,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在糯米粉中“滚”成圆形,元宵的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或煮食或油炸,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2、观灯、猜灯谜,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有的人家会放“孔明

灯”祈福。孔明灯用竹子划开,做成细长的竹签,用竹签弯曲做灯的架子,用麻纸条刷上浆糊缠好,固定住形状,再用麻纸糊到架子上,孔明灯一般是圆柱形,下边开口,中间有一个十字形的架子上放置一小灯盏,也可以用蜡烛。放灯的时候,先找一堆麦草之类的柴火点燃,几个人拿着孔明灯置于火焰上边,等热气充满,灯摇摇欲飞的时候,赶紧点燃事先固定好的小灯盏,大家一齐松手,孔明灯就徐徐上升了。21世纪初,开始有买孔明灯的,叫做“许愿灯”,可以在灯上书写愿望,放灯祈福。买的许愿灯放飞起来非常简单,里面的用来加热的小灯盏也用固体酒精取代。

小孩子们有挑灯笼的习俗,灯笼有最普通的“火罐罐”和“八牙灯”,还有各式各样的精美灯笼,有的做成十二生肖,有各种动物造型,有莲花灯,也有“滚灯”(一种推着在地上走的灯笼)。城里边还会举办灯谜晚会等节目。

3、放烟花,正月十五晚上放烟花,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些烟花在自己院子里放,县城每年正月十五大型的放烟花活动,会吸引很多城乡群众观看,看烟花的人成群结队。

4、走百病,元宵节除了庆祝活动外,徽县人有又“走百病”这一习俗,过完元宵节,正月十六这天,大人小孩沿着大街小巷或到野外山上行走,称为“走百病”(也叫“游百病”)传说这样可以驱病除灾。

二月二

1、理发,二月二,农历二月初二,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这一天人们都会给小孩理发,逐渐的大人也都在这一天去理发,希望这一年中会有好运。

2、爆米花,农村人家会炒黄豆,玉米,传说这一天炒了这些东西,小虫子,蚂蚁等就不会跑到灶台上去了,每年到了二月二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爆玉米花的人,带着爆玉米花的机器,走街串巷爆玉米花。

清明节

清明节徽县的主要习俗有扫墓祭祖,并且流传有“有儿有女早上坟。”这样的说法。

扫墓祭祖,在清明节前上坟扫墓祭祖的,铲除

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在坟上挂上黄白相间的纸条。这些都要在清明前完成,也有需要为墓除草添土,则需要等到清明当天,只有清明这天没有禁忌,可以在坟头添土、除草。

清明祭扫仪式大都亲自到坟上去举行,也有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到坟头去的,会采取“烧包袱”祭奠祖先的形式。“包袱”也有“包裹”之意,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亲人选一个十字路口或者空旷开阔的地方,面对家乡的方向跪下,用草木灰画一个圈,留一小口,放上祭祀用品,燃烧纸钱,供逝去的亲人前来享用。

立碑,在徽县清明节也有立碑这一习俗,讲究在父母双方去世三年以后,父母有一方健在不宜立碑,时间一般选在清明节当天或者忌日(大都选在清明这天)。碑多用石料,徽县人们多用大理石、大青石(徽县俗称“青杏石”)。样式都是立式的,立碑时,先是由子女选料刻碑,定好日期。碑刻好后,要将碑用红布裹起来,碑立好后,揭下红布,供上贡品,孝子们在坟前点燃香烛,燃烧纸钱。在立碑的当天,儿女们要请一位有文化、德高望重之人“点碑”。

端午节

端午节徽县人俗称“五月单阳”,传统的风俗习惯有:

1、包粽子,端午节前一天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徽县人包粽子多用纯糯米,也有放入一两颗红枣或者放些豆沙的,包好粽子,晚上放进锅里煮,火烧够以后灭掉,等端午节一早起来,粽子还带着一点点余温。

2、佩香包,端午节小孩佩香包,手腕、脚腕系红绳子。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做成蒜疙瘩、辣椒、小动物、水果、蔬菜等各种形状,也有十二生肖形状的。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结成一串,给小孩挂于胸前。徽县人传统认为给小孩挂香包可以避免孩子被蚊虫叮咬。20世纪90年代后期,物质越来越丰富,临近端午节时街上有专门卖香包的小贩,花色品种繁多,很少有人再亲手缝制香包。

3、烙圈圈，圈圈是端午节特有的食物，吃起来和平日烙的饼子差不多，不同的是圈圈一般都是碗口大小，中间有一个杯子大小的孔。两面用梳子、顶针等妇女日常用的东西压的花子，用食用色素染上颜色，圈圈烙好后用红绳子串起来挂着，端午节的这一天用红绳子串一个挂在小孩脖子上。

4、插艾叶：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插艾是徽县人的节日内容之一。端午节早上，家家都洒扫庭除，乘着露水还未干之前采摘艾草，以艾草插于门眉，窗户，用以驱瘴。徽县还有传统，在端午节这天趁着露水采集的艾草可以入药，用来艾灸可以祛风除湿，也有在端午节这天用艾草煮水给小孩洗澡。

中秋节

中秋节徽县传统的食品有月饼，小果子，小果子形状如花生，用面粉、鸡蛋、油、蜂蜜和面，经过煎炸而成，出锅后再撒上白糖。徽县俗称“小果子”。

1、拜月神，也叫“敬月亮”，中秋节晚上，人们会设香案，点上香、烛，放上水果、月饼果子等，香案摆放在院落中，表达了对月亮的祭拜，也表达了人们对神的敬仰。

2、吃月饼，在中秋节，亲朋好友互相赠月饼，在节日当晚，一家人会围在香案前切月饼吃。

3、赏月，中秋节晚上，摆好香案，拜祭月亮，一家人坐在一起赏月、话家常，等月上中天，表示月亮品尝过贡品了，家人就可以开始品尝月饼了。

端午节、中秋节从2010年被国家定为法定假日以后，节日这天人们有了空闲的时间和家人团聚，也有人全家出去郊游欢度节日。

七夕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巧节或七姐诞，相传每年七月七日牛郎和织女一年一度的见面日，21世纪初也有许多人提出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这一节日也在徽县有体现，七夕这天，夫妻、情侣们互送鲜花礼物。

重阳节

重阳节是传统的节日，也称“老人节”，在这天有登高、喝菊花酒的习俗，徽县民间活动较少，徽

县老龄委每年在这天会组织老人登山庆祝。

十月一

农历十月一日这天，徽县的传统是要给去世的亲人送寒衣，在十月一日这天，人们到去世的亲人坟头祭拜，烧纸糊的棉衣、被褥等用品，意为从这天开始，天气冷了，要为逝去的亲人添衣保暖。

外来节日

情人节，公历2月14日原本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男女互送巧克力、贺卡和鲜花，用以表达爱意和友好，20世纪90年代末，徽县的年轻人也开始流行过洋节日，情人节在徽县也流行开来，渐渐的这一节日基本成为城里人每年必过的节日，到这一天，夫妻间也会相互送鲜花礼物，一起吃饭庆祝等。

圣诞节，在圣诞节，天主教教堂会先在12月24日的圣诞夜，亦即12月25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然后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20世纪90年代末，徽县的年轻人也开始流行过洋节日，这一节日也很受孩子们欢迎，商家会推出各种圣诞礼物，商场、商店等铺面也会布置圣诞树，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

生育习俗，孩子出生后产妇从孩子诞生之日起开始“坐月子”。坐月子时间为30天，坐月子期间忌下床干活，忌接触过冷过热的物体，忌风寒，农村一般睡热炕，徽县传统坐月子期间不能洗澡、洗头、洗脚，要尽量少沾水。小孩出生后亲朋好友前来贺喜，送营养品，传统的送的东西为鸡蛋、红糖、锅盔、小孩衣服等，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送的营养品也有所改变，送锅盔的已经很少了，大都送补品、小孩衣服、童毯、婴儿床、婴儿车、玩具等，小孩满10天的家里摆宴席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朋以示庆贺。小孩满月时摆满月就庆贺。请人为婴儿剃胎发。也有在小孩满月这天“碰拜大”的。一大早抱着小孩出门，遇到的第一个人，把小孩给对方抱抱，对方给小孩一个纪念品，则是同意收为“拜儿子”，这是徽县传统拜干亲的一种，如果一路未遇到人，就捡一个石头，或者拜给大树、山石的都有。

（作者单位：徽县史志办公室）

兰州民间节日习俗

春节:春节是兰州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古时称“元日”“元旦”,或“年”,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春节”。年,五谷成熟为年,五谷登丰叫大有年,年体现了我们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古老国度的风俗特点。传说“年”是一种兽,每值除夕夜出来食人,人们便在此夜燃火堆,围火堆而坐,噼噼啪啪的爆竹之声与冲天火光使年害怕而远遁;黎明,人们战胜了灾难,便欢乐庆祝,这便是年的来历。也反映了原始先民穴居野处,备受野兽侵袭的痛苦。总之,年之来历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过去,春节以祈神祭祖为主。除夕深夜子时(五月初一零点),家家点烛焚香,燃爆竹,迎新岁。开院门,屋门,叫“迎财神”或“迎喜神”。除夕扫地,初一不能扫地,意防冲财冲喜。在庭院中央摆供桌设奠敬天神,桌下设牌位供地神。祭祀的程序:先天神、再地神、三灶君、四门神,五圈神(指牛、羊、马等牲畜圈),六财神,最后为家祖。凡供奉的神位,初一至初三,早晚点灯、蜡,白天燃香不断,谓之“绥香”。祖先灵位前,三餐必供献食品,以示慎终追远,孝道传风。有的在除夕前,在院内或堂屋内用炭块或煤砖垒一个园形火堆,叫“旺火”,寓“招亡”之意,将死去的祖先姓名写在长条白纸上,拌以纸钱烧之门外,作恭请入门揖让之势,请祖先回家过年。除夕夜,合家团聚守岁。

初一黎明前起,抢先挑满水缸,意取“财旺”。平辈间,互相作揖问好,对晚辈、妇女亦道贺,按家族晚辈与长辈行叩头礼。然后去家祠、山神、土地庙,城隍庙进香叩礼。早饭吃猪油包子、啃骨头,意取有油有肉。此日中午,吃韭菜饺子,取“团园”之意;也有人家吃长面,取长寿长福。正月初一,不许

妇女出大门,忌冲财神、喜神,不打扫房屋,不向门外泼水,忌扫掉、泼掉财帛。市郊农村,早饭后,全村牲畜(以骡马为主)披红挂铃,齐集一处,各自骑乘竞赛,取“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意。

大年初一为一年之始,绝不能说不吉祥的语句,避免发生不如意的事,忌说“没”“完”“光”“穷”“苦”等一类的言词,只说“吉祥如意”“恭喜发财”之类的话。老年妇女对此格外重视。

正月初二,走亲访友,名为拜年。首先去舅父、岳父家(谓之骨头主、也叫上亲),之后论亲疏而定。互送礼物,对长辈叩头,平辈间作揖致贺,东家以酒宴待之。居丧免拜年、致哀。

初三日送年,并到祖坟祭奠烧纸。

正月初五,兰州人叫“破五”,或“穷日”。黎明,家家户户清扫垃圾,弃之道旁,叫“送穷”。此日妇女忌用针线。

正月初七,叫“人日”。用面捏成小灯盏,沿口捏12个露牙,表示12个月。置12个棉灯芯。更有精制者捏成“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形状的灯盏,表示十二生肖,灯内注清油,全家老少,依各自属相点灯。凡结有灯花、灯火旺者,一年顺利,叫做“顺心”。

正月初八,叫“八仙日”。男女老幼赶集、赴庙会。善男信女到庙宇焚香礼拜。

正月初九,设供用猪头祭天,谓:“天之生日”。

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古称上元节。意谓第一个月圆之夜。这一天是年的结束日,兰州有“小年大十五”之说,可见对这一天的重视。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各繁华街市皆设灯棚,视如繁星点点、

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各街巷具有灯社以司其事。燃放烟火、爆竹,文化单位还举行“灯谜”活动。入夜,家家户户于大门前燃火堆,大人小孩跳越火堆,意冲去一年不祥之气。

自初三至十六日,郊区各处社火进城。耍狮子、龙灯、旱船、铁芯子、踩高跷。尤以太平鼓与秧歌为其特点,秧歌又叫梅胡词,歌者粉墨登场,演种种故事,名为耍社火。

社火所经之处,遇商号、酒馆,大户人家鸣炮点蜡迎接,社火队即停下,演全套节目。结束时,响以糕点、钱币为报酬。到官府耍社火,为之“给父母官拜年”。

是夜,吃元宵,小孩提灯游玩。

正月十六日,“游百病日”,尤以士庶为著。出门往北行走。俗传此日出门可消百病。居户将年代久远之“神主”,在大门外焚烧,叫“送先人”或“送祖宗”。

立春:旧时以立春为一岁之首,又示农活之始。于立春前一日,官府备大型牛模,叫春牛,迎之于东郊之外,名曰“迎春牛”。用鞭打牛模,谓“打春”,立春又叫打春,起源于此。牵牛之人叫“忙人”,取务农不怠之意。市民倾城而出,观此项仪式。

是日,居民吃死面烙的“春饼”卷凉菜,又叫“咬春”。

二月初二日:俗称“龙抬头”。炒食各色豆子,取爆死锅台上的蛆虫之意。晚饭吃臊子面,臊子汤内必放粉条,谓之“挑龙尾”。祀土神,开山字石药王女小洞,士女拜谒、焚香祈福。

三月初三日:上巳日修禊,市民赴郊外游春,曰“踏青”。兰州有“三月三,换单衫”之俗,表示春暖花开,气候温暖。

寒食节:清明前一天,是日禁火寒食。

清明节:扫墓祭祖,凡新坟,仅奠祭烧纸,叩首而已。旧坟,陷塌者,必取百步以外之土添覆。无损者逢润年添土,意给先人修房子,并以有人添土为有子孙继祖;无人添土者则以断子绝孙饮恨。扫墓时,在坟顶压以纸钱。仕女以楮帛盛于纸囊内赴隍庙焚之,谓之“代包”。除各户外,合族在家祠、家庙

祭奠祖宗。然后按辈份排次而坐,由最小辈份起依次向上辈叩头。凡在此年中添男丁者,此日杀鸡一只或买猪头一个;富者买羊一腔,烹而献于同族共食。如生女,则默不作声。族祭时,妇女不能参加。

三月十三日:白塔山庙会,兰州城万人空巷,朝山进香,游览寺庙。因白塔山原为兰州八景“白塔层峦”之一,寺庙罗列,亭阁悬楼,结构奇特,建筑精巧,尚可登高俯瞰全市。故这今极为热闹。

每年农历三月下旬,四月上旬桃花开放期间,文人雅士,仕女街民,往安宁堡观赏桃花,尤其抗战军兴,北平师范大学改组,迁往兰州安宁后,此风更盛,学者教授、地方名流,诗酒酬唱,相沿成习。

清明前后放风筝。

四月初八日:俗名“四月八”,俗佛节,五泉山在这一日举行盛大庙会。善男信女,进香请愿,接踵而来。山上有摸子泉,妇女乞求得子者,摸得石子为宜男之兆,得瓦则宜女。游人如云,百戏杂耍,酒肆饭馆,应有尽有。延续月余不散。

五月初五日:端午节,本名端午,亦名端阳,重午。此日,家家蒸粘糕,包粽子,饮雄黄酒,给小孩鼻、耳、口、眼边抹雄黄酒,防虫蝇侵袭。小孩的手腕、脚脖子、中指系五色彩线,佩带装有药料的香荷包,女孩头插艾叶。折艾和柳枝插门首,妇女及孩子用艾煎水洗身,用以驱避毒虫。此日绝少见癞蛤蟆,兰州有谚云:“癞蛤蟆避端午”。

六月初六:俗称“六月六”。此日,“曝书籍”“晒皮衣”以防虫蛀。相传唐僧取经回国途中,经书为水所湿,正是此日晒晒。

黎明,去郊野手捧露水洗眼睛,取明亮不瞎眼之意。或游五泉山西龙口沐发,谓能治头痒。

是日为兴隆山庙会,四方居民云集,热闹非凡。

七月初七:古称七巧节,夜间妇女向织女星乞求智巧。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兰州叫“鬼节”。传说此一日,丰都城将屈死、冤死、无子孙后代之鬼放出,到处寻找钱粮费用。除祭祀家祖亡灵外,还得给无主游魂烧纸送钱。在地上画的圈中烧的纸,是给家

族亡灵,不画圈烧的纸,是给游魂的。夜,集于黄河桥畔,观放河灯。

八月初一——初八日:金天观庙会,祭祀阿公。其规模不亚于五泉山的“四月八”浴佛节庙会。在“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壁画长廊中,悬挂各种字画,有的标高价出售,有的炫耀珍藏而不售,其中不乏珍品,亦有赝品充列。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家家蒸月饼,其饼一笼蒸一只,高约一拳,表面有面捏的各种花饰,卷清油、撒姜黄、红曲、苦豆子、白糖,层薄若纸,食时切块,色味具佳。入夜,摆香案于中庭,置瓜果,祀月。供毕,全家分而食之,不与外人。

兰州有“三十晚上杀鞑鞑”之谚,相传元末人民密谋起义,于八月十五,汉族人民将推翻元朝统治的纸条置于月饼中,互为赠送,相约腊月三十日夜举事。

九月九日:重阳节,传此日登皋兰山可以祛灾。文人雅士,饮酒赏菊,赋诗思念远方亲人。

十月一日:兰州有“十月一,送寒衣”之俗,是日居户祭祀祖先,纸箱盛冥冠服烧于坟前,谓之送寒衣。剪一串纸钱挂在大门外,施于无主之鬼使其不入户作祟。

冬至: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冬至节由来已久。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通纬·孝经援神契》:“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为冬至,十一月中,阴极而阳始至,日南至,渐长至也”。在唐朝,将冬至的前一天定为“除夜”,冬至则视为一年之始,予以祝贺,如唐诗有:“冬季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宴。”即其证。延之后世,劳动人民对冬至节甚为重视,尤其是农业丰收之年,人们更要庆贺一番。

冬至早上兰州讲究吃“头肴”,就是以肉丁、豆腐丁、粉条、海带丝、黄花、木耳、及红绿萝卜丁,佐以调料,制作的烩菜,并在此日宴请塾师,感谢一年教读之辛苦。

兰州有“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的谚语。冬至算起,每九天为一九,所以叫冬至为“数九”。“九九消寒图”就是以此制出的。“三九”为兰州地区最

严寒的日子。兰州地区的“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死狗;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八九,精屁股娃娃拍手;九九加一九,犁牛遍地走”。

腊八:十二月初八日,佛教节日,相传为释迦牟尼成道之日。佛寺或佛教徒于该日举行诵经,并效法佛祖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故事,取香谷及果实等炊粥供佛,名“腊八粥”。后演变成汉族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此日吃腊八粥,有庆丰收之意义。

兰州地区,用小米、红枣、豇豆、百合、桃仁、花生米、莲籽、玫瑰花、肉丁一道煮成香甜可口的腊八粥。粥的颜色越花越红越好。在黎明前吃,传说谁家吃得早,来年庄稼成熟得早,并且剩得越多越好,预卜来年吉庆有余。还要将腊八粥抹些许在门扇、窗扇上,遍祭庭户。留下一大碗,待正月给牲口吃。还要将敲碎的冰块,献于门旁、灶前及粪堆上。初七日晚,盛一碗清水放在院子里,令其结冰,腊八清晨,视冰中出现的形状及冰的厚薄来预卜来年庄稼的丰歉。

腊月二十三:一到腊月二十三人们就忙着做过年的准备了,腊月二十三为“祭灶”日。家家户户购买灶糖,传说此日灶君上天謁玉帝,汇报一年中全家善恶之事。灶君前供奉灶饼、灶糖、佳肴,请灶君在玉帝面前多讲好话,不要讲坏话,对联写道:“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并说,请灶君吃灶糖,就是要粘住灶君的口,省得多嘴。还用草扎成马,给草马奉以料豆,麦麸。

主祭人必是男性,谚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祭毕,将草马与灶君画像一道放入灶膛烧掉,请灶君骑马上天。

相传,吕蒙正未达时靠乞讨度日,有一年腊月二十三日没有讨到祭灶之品,在腊月二十四祭的灶。兰州地区也有在腊月二十四日祭灶的,这些人荣引为吕蒙正的后代。

祭灶后,家家户户忙于置办年货,市场非常活跃。门神、灶君、年画为必购之物。灶君画像上画与灶爷并坐的灶奶奶,其下或画金童、玉女,或画八仙庆寿,或画“摇钱树、聚宝盆”,或画鸡、狗等家禽

家畜,但所画什物必须是十八个。所以人们又称灶君为“十八口乱当家”。

次日起,即开始过年的准备。如打扫房屋、粉刷墙壁、贴窗花、拆洗被褥、做新衣服、蒸馍、炸油饅子,杀猪宰羊、购买年货等。

除夕:外出者,于前日赶回,除夕家人必须团聚。年三十过午,家家户户贴春联(兰州人叫“对子”)。门额、窗额贴“三钱子”(又叫“钱马”)。贴了春联,债主在过年期间不再讨债。坐堂债主(来家逼债的)此时立即起身告辞,并连说:“恭喜发财”,再不提讨债的话了。

过去,年三十晚上多娶嫁事,叫“两年不管”、逢凶化吉。

陈设香案,供奉祖先神主,献盛饌。据传,兰州人是明洪武年间由南京迁此,除夕夜男祭祖,女人为了遥祭祖宗站在大门外啼哭。晚,吃臊子面,名为“团圆饭”。去野地给亡灵烧纸化钱。全家老幼穿新衣,成年以上人系红色裤带,取避邪意。集于堂屋,依辈分行跪拜礼,曰“辞岁”。长辈给小辈红包,内装压岁钱。全家痛痛快快玩到过夜,叫做“守岁熬年”,俗称“熬岁数”。

建国前,除夕文官封印,武官封操,戏班封箱……各行各业歇业过年,唯有药铺开一扇门,准备随时售药。

县署以上衙门,除夕收印装在盒内(盒盖上刻有“含金收信”四字),在红纸条上写“封印大吉”四字,贴在印盒开口处。由主管官焚香礼拜后,双手捧交正夫人锁于密室。赏公差一桌酒席。待正月初九日开印办公。

戏班,年三十午演一场“封箱戏”。须大反串,行话叫“反行戏”。丑角妆青衣,旦角妆老生,小生唱红脸。演毕,戏班将供奉的喜神面朝下放入箱内,全体跪拜,封箱。正月初五开箱演戏。

商号须择三、六、九吉日开业,(取“三、六、九必有”之意),鸣炮、张灯,第一个进店的顾主,除盛情招待外,卖货尽量少收钱,以保证成交,取“财神临门”“开门大吉”。

春联:兰州地区讲究贴春联,春联的纸也很讲究。分远丹、朱红、红莲纸等,书写则用泥金、洒金、

涂金、精墨。

春联纸色的区分是:商号、居户用红纸,寺观,用黄纸,灶君的用绿纸。丧家,三年之内,忌用红纸,只用蓝色纸以白粉书“制”字,谓之“守制(孝)三年”,以报乳哺之恩。

春联由一方秀才、举人、进士之类读书人写。请求写春联之家,须送酒、肉之类礼物,作润笔。忌用隔夜陈墨,要现磨墨现写。内容极为丰富,但都与人们的生活环境贴切,如:书香门第写:“诗礼传家训;礼乐旧门庭”“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率真。”之类。

商界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有道财恒足;乘时货自腾。”

官府衙门写道:“四野桑麻不羨河阳花作县;一腔冰雪行看古汴黍生春。”

另有白话春联:“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添一岁;家家户户说说笑笑欢欢喜喜过新年”。

(本文摘自《兰州风物集》)



陇南马社火四题

彭战获

(一) 氐羌遗风马社火

在社火闹春活动中，西和有一种古老独特的社火类型，叫马社火。因化装的人物角色骑在披红挂彩的骡、马、毛驴背上，手操刀枪剑戟和一些别的道具，有序地游走在本村大街小巷和邻村经行路道及一些开阔场地，进行程式化的精彩绝妙表演，故得其名。

据有关资料称，马社火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曾流行过，起源于汉代百戏中的马戏表演，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被民间社火吸纳，遂分化、发展、流行开来。西和仇池山周边的马社火与其它地方的马社火相比，从形式到内容与众不同，带有鲜明的古代氐羌游牧遗风和浓厚的尚武色彩。就其而言，南部山区民众倍加珍爱。周秦以来，这里一直是少数民族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遂以广汉白马氏地的武都道置武都郡（治地今洛峪），重用酋豪氐帅，实行怀柔策略，推行“以农为本”方针，农业得到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马氏崛起，氐杨建立仇池政权，亲晋附魏，曾创下了历史的辉煌。这在古文献里多有记载，尤以张维和李祖恒两部《仇池国志》记载最详备。此后，白马氏民众生活水平已大大超过羌人，逐渐向汉民族融合。宋元时期，西番统辖，蒙元入主，旱涝虫蝗，刀兵四起，生产、经济、文化停滞不前。由于地域封闭，加上特定历史和民族等多种因素，时至新世纪，处于迟发展的太石河崖湾、山青一带，依然古风不减，仍承载演绎着历史的深邃与久远，洋溢着独特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无疑是陇南传统社火园地中的一朵争春斗艳的奇葩。北部长道与礼县接壤的社火中，也时有马社火节目，但规模较少，实在难以与其相提并论。显然，这里是秦先祖惨淡经营、牧马发迹的故地，自然有着秦人“好马及畜”、英勇尚武

的基因，同时长期受内地影响，文化呈多元性。不去细说马社火的传承发展，就各地绚丽多彩的社火活动中，至今仍可见到与其相关联的“探马”“竹马”和“马排子”等古风遗俗。

马社火是仇池故地的纯民间艺术奇葩，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决定了其唯一性。在欢度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在战鼓紧催、鞭炮炸响之际，沉浸在节日海洋里的村民们欢腾了起来，他们身着古装，脸涂油彩，装扮角色，手持道具，骑上披红挂彩的骡马和毛驴，由锣鼓彩旗开道，先绕村慢慢转一圈，然后有组织地沿村道游走，来饰演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戏剧经典人物等，出尽了风头。尤其是那些身披战袍、戏装、背扎靠旗，手持长矛、大刀、弓箭的一个个将士形象，仿佛将人们一下子带进了“车辚辚，马嘒嘒”的征战岁月。他们一旦纵马驰骋，犹如昔日抵御杀伐一般，旌旗在望，鼓角相闻，刀光剑影，势不可挡。社火队每当经过人家门前，主人便鸣放三眼銃或鞭炮，净手焚香，作揖恭迎。村民夹道接送，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人欢马叫，异常热闹。

马社火亦有出村到外村表演的习俗。睦邻友好，人神同乐，祈福纳祥，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临出村前两天，社火会的人分别派探马给所到之村通传信息，让其有所准备。到了预定日子，探马开道先行。社火马不停蹄，一天沿路可走一个村子，也可连走几个村庄，村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筹备烟茶酒肉之类集体盛情款待。有的小村落，还杀猪宰羊，邀至家中做客，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迎送有序，忙而不乱，从而形成了一村要社火，沿途村民扶老携幼都追随看社火的喜庆场面。

马社火离不开膘肥体壮的骡马和毛驴，表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村骡马聚集，抛开社火本

意,无疑还有赛畜一说。表演形式上,往往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为一组,表演同一主题。整村社火队,少则四、五十人上阵,多则过百人参与,群体观念极强,通常有许多小组,皆属自由组合,但归统一指挥调配,不得各自为阵、自由活动。表演内容上,各显神通,有分有合,大多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天官赐福、八仙故事、牛女故事、白蛇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黄河阵、天仙配、杨家将等许多古老题材;同时也有部分现代题材,似乎在与时俱进。可以说,有传统的继承,也有随着时代的大胆创新。

参与马社火的表演者,历来都是男性,有老有少。年长者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年幼者为七、八岁的孩童,都充当相应的角色,当然,更多的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小伙。每逢上街串巷表演,为确保人身安全,老人、孩童骑马,皆有一人牵马拽缰;年轻人风姿潇洒,自当策马扬鞭。人畜一体,单溜儿排成长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格外矫健、热烈、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过去的灯社火,多为晚上表演,白天极少活动,故称“夜社火”或“黑社火”,而马社火则大大不同,往往扬长避短,无需灯光照明设备,白天表演,晚上从不活动。筹备之初,村里事先约集能人召开社火会,并由探马挨门逐户传唤牲口。待正式出马时,一切准备就绪。表演时间,通常从正月初八(有时可提前或推迟日子)开始,到十五灯节结束。先在本村酬神,随后到邻村巡演交流。每天吃罢早饭集体出发,天黑之前返回,从不在外留宿。一轮之中,先近后远,不越村社,平等相待,娱神娱人。一轮轮过,又可从头再轮。正月十五,是马社火表演的最后一天,各村马社火相商共聚,各选精品,争相竞演,将一年一度的马社火掀向了高潮;十里八乡观众云集,陶乐其中,欢声雷动。

马社火巡演的外在形式,多取材于古代战争故事题材,有的在表演时前面还有两位扮角灵官,其中一位是红花脸的王灵官,另一位是黑花脸的赵灵官。人所共知,灵官主要是为民间赐福降祥、祛邪去难、惩恶扬善,这正迎合了全民闹社火的共同心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目的。马社火

到了最后一天,又多出了一位手执杏黄旗,身背封神榜,让众路神仙畏惧、鬼怪胆寒的姜子牙。这虽然不同于黑社火封神,但其最终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西和马社火原始古老,长期封闭传承,很少受到外界多元文化冲击,一直发挥着祀神和娱人的双重作用。文革期间,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曾受到禁止。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又重振雄风,显得更具魅力。

(二)文武有别说探马

在传统社火中,探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联络、组织和维持演出场地秩序。

西和春节社火中,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普遍都有形形色色的探马活动,其渊源当为古代战争中的探马。换言之,战争催生了探马,也派生出社火探马这种生活写真及娱乐形式。不去说大背景下中原大国无数次改朝换代中的刀光剑影,单就地域而言,历史上仇池一带就很少熄过烽烟战火,嬴秦崛起,仇池建国、蜀道鏖兵、西番统辖、蒙元入主等,探马一直驰来驰去,社火以民间娱乐的形式将其艺术地承载至今,可见其史韵悠长、古风不灭,意蕴深厚。

传承到今天的西和探马,因地域不同,大有区别。南乡及东乡部分山村由于长期封闭发展,古老文化基因中多杂仇池氏羌遗风,盛行武探马;北乡及西乡的西汉水流域,风气兼南北,形式杂内地,地域文化成分多元复合,多为文探马。

先说武探马。可骑马也可不骑马,形式多有变化,有些村子如今又俗称马排子。小村耍社火,人员有限,小打小闹,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般由四人或八人组成,难以引人注目;大村耍社火则不然,人多势重铺排大,形式多样图档次,为了营造场里场外气氛,通常由十六人或二、三十人组成,自由灵活,不拘一格。他们头裹白巾,上身着白衬衣(过去全为麻布衫),外套黑马褂,系红腰带,胸肩佩挎大铜铃(驮牲口挂铃),身背四面彩色靠旗,下身着黑裤,脚踏轻便运动鞋(过去全为麻鞋加裹腿),左手持马灯,右手操红穗长麻鞭。不论武探马多寡,自古至今全为一色装束。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改革

开放以来长时期的经济积累，近年来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服饰，但佩铃、马灯、麻鞭仍无大的变化。民间大地艺术社火中的麻鞭与戏剧舞台艺术上的马鞭，同样都是表演道具，但各自取意不一样：前者除代表冷兵器时代西北少数民族古老的神鞭之外，又确指游牧与农耕时代的真实马鞭；后者将生活真实艺术化，以鞭代马。社火出演，武探马负责传唤牲口、迎灯信；若到外村表演，先行到表演场地联络通报，再躬身接社火队进场。入场时，众探马一起跑场、摔麻鞭，并作传统表演，气势逼人，震撼人心（可参拙文《独树一帜马排子》）。其余时间，多数在场上维持秩序，或有的转换角色参与其他演出。

再说文探马。文探马与武探马之间，虽然仅有一字相别，但少了表演内容，韵味迥异。文探马人数少，通常由二人组成，有的甚至只有一人，其效果都一样。若社火出村巡演，前一天或早几天要派一至二人到邻村或更远的村子去联络，好让对方提前有个准备，俗称放马、传信，又雅称文探马。在境内西部，一直盛行传统黑社火，放马全在白天。探马扮演者是社火会反复选定的能言善辩且又擅长于交际实践的人，装束上朴素自然，除极少数以马代步图快当外，大多数则肩挂大铜铃徒步而行，但沿途皆吹着牛角号，径直抵达目的地。铜铃撞银、牛角声声，不绝于耳，村民都晓得是怎么一回事。放马，其实就是“送社火”的前导，探马由近及远，不越村社，一天可走一个自然村，也可连续走两至三个自然村。演出时日预先商定后，即便届时风雪交加，也不能误了演出。当然，若遇重大特殊原因，也可提前派人（原探马）协商、变通，因为从俗之下，人心都是肉长的。

探马除文、武有别之外，有的则文武兼备，优势互补，别有特色。在西和北地与礼县接壤地带的传统社火中，探马扮演者还往往头戴一顶半新毡帽，翻穿羊皮长袄，脸画的活像戏剧舞台上的丑角，似乎在肩负着十万火急的军情，餐风宿露，长途连续骑快马奔波中体力已接近透支，完全是一副古代战争时代的探子模样。

黑社火每晚只限于表演一场，而明社火一天

可连续表演数场。不论是黑社火、明社火，还是武探马、文探马，社火进场前，观众首先看到的必然是探马。另外，在传统纸马表演场上，探马还充当着领舞的角色。

（三）独树一帜马排子

陇南社火传承发展，以组织阵容庞大，表演形式多样，节目数量繁多，曲词博杂见长，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与当地的历史军旅生活、风俗习惯、社会风貌、文化观念、艺术情趣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好些还是昔日民众生活的样相写真，集体智慧与艺术才能的完美结晶。马排子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之一。

“会看了看门道，不会看了看热闹。”

何谓马排子？就是挑选一批精壮小伙子扮成古代武士、探马模样，人人身背数杆靠旗，肩挂一串马项铜铃，左手持马灯，右手举马鞭，脚登缨穗麻鞋，以此进行联络、组织、维持秩序及各类表演活动。靠旗，象征将士出征；挂铃，象征胯下战马；马鞭，又叫麻鞭，既可作催马之鞭，又可当兵器使用，功用多多。人马合一，艺术地再现昔日征战生旅，暗含千军万马，故此得名。

马排子少则十六人，多则三、五十人不等，视其社火队人员多寡而定，古老文化意识强烈，动作粗犷豪放、古拙质朴。它一直遵循一定的表演程式，甚至非常原始，似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洁身自爱，很少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与冲击。西和境内的马元、兴隆、何坝、石峡、十里、洛峪、六巷等地曾多有流行，尤以石峡、十里的马排子表演更具原始特色。

闹马排子社火，选择的是农民一年中最清闲、温馨、喜庆祥和的正月间，通常在初八开始，也有因特殊情况在初三或十四开始的，但元宵灯节是不变的高潮时期。因为是古老传承，轻车熟道，筹装、排练用不了很多时日。当然，是与其它社火形式并存，并不是孤立的。出灯之前，炮手持三眼銃首先登场。第一声炮响，演出人员上脸着装，检查道具。第二声炮响，演出人员在村中固定场地集合。第三声炮响，马排子列队飞跑到灯官家，跪请灯官出场。这灯官就像当今电视台的晚会总策划

人一般无二,从筹办到倒灯一直由他全权主持。灯官纯属是德能兼备者,由公众民主推选,并物色几个头人分工督办实施。灯官接受特殊邀请后,便用糖、茶、烟、酒简单酬慰马排子演出人员。接着,在灯官家院里表演掌灯舞《送财》《晋状元》,灯官“打茬”说一些吉祥祝福辞后,便宣布正式出灯。天天如此,古风使然,俗规不倒。

黑社火出行,最看重的是摆灯。一般少有马排子的社火,龙灯、狮灯、老虎灯、船灯作先行,牌灯、掌灯、手提灯和其它多种动物灯依序殿其后。有了马排子角色,与其它社火形式不同,饰演者皆手提一式传统马灯,不撑掌灯,不提手灯,一直行进在社火队的最前面。摆灯要匀。近看灯火辉煌,星星点点,远望犹如贴地蠕动的一架火龙。鼓乐、灯火是声势,也是威势。灯火越多,越能扬威毗邻。特别是摆灯出行邻村或十五晚上集体圆庄时,更为壮观。各村相赛,茫茫灯海,别有看头。尤其那一盏盏别致的马灯,更是一道风景中的靓丽风景。

接近演出场地,马排子人员先飞奔入场通报,再返身恭迎社火进场,在“啾啾噜噜”不绝于耳的牛角号(俗称扁噜)声中,社火即行拉开序幕。首先是在平展的场地里“走营”和“跑营”。也就是说,先用马排子、龙、狮、虎等打场子,扩展演出场地,然后由掌灯队和手提灯队走花场、马排子跑旗,分别构造各种队形图案。此时的马排子最引人注目:步调一致,装束统一,彩旗飘飘,挂铃银铛,马灯闪闪,令人顿生许多遐想。他们开始紧跟花灯队游走,随即游离于外围,不断变换着队形路线,先慢后快,逐渐提速,绕着走花场的花灯队猛跑。如此持续十分钟左右,马排子随龙狮悄然退出,地上便留下了许多有名堂的“营盘”和“阵势”。与舞龙一样,传统的有“跑四门”“蛇抱蛋”“九道弯”“七星阵”“八卦阵”“双套环”“梅花阵”“龙摆尾”“8字阵”“剪子股”等,多注重营造平衡对称图案,力求达到完美无缺。这些,在稍后的各类表演中,亦有不同的反映。

跑营完毕,紧接着的是麻鞭舞表演。麻鞭,俗称神鞭,是昔日少数民族中比较原始的兵器,使起来出神入化,凌厉无比,只可惜原有套路多已失

传。前人将神鞭技艺择其搬入娱神社火,成了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古老军旅舞蹈艺术。仅存于社火节目中的麻鞭舞,显然演绎的是将士出征中策马扬鞭、冲锋陷阵的内容,气势豪放、粗犷强横,充满雄气和霸气。要知道,仇池历史上战事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武帝征讨、魏蜀争霸、氐杨雄踞、吴玠和吴玠抗金、兵匪作乱等,留给当地民众的印象太深刻了。这在长期封闭又迟发展的山区,神鞭以社火形式得以保留传承,也就不足为怪了。麻鞭舞又俗称“抡麻鞭”,是社火的开场舞。纯一色的马排子演员上场,个个手执短柄红缨麻鞭,显得气宇轩昂、英武干练。他们走踉腾挪,不时转换姿态,缩几个花子,连甩几个响鞭。一时间,场地上马排子人影晃动,鞭花翻飞,让人眼花缭乱。串串挂铃响,阵阵麻鞭声,再加上场上观众此起彼伏的喝彩声,相互交织,大有震耳欲聋之感。

除此,马排子演员还要演唱许多曲子。其中《点兵曲》是必不可少的。

(四)生动活泼跑竹马

竹马,又叫纸马、跑竹马和竹马灯,是陇南春节民间社火中的主要舞蹈之一。自古以来,竹马通常有三种类型:一是儿童游戏中当马骑的竹竿,典型的式样是一根杆子,一端有马头模型,有时另一端装轮子,孩童跨立上面,假作骑马;二是南方农村耘稻时所用的一种农具,即薹马,土人呼之竹马,与儿童戏乘者名同而实异;三是用竹篾扎成的一种道具,用于民间舞蹈竹马灯,也是本文要谈及的重点所在。

马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年头岁尾家家户户要敬马王爷,婚嫁习俗中姑娘出嫁要骑马,殡葬礼仪中给去世的男性糊烧纸马,点坟迁葬时更是少不了马蹄之类,甚至在好些封建迷信活动中也离不开大小繁杂的纸马。单就闹社火来说,除古老传承的马社火外,还有独具魅力的马排子、探马和纸马形式,无不承载着历史的深邃与久远,昭示着往昔马文化的多彩与辉煌,寄寓了地域民众乐在其中的微妙情感。

跑竹马是民间文艺园地里奇葩。远在宋代,社火中就已经有了竹马表演,仿真造型,节目精彩,

有一定的娱乐性和欣赏价值。竹马表演遍布全国，并不是哪一地区民众创造的艺术“专利”。综合目前陇南各地的装饰及表演套式来看，表演者多扮成古代武将，有男亦有女，有老亦有少。据文献资料记载，溯源竹马，其一是由常年经营马群的牧马人、做生意的马贩子、还有爱马如命的耍马人策划创意的，由于他们对马的情感深厚，又不能骑着真马上场表演，故而特意创意制作了马的道具以寄其情；其二是源自于古代战争生活，在男权社会里，男子身强力壮，策马驰骋沙场，往往是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主要力量，而女性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亦有许许多多像佘菜花、穆桂英、花木兰、孙二娘、扈三娘一样的巾帼英雄，哪一个不如男子？甚至让男子也感到自愧不如；其三是男婚女嫁风俗中，男骑马、女坐轿，是依据男子骑马、跑马等一系列形象而创意的，同时又与儿童游戏中竹马相糅合。早期参与表演的全为男性，后来女性角色逐渐增多，使得这一较为广泛的民间文艺形式，显得生活气息更加浓厚，表演上更加活泼自然，优雅可观。

陇南竹马舞盛行于明末清初。目前，各地竹马的造形与表演，有共性，也有个性。

西和竹马的造型淳朴可爱，在追求写实的同时，又体现出了民间艺术上粗犷和豪放的一面。竹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马头与马的前半身为一部分，后半身连马尾巴为一部分。具体制作过程：早期先用泥制马头与马脖子模具裱糊纸壳，程序较为复杂；现在相对简易，一般多用竹篾、麦秆扎成骨架，然后用麻纸、彩纸裱糊，并细致点缀装饰而成。在糊裱马头、马脖子和马尾巴的外表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时也用绫纱或平绒裱裹，既好看又耐损。前马身外表在马头与马脖子连接处留有适当空隙，尾巴与后马身组合时显得灵活，便于马头与马尾能自如活动。前后马身间是用木藤条或竹片绑制成一个半圆形骨架，外表用纸裱糊数层，留有与骑马人拴绑的拴扣和绑绳。装饰上还适当用彩纸、缕麻、亚麻、颜料等，多属就地取材加工，分别制成较为逼真的马鬃、笼头、马尾、挂铃等道具。竹马分青、红、白多种。徽县城乡竹马的制作

别有特色，先把竹子削成粗细不一的篾条，按传统造型搭架编织成马的骨架，然后精装细裱而成。一匹纸马制作完成，前前后后得花费四、五天时间。并且，年年在不断地制作，年年也在不断地焚毁，一年是一年，从来不保留。

西和跑竹马者多数为少年儿童，少则四人，多则十二人，很少有一人独自表演的。传统社火里，他们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穿青棉袄，系有红腰带，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体，与竹马色彩搭配讲求和谐统一，又非常醒目提神。现在服饰多变，不拘一格。表演时，将马道具绑在跑竹马人的腰部，圆圈周围用彩色布围遮以掩人腿，左手拉动马的缰绳，右手持马鞭，在引马少年（也称探马）的诱导下进行统一表演。跑竹马，通常分碎步小跑和碎步快行，动作有马头高竖、摇头、甩尾、起卧、咬蚕等，尤其是高竖头颅似马嘶长空，甩尾巴似御敌回击的表演，更是生动传神。但总的形式还是以走场、跑场为主。另外，早期跑竹马跟舞龙有异工同曲之妙，除表演上有古老的点兵、放野马、过五关、五马归槽程式，还有“双进门”“绕8字”“十字步”“丁字步”“剪子股”“跑圆场”等多种传统的跑场套路，令人浮想联翩。竹马中的引马少年必须有武术根底、精干敏捷，要完成空翻、撇叉、打二踢脚、竖倒立行等许多高难度动作，有些还要表演一、二路软拳，以便吸引观众，博取彩声。

跑竹马这种民间武社火形式，不论是明社火还是黑社火中都可表演，场面十分壮观。依较为古老的传统表演方式要求，竹马队一般由14人组成，除前面一个引马人和后边一个马尾人外，剩下的12匹竹马皆象征十二生肖，也表现为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跑马者伴随着丁丁当当铜铃声，不但有跑马表演，而且还要表演跑马，并进行多种演唱。只可惜这种根深蒂固、牢牢维系和凝聚陇南民众精神的社火形式，现在显得越来越单调，甚至在许多社火场上消失了。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在西和社火汇演场地上，笔者在评委席上又看到了这一传承盛况。

（作者单位：西和县史志办公室）

吉鸿昌就义见证人林少文的身前身后事

张 慧

1934年11月24日，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1895—1934）被蒋介石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在刑场上，吉鸿昌以树枝代笔，以雪地为纸，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他的就义过程鲜为人知，后来由作为“共产党疑犯”陪绑杀场的林少文披露于世，而这首就义诗也是由林少文转述才得以存留于世。

追随革命

林少文，原名林琪，1894年生，甘肃省定西县城小北街人。早年就读于山东烟台海军学校，即将毕业，他的母亲把他叫回老家，为他娶妻成亲，以此作为羁绊。返里后，曾任大城小学军事科目教师。1926年6月下旬，冯玉祥部十八师第三十六混成旅旅长吉鸿昌率部开进甘肃，军中有个军官是其当年同窗，偶遇林少文，撺掇他离家从军。在兰州，林少文又另娶一妻，名胡云英，从小读书，识文断字。感于吉鸿昌的豪侠仗义、爱国爱民的品格，林少文介绍妻妹、毕业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胡兰英（后改名胡洪霞）与吉鸿昌结为伴侣。林少文在吉鸿昌麾下先后担任上校副官、机要秘书等职。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林少文随吉鸿昌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陇海路东征。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林任职宁夏邮电局局长。后来吉鸿昌为了避嫌，介绍林少文到孙连仲担任主席的青海省，当过循化县一个时期县长。

1930年，林少文随吉鸿昌南下，部队经过定西，驻扎县城一夜，林少文曾回家看望过家人，并留下30块银元。冯、阎、蒋中原大战后，吉鸿昌所部为蒋收编，吉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并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吉鸿昌拒绝“剿共”，有心起义，被蒋介石撤销军职，迫令以考察军事名义出国。

被捕入狱

1930年，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买下一座小红楼，林、吉两家从兰州迁住天津，同住该小楼。因吉鸿昌忙于军事，顾不了家，家庭事务概由林少文料理。

1932年2月，吉鸿昌回国经上海回到天津，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津后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吉鸿昌的行动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探知，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决意暗杀吉鸿昌。10月，为避开特务盯梢，吉鸿昌让林少文出面，以林的名义租住国民饭店38号房间，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将军正与任应岐、李干三及从南京来的刘少南以打牌作掩护谋划抗日工作，突遭军统特务刺杀，受伤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闻得吉鸿昌被捕，林少文妻胡云英在事发当晚将家中材料全部焚烧。第二天林少文归来，听妻说文件已销毁，心始稍安。并说：“我已探知吉鸿昌被关押何处，可去看望。”即与吉鸿昌夫人胡洪霞、女儿等前往关押吉鸿昌的医院探望。当时吉鸿昌佯装不认识妻女，法租界工部局放回了胡洪霞母女，将林少文扣留逮捕。

吉鸿昌与林少文等被捕后，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1

月14日,吉、任、李、林等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押往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林少文被武装军警押往北平,投入北平陆军监狱。在狱中,林少文遭到了多次严刑拷问,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供出吉鸿昌与天津中共组织交往的情况。

陪绑杀场

1934年11月24日中午1点30分,吉鸿昌、任应岐被押出阴暗潮湿的牢房,从容地向东场院刑场缓缓走去。林少文也被带到刑场。其间,吉鸿昌告诉林少文:你可能是“陪绑”,他们不会杀你。吉向林简单交代了妻女今后的生活问题,并囑有一份遗书将来带给胡洪霞。

时值北方大雪纷飞,大地白雪覆盖。站立在雪地中的吉鸿昌将军,面对刽子手手中黑洞洞的枪口,泰然自若,双目冷峻地凝视着远方。他信手捡起一根树枝,以树作笔,飞快地在雪地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写完,吉鸿昌喝令行刑兵给他搬了一把椅子,毫无惧色地坐着面对敌人的枪口。枪声响处,吉鸿昌、任应岐英勇就义。林少文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悲壮的场面,并将吉鸿昌的诗默记于心。

吉鸿昌将军就义后,林少文被移送到南京宪兵三团关押。在押期间受尽酷刑,得了肺病。主管案件的军官是他在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没查出他是共产党,加之其妻胡云英四处托人花钱,得以保释出狱。回到天津,他找到胡洪霞,向她讲述了吉鸿昌就义前后的详细情况,同时将吉鸿昌的遗书和记录下的就义诗交给了胡洪霞。

林少文出狱后,身体已是很虚弱,1942年,病逝于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仁和里24号,享年48岁。(吉鸿昌牺牲后,胡洪霞将法租界霞飞路小红楼抵押出去,换回8万元钱,赎回了吉的遗体,吉、林两家搬到此处。)

吉鸿昌将军的女儿、天津市政协委员吉瑞芝

忆及父亲就义诗的保留经过时说:“父亲被捕后,法国工部局派人来到了我家,将母亲胡洪霞、姨父林少文和我一起带进了法国工部局。在那里,母亲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许多人一直有疑问:父亲临刑前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是怎么让我们知道的?而且父亲在刑场所写的那首诗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与父亲关押期间一直在一起,而且就在敌人枪杀父亲的时候也一同陪绑在刑场的姨父林少文后来讲述的,所以父亲的许多事情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姨父是我父亲英勇就义的见证人。”(杭州《都市快报》2005年11月23日《民国七大案》)

共党“嫌疑”?

林少文去世后,妻子儿女备受艰辛,靠胡云英给书店送书、缝补衣服、干杂活等度日。1948年11月,解放军四野入关,胡云英到部队当了文化教员,后随解放大军曾到广州等地。解放后,天津军管会贴出布告寻找吉鸿昌的亲属,胡洪霞带着吉鸿昌的遗书和就义诗找到军管会。烈士亲属身份得到确认,政府每月供给七袋面粉供养全家。林少文的亲属也受到了政府的亲切关怀,胡云英从部队转到地方,安排到河北省师范附小从事教育工作,子女随母在该校读书。

然而,林少文是否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一直是一件悬案。当年吉鸿昌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津后一直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林少文是否入党,但是作为吉鸿昌的“连襟”、“管家”和曾经的部下,林少文参与了党的地下工作乃是不争的事实。1932年吉鸿昌回到天津后,吉、林两家共住的天津法租界的霞飞路小红楼,成为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吉鸿昌毁家纾难,四处筹措经费购置武器,曾一次交党费六万银元,为抗日前线购买武器,林少文就是购买、运送武器的办理人。吉鸿昌在这栋小楼里创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小红楼三楼设秘密印刷室,出版《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这些活动都有中共党人参与,地下党的陈伯达、南汉宸、朱其文、宣侠父等人就在三楼办公,由吉鸿昌出经费供给。“管家”身份的林

少文是小红楼的实际主人，为地下党从事秘密联络、传递情报、交通往来和后勤服务等工作。林少文与陈伯达接触最多，陈除了办公，就住在小红楼内，家人都叫陈的外号“白毛狸”。文革时期，陈伯达接见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委员的林少文次子林启予时说：“你爸爸还有一个名字。”（林启予《尘封的岁月》）

国民党是以“共党嫌疑”名义扣留林少文的，在敌人的酷刑之下，他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未供出与吉鸿昌共事的其他中共党员的情况。据其妻胡云英回忆，在国民党特务盯梢吉鸿昌很紧时，林少文曾嘱咐家人：“若我们有事，把我的东西赶快烧掉。”因此在吉鸿昌被捕当晚，胡云英烧毁了林少文的全部文件材料。胡云英说：“材料多得很，烧的时候呛得很凶。”

从林少文的种种行迹看，当时林少文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在敌人面前他不可能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不是，他为党保守了秘密，保护了为抗日事业冒险工作的革命者。

上世纪70年代末，林少文家属曾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落实林少文地下工作经历，可惜未能如愿。林少文的儿媳沈鸿芬曾请求吉鸿昌夫人胡洪霞给予证明，但胡洪霞却不给证明。此时胡洪霞疑为精神出现问题，连自己儿子也不相认了。

家世及后事

林少文祖居定西县城小北街小北巷，本名林琪，字少文。他的父辈有弟兄四人：作栋，作祯，作柱，作相。少文是作栋唯一的儿子。他的原配妻子是景家店“中院里”马姓之女。少文与马氏生有二女，林少文离家当兵时，长女14岁，次女12岁。

少文与后妻胡云英生三子一女，长子林友予，次子林启予，三子林德予；女儿名不详。次子林启予出生于1936年，1952年至1958年就读于天津一中，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动力系发电专业，分配到天津市电业局发电设备检修大队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担任天津市工代会负责人、市革委会常委、天铁冶金集团六九八五工程指挥部副主任、天津市地震局局长等职。文革结束后，因受“四

人帮”牵连，入狱十年。出狱后下海经商，现赋闲在家。

据定西老家人讲述，林少文当兵后，家人曾听闻其在兰州娶了二房，详情一概不晓。林少文随吉鸿昌南下时，途经定西，曾来家中一次。这次南下，他带了续娶的胡云英和与其所生女儿同来定西老家，但没有让原配妻子马氏见面。马氏仅在厨房门缝里看到丈夫的身影，伤心悲泣。林少文与家人见面叙谈约2小时，给家中留下30块银元。当晚住“春货隆”客栈，又单独将四叔（作相）叫到客栈面谈。第二天清晨，族人往客栈再去看望，部队已开拔东去，从此一去不归。

林少文离甘后，通过关系将前来投靠的族弟林琏安排到河南某兵工厂工作数年，随后即与老家失去联系。老家人按照当地习俗，安排其侄林贵清过继为子。1952年，定西老家人与林少文在天津的后人取得联系，始知少文在天津还有后嗣。而令人惊讶的是，林少文对老家有发妻女儿一事始终守口如瓶，胡云英直到解放后才从老家人口中得知，用她的话说就是：“他把我骗了一辈子！”此中隐情，只有少文知道。

林少文离开家乡后，定西老家人一直对他惦念于心。1949年8月14日，定西解放，城中百姓争相送水送茶，迎接解放大军。忽一日，出门送水的林四爷（作相）兴高采烈地跑回家中，告诉家人：“咱家老大林琪还在，改名林彪了！”然而后来证实，此林彪非彼林琪，空欢喜了一场。

据定西老家人讲，1952年，林少文的族弟林琏时在会宁银行工作，在那里偶遇一老干部，告诉林琏：林少文已逝世，家属在天津。（此说的存疑之处是：会宁属边地僻壤，巧遇知晓林少文及其家人情形的人，确属巧之又巧，几无可能。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林琏在某报刊或书籍上看到关于吉鸿昌的文章，即向天津有关部门写信，获得了关于林少文的信息。此说较为可信。）得此消息，林琏赶忙前往陕西武功，告诉正在西北农学院学习的侄子林贵清，二人商议由林琏专程前往天津，找到了少文妻子及儿女，胡云英母子也才知道了少文老家的情况，十分惊诧。当时胡云英儿女较多，生活困

难,林琏回来后与林贵清二人商议,分别从各自微薄的工资中每月轮流寄 15 元,供林少文的次子林启予读书,直至其高中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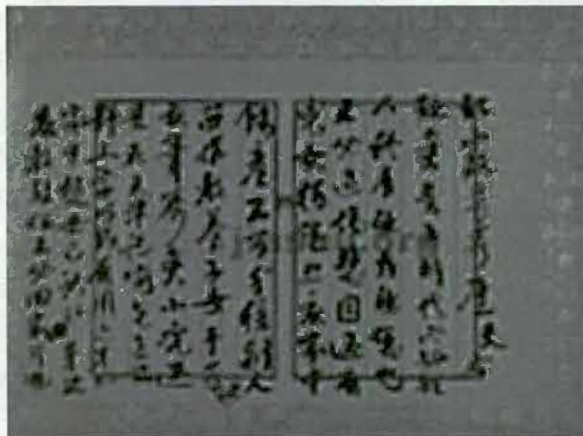
1974 年,在空军服役的林少文长子林友予来甘出差,曾来定西县城小北街的老家。囿于当时的特殊时代和他的特殊身份,恐有株连(也不排除其中有其他隐情),未便长时逗留,甚至连五叔林琏也未敢见面(时林琏因有在国民党时期从事无线电广播工作经历,下放生产队劳动),只与族兄林贵清在西厦房见面叙谈不长时间,留下了天津的地址。然后由林贵清的外甥女王菱带领,在定西城

转了一圈即匆匆离去。林贵清之弟林正清文革期间曾到天津,当时正值天津武斗,形势很乱,看望少文妻子儿女的愿望落空。其后天津、定西两家族人续有往来。1977 年,胡云英在天津去世,丧事比较隆重。1978 年,林贵清之子林铭德在军中当兵,到天津寻访林少文家属,见到林启予的爱人沈鸿芬。沈鸿芬告诉林铭德:“他(启予)已 5 天没回家了,情况不好。”当时家人以为是胡云英丧事过于隆重,组织要追查,未料到是林启予文革时期与“四人帮”牵连事发,遭到逮捕。

(作者单位: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吉鸿昌与同僚合影



试论文县白马人 与古代仇池氏人的历史渊源

魏泽民

现代白马人主要生活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铁楼乡白马河流域和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境内,人口约 14000 人。陇南白马人主要分布于文县铁楼乡以及石鸡坝乡的岷堡沟等地。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家将白马人划入藏族,但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白马人属于古代西部仇池氏人的后裔,其民俗风情有别于藏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平武学者曾维益先生经过几十年地不懈研究,撰写了《火溪沟社会历史调查》《龙安土司》等学术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现代白马人与古代的仇池氏族的关系,证明白马人的族源并非藏族,而是古代仇池氏族的后裔。这一学术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曾先生也因此应邀登上了北大讲坛。

氏羌是中国古代西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之一,生产力水平较高,曾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演绎过一幕幕历史活剧,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仇池氏杨氏曾创建了前、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几个氏族割据政权,并与中原汉族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发生过战争和朝贡关系,有过密切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促进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虽然崔鸿编写的《十六国春秋》中没写进白马氏杨政权,但白马氏杨的建国活动散见于其他历史著作,也保存在今日陇南人民特别是陇南文县白马人众多的民俗事项中。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发展水平,陇南文县白马人基本保留了其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蕴涵着深厚的白马历史文化内涵,正如陇南学者焦红原先生所说:“陇南五国,尤其是白马氏政权,他们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弃婴,却是陇南历史的长子,支撑起了陇南历史文化的半壁江山”。

一、从历史记载看仇池氏羌与文县白马人之

间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渊源、地理关系还是传统习俗方面,还是在血缘关系方面,陇南文县白马人与古代仇池白马氏族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早在商周时期,氏羌就开始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春秋战国时期,氏羌部落就在西汉水、白龙江和岷江流域,也即现在的甘肃东南地区及其邻近的陕西西南、四川西北一带繁衍生息,成为西戎别种之一,其部落繁多,各有称号,互不统属,其中冉駹以西,白马氏最大。在众多的古籍记载中,“氏”总是和“白马”紧密相连,司马迁的《史记》在介绍西南夷情况时就说“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汉书·括地志》也有关于“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氏”一类的记述。《魏略·西戎传》曰:“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其自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同时,历史上往往氏羌并称,即使生活在魏晋南北朝当时的人,也总搞不清仇池氏杨氏属氏还是属羌,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安抚和怀柔仇池氏杨氏而封爵的三枚仇池金印,北魏所赐金印印文是“魏归义氏侯”,晋朝所赐两枚金印,则印文分别是“晋归义氏王”和“晋归义羌侯”,其实,严格地讲,氏羌是两个民族,这个目前已有定论,这里不再赘述。《汉书·武帝纪》和《汉书·地理志》都记载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平西南夷”后,在“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当时的武都郡治在洛谷(今西和县洛峪镇),下辖武都(与郡同治)、上禄(治今西和县六巷)、故道(治今两当杨店)、河池(治今徽县伏家镇)、平洛(治今康县平洛)、沮(治今陕西略阳县东 80 里)、嘉陵道(治今礼县雷坝一带)、循成道(治今成县覃河附近)、下辨道(治今成县广化)等 6 县 3 道共 9 个县级行政区划。《武阶备志·卷三·

郡县治城邑考》说：“武都故城在成县西，古白马氏所居，汉初置，武都之郡治也。东汉移郡治下辨，以县属之，晋仍旧。太和二年，杨定请置仇池郡，遂没于氐。魏克仇池，置镇，改南秦州，又改渠州。正始初，为南秦州，即《魏书》所谓骆谷城也。”《南齐书·卷五十九》也记载：“氐杨氏……出略阳，汉世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氐王是也。晋世有杨茂搜……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竦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者，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这些材料都说明，仇池地区在汉魏南北朝时期，都是氐人生活的中心地区，他们在此凭借仇池险要的地理形势和较为发达的经济，与中原政权之间周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南先后出现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四个氐人政权和宕昌羌人政权。《魏书·氐传》云：东汉建安年间，“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为号。”又曰：仇池“四面斗绝，高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地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茂搜。”《晋书·惠帝纪》和《宋史·氐胡传》记载：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秋8月，秦、雍氐羌皆反，推氐帅齐万年假号称帝，围攻泾阳。十二月，氐酋杨茂搜避齐万年之乱，自略阳（今天天水市秦安县）率部落四千余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多归之”（《宋书·氐胡传》），在仇池建立白马氏族政权，此即“前仇池国”。前仇池国凭借险要地势，与东晋和前赵周旋，求得自立。后因内讧，至前秦建元七年（公元317年），仇池国被另一强大的氐人政权前秦所灭，遂“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至公元387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大败，氐酋杨定逃回陇右，招集氐汉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重建仇池政权于历城（今西和县城北），此即“后仇池国”。后仇池国在东晋、后秦、西秦三国夹缝中采取灵活战术，称臣立国，南朝刘宋时期，杨

盛曾被封为大将军、武都王，国土面积东至汉中，西至平武，北至上邽，强盛一时，到公元442年被刘宋攻灭，杨难当投降北魏。前后仇池国前后传国7代9主，存续134年。公元443年12月，北魏击败刘宋，攻取仇池，派氐酋杨宝宗守洛谷（今西和县洛峪镇），4月，氐人反叛，立白马氏酋杨文德为仇池公，与刘宋交好，被刘宋封为武都国王。北魏进攻，杨文德逃跑，杨元和留守，至刘宋元徽四年杨文度兵败亡国。此后，杨文弘退守武兴，自称武兴王，建立武兴国，但萧齐改封杨后起为武兴王，杨文弘向萧齐求和，武兴国在北魏和萧齐中间艰难立国，到公元553年被西魏灭亡。公元477年被北魏封为阴平公、葭芦镇王，建立阴平国，到公元553年被梁攻灭。这样，白马氏人在北方和中原政权的军事打压下，在白马氏杨氏内部的纷争中，一步步地从仇池中心地带向南撤离，散落在陇南、川北的深山巨谷之中，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二、从民俗的角度看文县白马人与古代仇池氐人的关系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风尚和习俗，是一种动态的生活文化，具有传承性、变异性和历史性。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民间风俗、习惯、信仰和各种口传文学，诸如神话、故事、符篆、谜语、谚语、祷词、歌谣、歌曲、迷信以及节日典礼、传统游戏、艺术、手工艺等。

深藏于巴蜀山地的白马民俗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旅游文化景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好地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

（一）民族服饰

衣食住行衣为首。服饰是民俗文化的最重要的体现，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白马人的民族服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杜甫的“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兜裘”（《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也是写仇池氐羌民俗服饰的诗句，反映了唐代仇池地区生活的氐羌民族服饰特征。但后世

氏羌民族服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氏人的服饰既不同于藏族服饰,也不同于羌族服饰。氏人“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而羌人则“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氏族妇女皆“编发”,而羌族妇女则“被发覆面”,体现了游牧民族羌与农耕民族氏不同的服饰文化。在后来的民族战乱中,氏人被迫南迁,退居于甘、陕、川交界的深山之中,过上了半耕半牧的生活,其服饰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夏天多穿凉快单薄的麻布或棉布服装、草鞋、麻鞋等,冬天多穿戴厚重保暖的羊毛布衣服、番鞋等。白马人妇女的鞋一般为番鞋和绣花鞋,劳动时也穿麻鞋或草鞋。穿绣花鞋时小腿上一般要缠裹腿(缠子)。目前白马人的服饰特征基本保留了古代氏族服饰“长身小袖皮靴”的基本样式,但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与发展过程中,也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目前丰富多彩的白马人服饰文化。传统的白马民族服饰的古老样式,服饰的主体面料一般为白马人自制的麻布或羊毛织物(褐子),局部的图案装饰则用少量的丝绸以及刺绣,装饰工艺细致精美,图案的格式和内容相对固定,并代表着特殊的文化含义,体现了明快、古朴、单纯的民族特征。白马妇女的服饰相对丰富多样,不仅种类较多,包括帽子、鱼骨牌头饰、百褶衣、短衫、坎肩、腰带、绣花鞋以及荷包、首饰、胸牌等其他佩饰,而且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装饰图案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结构简单、装饰简洁、色彩朴素的男子服饰形成鲜明对比。白马妇女传统服饰的色彩以白、黑、红为基本色彩,陇南文县白马民族服饰,无论是常服还是舞服(民族傩舞“池哥昼”和“麻昼”服饰)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二)崇尚的色彩

文县白马人崇尚白色,大都敬奉白马神,好多部落以白马为图腾。白马人把白色东西当作吉祥物,禁忌坐在白石头上,禁忌猎杀白色的动物,还饲养白狗、白鸡、白鸭作镇宅之宝。白马人认为红色能够辟邪降福。红色象征太阳、火、鲜血,代表着生命和正义,身上佩戴红腰带等红色饰物,意味着神灵附体,保佑平安。黑色:黑色在白马人女性服

饰中应用的也比较多,它总是与庄重、高贵、财富、联系在一起,老年妇女喜欢用黑色来装饰自己,显示沉稳的一面。

仇池人也崇尚白色,也有对“马王爷”的崇拜,还避白石头,认为那是白虎。仇池人也喜欢红色,认为红色辟邪、喜庆,过喜事都喜欢贴红对联;对黑色有敬畏感,在很庄重的场合也用黑色。

(三)生活方式

白马人世世代代在大山深处耕种劳作,过去所穿衣服全靠自织自缝,过着自耕农的生活,食物以五谷杂粮为主,辅以狩猎,崇拜山神,这与《华阳国志》关于氏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的记载,《魏略·西戎传》关于氏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的记载,《南史·夷貊传》关于氏人“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绸绢布漆蜡椒等”的记载是一致的。史籍所记仇池氏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当代白马人的生活状况基本一致,发达的农耕文化为氏人服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文化基础。

仇池人的食物也以五谷杂粮为主,偶尔狩猎,也敬山神;大多数白马人也和汉族人一样,逢年过节到庙里烧香敬神,在自己的家里供奉祖先牌位。

宴会宾客时,白马人讲究“十大碗”,而仇池地区的居民自古就讲究用“十全”来宴会宾客,这也与白马人的饮食风俗不谋而合。

(四)宗教信仰

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神和祖先神,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崇拜山神,也崇拜一切自然物,如大树、雄鸡等,而仇池人也有类似的泛神崇拜、自然崇拜。他们不仅拜大树,也拜巨石。白马人最崇信的是“叶西纳蒙”(意即“白马老爷”),而先代仇池人也祭拜“马王爷”,民间还有“马王爷三只眼”的说法。仇池人崇拜马,引亲时新媳妇要骑大马,人死后还要烧纸马,社火中有马社火,神庙里有马王爷,这一点也与白马人有相似之处。仇池人也崇拜大公鸡,祭土还愿都要用大公鸡,相信大公鸡有威慑魔鬼邪道的作用,甚至用雄鸡来“引魂”、“招魂”,这与白马人对大白公鸡的崇拜和信仰也如出一辙,颇有相似之处。

(五) 葬俗习俗

现在,陇南各地都有“二次葬”的习俗,这主要是因为陇南农村大都采用土葬法,如果死者的生辰八字与死亡时间、墓地的山形地理往往不合局。但人死不能长期停柩不葬,于是采用了先寄葬,等大利之时再行正式安葬,于是有了“二次葬”。寄葬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诸如穿堂——在某地挖一墓穴,将棺材穿进去,墓口用土堵严实即可;天井——在平地打一比棺材略大的竖井,下面放上两根楞木,上面敷上麦草,再用土填埋即可;明寄——将棺材放在某僻背之地,周围用土坯子围住,顶上用泥瓦苫好即可;架干丧——将棺材存放在悬崖窑窝里,用柴草堵住窑窝口,也即悬棺葬。

对“缆桥墓葬群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古代氐人也是采用“土葬”葬俗,但葬式很奇特,多采用单人直肢葬,也有部分为肢解葬,这与《淮南子·地形训》关于“西方有形残之尸”的记载是一致的。墓穴内有专门放置的白石、土陶和铜器,也有陪葬的羊骨,说明氐人崇拜白石,而今的文县白马人安葬时也有在墓穴中放置五色粮食、五色石子和木马蹄的习俗,这也与古代氐人的葬俗有相似之处。

(六) 民间娱乐

现代文县白马人的民间娱乐活动,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凡是大型娱乐活动,诸如池哥昼、秋昼、麻昼、甘昼、阿里改昼、池母写勒、十二相、火圈舞等,都要举行隆重的请神仪式,而仇池地区的社

火表演也有很浓重的神性色彩;白马人的迎火把、火圈舞和然巴干干昼也与仇池地区现今的夜社火弯庄和羊皮扇鼓有相通之处,表演的时候也要请神,把娱人娱神融为一体;尤其是池哥昼表演中表现神性的庄重与猴子(汉名)滑稽诙谐,与仇池地区社火中的春婆表演形式非常相似,亦庄亦谐。

三、结论

早有学者提出,陇南川北的白马人与藏族不是一个系统,他们的族源不同,现代的藏族主体是古代的吐谷浑发展而来的,而白马人则是古代氐人的一支——仇池氐杨氏南下后发展演变而来的,陇南白马人与古代仇池氐杨氏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清楚的,这不仅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也有大量的民俗事项可以旁证。

【参考资料】

- 1、《文县县志》
- 2、《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 3、焦红原《与仇池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袁智慧主编《仇池论集》2010 年 3 月)
- 4、邱正保、张全新、田佐主编的《陇南秦文化民俗资料》(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注:本文为参加中国首届陇南白马人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

(作者单位:陇南市西和一中)





汉代临泾县城考

段安邦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革新行政管理体制,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全国分设 36 郡,郡辖县,县辖乡,乡辖亭。在上古九州之一的雍州地域,置北地郡。筑长城,防匈奴。汉武帝时,对匈奴作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为祝愿边境安定,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将北地郡一分为二,析置安定郡,郡治设在高平(今固原),辖县 21 个,临泾县是其中之一。西汉临泾县的县城在什么地方,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历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今镇原县东南洪河川川口遗址说;二是今镇原县城西临泾故县遗址说;三是今泾川水泉寺遗址说。西汉临泾只能是一个县城,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一、镇原县东南洪河川川口遗址说

镇原县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川口遗址”,是一座汉代古城遗址,位于镇原县屯字镇川口村洪河川南侧,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具有古县城规模。地理座标北纬 35° 31', 东经 107° 13'。镇原县博物馆考证出土文物证明是汉代城池。应为西汉临泾县治所在地。

证据有六:

(1)《辞海》载:“临泾,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镇原县南。”似指“川口遗址”。

(2)《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临泾县,西汉置,属安定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五十里屯字镇。东汉为安定郡郡治。”正符合屯字镇川口村“川口遗址”的方位与距离。

(3)《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册)载:“临泾县,西汉置。治在今镇原县东南。属安定郡。东汉、魏、晋为安定郡治”。符合“川口遗址”方位。

(4)《读书方輿纪要卷三》载:“汉临泾县地,属安定郡。”“安定郡,汉郡也,领临泾等县七。临泾,

今平凉府镇原县东六十里,有故城。”这个故城似指“川口遗址”。

(5)《中国历史地图册》,西汉临泾县城明确标在今镇原县东南洪河川“川口遗址”位置上。

(6)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载:“临泾县,上,东南至泾州九十里,本汉旧县,属安定郡。隋大业元年于今县理置湫谷县,取县内湫谷为名,十二年,复为临泾县,皇朝因而不改。按:县有彭阳川,去彭阳县一百里(原文‘步’字当误)。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这段文字说明唐临泾县不但保持了汉代临泾县的本土,还兼有汉代四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域。隋大业元年,县治迁移,改名湫谷县,大业十二年又恢复临泾县,迁移前的县城在今洪河川川口村。

二、镇原县城西“临泾故县”遗址说

明嘉靖《陕西通志·古迹·镇原县》载:“临泾古城在县西二里,本汉县,晋安定郡即此。唐属泾州,元并入镇原州。”清康熙五十四年张述轸修《镇原县志》载:“临泾县,县西百武,今址存,唐元和三年,节度使段祐请于泾州北九十里使镇将郝玘修临泾城,以捍边,即此。”清道光二十六年《镇原县志·古迹》“临泾故县”条载:“《元和志》,临泾在彭阳川(‘在’误,《元和志》原文为‘有’),兼有汉抚夷、彭阳、安定、安武之境。《一统志》:临泾,汉县名,前汉属安定郡。后汉及晋郡皆治此。魏改泾州,唐属泾州,后为行原州,宋为原州治所,元并入镇原州。故城在平凉府镇原县西二里。”

这段文字意思很明确,认为两汉及晋代的临泾县城和唐代的临泾县城都在今镇原县城西二里处的“临泾故县”遗址。经考古证实,今镇原县城西二里的“临泾故县”遗址,没有汉代文化遗存,只有唐宋文化遗存,“临泾故县”遗址是唐代临泾县城

遗址,即郝玘所筑唐临泾县城。汉临泾县治在今县城西二里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泾川水泉寺遗址说

祝世林先生著《平凉古代史考述·泾州地望新议》(以下简称《新议》)认为“泾州古城应是历史上早期的临泾城”。

张多勇先生《泾河中上游汉安定郡属县城址及其变迁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研究论文》)论证,确认“西汉的临泾县治所在今泾川水泉寺”,他的主要证据有四个:

证据之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临泾县,本汉旧县,属安定郡。隋大业元年於今县理置湫谷县,取县内湫谷为名。十二年,复为临泾县,皇朝因而不改。按:县有彭阳川,去彭阳县一百步(‘步’应为‘里’)。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研究论文》以这段文字的含义得出的结论是:“唐代的临泾县,包括汉代的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元和郡县图志》虽然没有说清楚汉代的临泾县古城在何地,但明确排除了汉代的临泾县在唐代的临泾县界的可能。”《新议》也持类似观点。

笔者认为,从《元和郡县图志》这段文字里,看不出唐代临泾县境内有排除汉代临泾县界的意思。此文明确肯定了汉代临泾县的县城及全部辖地都包括在唐代临泾县的辖区之内。《元和郡县图志》中,兼有四县之地的“兼”字,极为准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兼”的字义是同时涉及或具备几事物。即某种事物除具有本身外还兼有其他事物。《元和郡县图志》这段文字的正确注释应该是,汉代的临泾县到唐代辖境扩大了,不但沿革保留了包括县治在内的汉代临泾县的全部地盘,还兼有汉代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的全部或局部地界。也就是说唐代临泾县包括了汉代临泾、安武、安定、彭阳、抚夷五县的全部或部分地界,不是《研究论文》所说的“唐临泾包括了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明确排除了汉代的临泾县在唐代的临泾县界的可能。”实际上,临泾县是主体,兼有另外四县之地,并未排除汉临泾县地,而是包括汉临泾县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

著作,汉临泾县到隋代县境已经扩大,拓展的地盘主要在西北地域,临泾县城在隋大业元年北迁到其辖地茹河川,改为湫谷县。经过12年,又恢复了临泾县的原名。湫谷县是汉临泾县从洪河川川口村迁徙到茹河川只存在了十二年的县,其县城实际是隋代湫谷县和临泾县城,城址在今镇原县城南“逼水珠”一带。李从图总纂的道光版《镇原县志·古迹》卷八,吐蕃城条目下载:“《辑志》县南二里,乾隆十七年被河水冲崩,考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即此。今土人犹伪传,以为满州城。”这段记载把镇原县城南逼水珠一带的古城遗址认定为唐吐蕃城,否定了民间满州城的称谓,其实两种称谓都是错误的。今镇原县城南“逼水珠”一带古城墙,有隋唐遗存,此遗址为隋湫谷县城或隋临泾县城遗址。今镇原城西二里处,即“临泾故县”遗址是唐代临泾县城。唐临泾县辖有汉代临泾、安武、安定、抚夷、彭阳五县之地,史书已有记载。

汉代临泾县辖地相当于今镇原县的屯字、南川、城关、临泾等乡镇及今泾川县北部部分地域。唐代临泾县县域比今镇原县域要大很多。明洪武二年将镇原州降格为镇原县。从此临泾县废。

西汉安武县,东汉废,其辖地并入临泾县,其地盘相当于今镇原县南的平泉、开边、郭原、武沟等乡镇部分地域。县治疑似为今开边镇张庄子汉代古城遗址。

西汉抚夷县在临泾县西北,后周废,县治与辖地并入临泾县。并入的地盘相当于今镇原县的孟坝、马渠、三岔、殷家城、庙渠、方山、新集等乡镇的西南部(西北部属汉代朝那县地界)。县治疑似为今三岔镇梁台汉代古城遗址。

西汉彭阳县辖地相当于今镇原县的太平镇、上肖乡及今庆阳市西峰区部分地域。汉彭阳县到唐代,县界北扩,县城从茹河谷迁到董志原,演变为彭原县,部分辖地如太平镇等划入临泾县境。县治在今镇原县太平镇彭阳行政村杨湾自然村古城遗址。

西汉安定县辖地相当于今镇原县中原乡、平泉镇南及今泾川县北,平凉市崆峒区东局部地域。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30年)废安定县,西汉安定县城在今镇原县中原乡原峰行政村城隍庙遗址。安定县废后,安定县城即成为“安定故城”。证据有二:其一,《元和郡县图志》“保定县”条下注“本汉安定县地,今临泾县安定故城也”。这段文字意为:唐保定县本来属于西汉安定县的地界。汉安定县城今(即唐朝)已成为临泾县的安定故城了。《元和郡县图志》临泾县条下注“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把《元和郡县图志》保定、临泾二县条下的注文联系起来看,汉安定县的县城到唐代已是临泾县所辖的“安定故城”。其二,《甘肃通志·古迹》卷二十二第36页载:“镇原县安定故城在县东南,汉置,属安定郡,后汉省,后魏复置,移于南界即今泾州也。《元和志》安定故城在临泾县。”根据《甘肃通志》所注,意为西汉安定县于东汉建武六年废后,其地及县城并入临泾县。过了三百三十年,十六国前秦甘露二年(公元360年)复置安定县,但县城和辖地与汉安定县有很大区别。汉安定故城不再是复置的安定县城。十六国时,前秦的安定县城设在距泾河一里处,安定县城是当时雍州的州治。北魏神䴥三年(公元430年)置泾州,州治仍在安定县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泾州改安定郡,郡治也在安定县,唐武德六年(公元618年)安定郡改为泾州,州治在安定县。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将安定县改为保定县,州治在保定县城。唐保定县城的前身是前秦甘露二年复置的安定县城,不是西汉置的安定县城。安定县与临泾县、泾川县与镇原县历代接壤,历代边界乡村有互相割出划入的事实,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1956—1958年镇原县的党张乡、高沟圈村划入泾川县,泾川县的梧桐村划入镇原县。事实证明,唐时临泾县兼有汉时安定县的部分地界是可以解释通的。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唐临泾县“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的记载,完全可以否定“汉临泾县治在今水泉寺”的说法。

证据之二:《北征赋》。《研究论文》论述班彪所作《北征赋》的内容,证明班彪沿茹河谷西进,班彪到达茹河谷彭阳县城,没有去过临泾县城,证明茹

河川没有临泾县。班彪北征在汉代而非唐代,所以《北征赋》恰恰反证了汉代临泾城在洪河川而不在茹河谷的事实。汉时班彪沿茹河谷西进,没有去洪河川进临泾城,不能证明汉临泾城就在泾河畔的水泉寺。《新议》提出《北征赋》中的“越安定,以容与兮”,是指越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这里可望见漫漫长城。“越安定”句不足以否定临泾县域在洪河谷川口村的事实。

证据之三:王明生墓志铭。《研究论文》指出:“2005年泾川县博物馆在泾河南部距县10公里的太平乡三星村清理一座北魏墓葬,其墓志铭曰:‘恭惟大魏正始四年(507年)十一月五日临泾民王明生/积业精微二尊并背不能殒没……刊石立铭记之云尔……。’说明北魏时泾河南属于临泾县管辖,北魏临泾县治所当在今泾川县水泉寺无疑。”笔者认为,以下两点理由可以否定汉临泾县治在今水泉寺的说法,其一,西汉置临泾县,县治在泾河支流洪河川,距泾河20多公里。王明生墓志的出土,证明了汉临泾县辖区既包括泾河北侧50公里以上的地域,又辖有泾河南侧10公里以上地域。以“川口遗址”为县治的临泾县直到隋大业元年迁移至今县城西,北魏正始年间泾河南侧部分地域仍由临泾县所辖。其二,退一步说,即是北魏正始年间今三星村不是临泾县辖地,起码证明王明生的籍贯是临泾县。古今中外,一个人的籍贯与葬地不在同一地的事例屡见不鲜,不能说临泾民王明生死后埋在安定县的墓地里,安定县就变成临泾县。

证据之四:距泾河甚远“不临泾”。《研究论文》指出“从临泾县命名上看,临泾(临近泾水的意思)远在五十里之外的川口村和九十里之外的镇原县城建立的县叫临泾县有些牵强。”认为位于泾河畔的水泉寺临近泾水方可称临泾,五十里外的川口村建县“不临泾”,此地建县不能称其为“临泾县”。笔者认为,汉临泾县设在泾河的一级支流洪河的川口村,洪河川又称横河川。如果以支流命名为“临洪县”或者“临横县”,显然名不吉祥。虽然县城距泾河五十里,作为一个县,并不算远,完全可以以“临泾”命其县名。至于唐代迁筑临泾县城,距泾

河九十里,而且辖地已“临泾河”,更“不临泾”,距泾河更远,就不能称其为临泾县,如果以距离远近论证,距泾河百里的今临泾乡该不该用“临泾”之名呢?根据王明生的墓志铭证明也可以说西汉至北魏,临泾县辖地北至潜夫山以北,南至三星村以南跨度八十多公里的县域也有可能。《新议》提出“离泾水九十余里的镇原作临泾,总觉得有些勉强。”早在唐代郝玘筑临泾域,就在距泾河九十余里的地方,地址今在。那是郝玘为什么不觉得勉强。唐代郝玘如觉得勉强,修域时早就另改县名了。

《研究论文》以四个证据证明汉临泾县在今泾川县北五里的水泉寺。笔者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保定县距泾河一里的记载,完全可以否定汉临泾县治在今水泉寺的说法。

《辞海》《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元和郡县图

志》《泾州志》《泾川县志》等大量典籍都明确记载:唐至德元年讳安史之乱将安定县改为保定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保定县条,明确记载“泾水,在县东一里”,可以肯定保定县的前身安定县城距泾水也是一里。距泾河一里处的水泉寺,既作安定县城又作保定县城,完全可以说通。但水泉寺既作安定县城,又作临泾县城,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综上所述,汉临泾县城在今泾川县北五里“水泉寺遗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新议》认为临泾是泾州早期县域,同样缺乏证据。

汉临泾县城在何地的三种说法中,只有“川口遗址”说理的充足,证据确实。汉临泾县治应在今镇原县屯字镇洪河川南岸的川口遗址。

(作者单位:镇原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

(上接第 55 页)

县,乃汉翟道县,属左冯翊。又北为直路县,属北地郡。又北至鄜州,始为汉上郡境。阳周既属上郡,不应跨越重山在真宁县也”。这是他们不承认正宁县是汉上郡阳周县唯一的理由。一是正宁县同古上郡隔山隔水,地不相连,二是正宁距上郡很远。这种判断是缺乏历史和地理知识的表现。他们只看到正宁同鄜县不接界,却没有看到襄乐县既同汉上郡的驻地肤施和邻县鄜县接界,正宁又同襄乐接界的事实。独乐和白土同正宁接界。翟道县虽在正宁东部,但不改变正宁北部边境同上郡相连的事实。我们不能用现代的区划来衡量古代的区划,比如古代的肤施(今延安)不在现在的延安,而在子午岭东麓,同襄乐接界。我们翻开汉代上郡、北地和安定三郡的区划图,不难发现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巩固支援北部边境所做的特殊区划。安定郡的北部到达宁夏的黄河边上,但它的南部却在泾水一线。北地郡更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形,它的北部灵州远在宁夏的黄河边上,南部的戈居和鞞觚县在今长武、彬县附近。而上郡也和北地郡

地形十分相似,南到白土(今旬邑、淳化),北到秦长城。这三个郡各有一条主干道南北贯通,即回中道(安定)、泥阳古道(北地)、秦直道(上郡),其所属县均在古道上或古道两旁。这样搞区划并非无知,而是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我们知道甘肃是一个狭长的省份,东西远距三四千里,这样区划是无知吗?回答是:并非无知,而是需要。而今天又有谁说这不对呢?又有谁能改变呢?其中的道理我就不详说了,留待有心人去思考吧。

综上所述:汉阳周地点搬不得。因为它和桥山、子午岭、黄帝古冢、秦直道、蒙恬墓连在一起,一动皆动,一定皆定,再大的权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常言道:人性好改,山水难移。山不倒,水不转,岂之奈何!



再论西汉阳周在正宁

路笛

关于西汉阳周县是否在正宁的问题，一些历史文献说法不一，特别是清代文人提出正宁阳周是北魏“侨置”之说，给我们留下了前后矛盾的糊涂概念，直接影响了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对正宁是否汉阳周县的问题作出了不够准确的判断和记述。对此问题我曾写了《西汉阳周在正宁》、《西汉阳周城址考》、《泥阳军城考》等文章，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陇东学院张耀民先生也写了《黄帝冢原址考——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等三篇文章，其中对西汉阳周在正宁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后，《庆阳地区志》也对此事作了肯定的记述。时至今日，问题在庆阳市境内应当是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持不同观点者仍有人在，应该允许他们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文史爱好者，一个参与编写《庆阳地区志》的副总编辑，我总感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些道理没有说透，所以一些同行者有不同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对此事还有再论的必要。即使这一辈人说不清，下一辈人还可以继续再说再论嘛。

我认为西汉阳周县不管在哪里，说他在哪里都不重要，但是由于它和桥山、黄帝冢、秦直道、蒙恬墓等文化古迹连在一起，如今这些古迹尚在，这就不得不将它的来龙去脉讨论清楚了。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什么？最可信的应当是当时当朝的记载，也就是说汉代的县应当以汉代的记载最为可信，以后的记述那就只能作为参考了。要弄清这个问

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究：

一、汉阳周县是同桥山分不开的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孝武帝本纪》曰：“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列仙传》云：“轩辕黄帝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这里都点出了桥山，但未说桥山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引用汉代的文献加以说明。班固《汉书·地理志》曰：“上郡，秦置。县二十三（有肤施、独乐、阳周、襄乐、奢延、龟兹、定阳、高奴、望松、宜都、白土等），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这里指出桥山在阳周县的南部，有黄帝冢。从今天正宁县的临县分析，白土即今旬邑县的一部分，与正宁南部接界，襄乐在正宁北部接界，独乐在正宁中部。今正宁县榆林子镇所辖的长乐、乐兴、乐子、文乐、乐南方等村名，皆以独乐县所留名。用今古名称对照，可知古阳周县和桥山的位置。《魏书·地理志》曰：“阳周，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这里进一步明确了桥山和阳周县的位置。泥阳即泥水之阳，泥水即今纵贯庆阳南北的马连河，汉称泥水。泥阳城即泥阳县城，辖今宁县地域。宁县同正宁相连接界。《汉志》记：“泥阳，有泥水，出郁郅北蛮中”。郁郅即今庆城县，属庆阳市辖。高平城在今镇原，也归今庆阳市辖。那么古阳周县在什么地方，这还不清楚吗？所以后来的唐宋诸志皆以正宁为古阳周。这里还有一个上郡在

什么地方的问题。据史料记载,秦汉的上郡和北魏的上郡并不在一个地方,管辖范围也不一样。上郡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早在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吴起伐秦,一举攻下了洛水以东五座城池,在那里建立了西河郡。魏武侯执政时,又发兵五万,攻占了上郡。公元前352年,秦国击败魏国,夺去西河郡和上郡。所以那时的上郡并不在今陕北北部,而在中南部。那时上郡的郡治在肤施,即今延安西南部的桥山(子午岭)东麓,同汉襄乐县接界。汉代曾在绥德置雕阳县,晋为赫连勃勃所居,后魏在此置上郡,从此上郡郡治北移。后魏的上郡并未管辖阳周县。因那时阳周县已归豳州赵兴郡(今宁县)辖。由于有些人把两个不同朝代的上郡混在一起,于是秦汉时代的上郡就到了陕北的绥德,阳周县到了子长、子洲一带,桥山也随之到了横山。这就是阳周县和桥山错位的实情。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桥山即子午岭。《元和郡县图志》云:“子午山,一曰桥山”。《明史·地理志》云:“桥山,即子午岭”,“上郡阳周县南有黄帝冢”。《读书方輿纪要》卷五十七载:“桥山,也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宁州东百里”。这里明确肯定子午岭在宁州(今宁县)东百里。同时,子午岭也在阳周(今正宁)东部,即有黄帝冢的桥山。如果汉阳周县在陕北北部的话,那里就应该有子午山或子午岭。但是子午岭明明耸立在陕甘边界,南北走向、并且是泾洛二河的分水岭,怎么会跑到陕北去了呢?至今,甘肃省庆阳市有子午岭林业管理局,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有子午岭林业管理分局。子午岭东坡的陕西省境内也有桥山林业局。这都雄辩地说明子午岭、桥山和古阳周县同今正宁县的关系。由于从桥山到子午岭,它的名字一直从古代沿用至今,所以和它连在一起的阳周县还会在别的地方吗?

二、汉阳周县是同黄帝陵分不开的

上面已引汉代的文献说明阳周县有桥山,桥山上有黄帝冢,并说明汉上郡同魏上郡的不同。所以南北朝以后的各个朝代均记载黄帝冢就在阳周县。首先是《史记》三家注均记载了同样的话。《史记集解》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史记正义》引:

“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唐《通典》记:“宁州罗川县:汉阳周县,今县城是。后魏为显州,隋改为罗川,天宝初改为真宁,有桥山黄帝葬处”。此后各朝代均对这些记载作了肯定,并有同样的记述。直到明嘉靖年间的《庆阳府志》还记有“阳周之桥山有黄帝冢”,“桥山陵寝在县东子午山旁”。经实地勘察,在今正宁县(汉阳周、唐真宁)境东,旧罗川县城东八十里的子午山旁确有一古冢,当地人称“仙人坟(先人坟)”,《正宁县志》记:“在县东南湫头镇东北西头村之桥山,当谷一峰耸起,草木葱蔚,上有荒冢,旁立一碑,镌字曰:‘黄帝葬衣冠处’。此地今属五顷原回民自治乡管辖。在此乡二顷原村和五顷原村之间,确有一山丘耸起,分外壮观。证明正宁县的黄帝古冢是存在的,古阳周县即今正宁县更不待说。如果有人硬要说汉阳周县在陕北绥德的话,那我要问:哪里有黄帝冢吗?历朝历代有文献记述吗?古冢遗迹遗址在哪里呢?能让人参观一下吗?”

现在查来查去,说汉阳周在陕北的只有一家之言,那就是被人多次修改过的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水经注》卷三曰:“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古城南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时,此有黄帝冢”。对此一家之言,历朝历代史学家均未置可否,多数志书也未支持此种观点。特别是隋唐宋金元诸志均明确指出阳周县汉属上郡,有桥山和黄帝冢,隋改为罗川县,唐改为真宁县(即今正宁县)。只有《大清一统志》曰:“据《水经注》,古阳周走马水应在今延安府北界,真宁之阳周乃后魏侨置,非故县也。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嘉庆一统志》又云:“阳周故城在安定县北九十里”。清代的资料来源仍是《水经注》的一家之言,既无其他文献记载,也无实地考察的实物作证据。岂不知,庆阳地区也有走马水和奢延川,并且有大延川和小延川,小延川即奢延川,两川汇合后名曰襄乐河,走马水即是从东北汇入奢延川的固城河,这些河水都发源于桥山西麓,从东北向西南流,并经过魏长城入泥水。如果《水经注》说桥山和黄帝冢都

在陕北的话，那这么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什么自北魏至今已一千五百多年无人问津呢？无人寻找定位呢？看来此事有假，历史不曾承认。只有正宁县的黄帝冢、桥山（子午岭）堂堂正正，既有文献记录，又有古迹可证。所以我们说，古阳周县即今正宁县也。

三、汉阳周县同泥阳县是连在一起的

西汉时，虽然阳周同泥阳不在一个郡（泥阳属北地郡，阳周属上郡），但是他们的土地却是连在一起的，是邻县。因为泥阳的取名源于泥水，泥水发源于“郁郅的北蛮中”。这明明指的是今天的马莲河。泥阳当在马莲河畔即泥水之阳，地点当在古宁州，今宁县。历代宁县县志和州志都有汉泥阳这个建置沿革。有的学者引用《史记正义》的话说泥阳名字来源于泥谷水，在罗川县北三十一里，即今宁县的米桥乡。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三十一里恰在正宁永正乡，即阳周县城。今米桥乡从来没有发现过建县达四百余年的古老城池，而且这里距离罗川城约六十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不符合实际的记载？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东汉时，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北地郡富平县曾从今宁夏南迁彭原，并且又南迁陕西，以后又返回，又再南迁多次，直迁到今陕西富平。那时泥阳县城确实也南迁过，比如从古泥阳城（今宁县）迁往阳周城，东汉废阳周、独乐二县，将其改属泥阳。在正宁的建置中确实是这样沿革的。这样改迁后的阳周城就变成了泥阳城，距隋唐罗川城恰是三十一里。东汉末年，北地郡和泥阳县继续南迁至陕西合阳、蒲城一带。这也证明泥阳同阳周原是两个山水相连的邻县。当时襄乐是位于泥阳东部、阳周北部，山水相连所以东汉废襄乐后，其土地也并入泥阳县。那时，襄乐、阳周、独乐虽废，但土地都归属北地郡泥阳县管辖，这便是各朝代志中所说的正宁县西汉属阳周、东汉属泥阳的原因所在。如果西汉阳周在陕北子长县的话，东汉时他怎能远隔数百里同襄乐县一起并入泥阳呢？关于泥阳城是否在今宁县城的问题，汉代班彪的《北征赋》中有这样的记述“历云门”，“息郇郃”，“慕公刘之遗德”，说明他到了公刘邑（今宁县城西庙嘴坪）。然后“登赤须之长阪”，说明他上了一个

长坡，“入义渠之阳城”。他在义渠城里“忿戎王之淫狡，秘宣后之失贞”，又想到“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除云门和郇郃之外，其他路途均在今宁县，即公刘邑、泥阳、赤须之长阪、义渠旧城。有些学者，为了将义渠城放在宁县城的公刘邑，一而在、再而三地说什么古代城池都放在水边，用吃水来说明和肯定一切，却不顾史料文献的记述及考古学者的现场考察结果。试问既然义渠城一定在水边，那么和它并存的泥阳城为什么要放在米桥呢？米桥不是在高原上吗？还有西汉略畔、东汉富平不是也在高原上吗？后来的彭原、桐川、长武诸县也都在高原上。还有，既然宁县庙嘴坪只有见方数十亩大地方能放下一个国都，说明这个都城并不大，人口并不多，它和一般县城不差上下，即使放在高原上也会有水吃的。由于一些学者把义渠城放在庙嘴坪，逼得泥阳县城无处安身。一个长达400余年的古老县城至今竟然杳无踪迹，这不很奇怪吗？明清《庆阳府志》上说，宁县有个泥阳里，地点都标在原正宁县的平子地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西魏时，在正宁县境曾设过两个军城，即惠涉军和泥阳军，这个泥阳军城恰在平子（古阳周地），现在城址尚在。在这里，我绝不否定正宁东汉时是泥阳县辖地的事实，但是，我理解的是西汉泥阳确在今宁县庙嘴坪，阳周在今正宁永正乡。义渠县城在宁县西北五十里焦村乡西沟村。这里不但有古城遗址，有地下文物，还有清赵本植先生在《庆阳府志》中的西北五十里的记载，还有《甘肃通志》义渠城在“宁县西北四五十里”的记载。由于西汉泥阳和阳周县的密切关系，可以断定：西汉阳周确在正宁，东汉泥阳曾驻正宁。

四、汉阳周县同秦直道、蒙恬赐死地是连在一起的

秦直道在什么地方？许多历史学家经过实地考察早有定论。史念海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考察了秦直道的走向，认为秦直道从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开始，沿陕甘边境的子午岭岭脊（桥山）北上，经甘肃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和陕西定边县，然后到内蒙古包头市西。此后，陇东学院教授彭羲、李仲立、刘得祯、庆阳市博物馆馆长李红

雄、市文物局局长杜养惠等 10 多人,先后对秦直道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写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论文。2013 年国务院批准将秦直道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北巡朔方,沿秦直道返回时,曾路过正宁祭奠了黄帝陵。由于秦直道是秦大将蒙恬于秦始皇三十五年率 30 万大军修的,直到三十七年直道还未修成,秦始皇病死,秦二世胡亥假传圣旨赐蒙恬死。蒙恬被杀于阳周、死于阳周、葬于阳周,即此城,一名驰武城,西魏置显州,后废。以上这些史料又把阳周县、秦直道、黄帝陵、子午岭(桥山)和蒙恬赐死地连在了一起。这说明阳周县就在秦直道旁,蒙恬墓就在秦驰武城、汉阳周城附近。有秦直道作证,我们还能说阳周县在陕北子长县吗?陇东学院彭羲教授曾去陕北考察,发现那里所谓蒙恬和扶苏墓其实是两个烽燧,夯筑痕迹明显。自古至今,埋人是不会用夯筑的。那么正宁的蒙恬墓是否是真的呢?在正宁县的永正乡蒙恬洼村确实有一高大的墓冢,自古被称为蒙恬墓,连这个村子也是以蒙恬的名字命名的。墓曾先后被盗数次,墓冢也被当地群众挖土毁坏,只留下墓穴。2012 年正宁县文化局决定发掘查看一下这个墓穴。经深入挖掘,发现以下情况:1.此墓穴很大很深,是一个朝廷官方官吏墓穴;2.有放置不规则的一堆骨头,骨头之上有很多木炭掩盖;3.墓穴中有少量钱币,经专家认定是汉代钱币。于是有人说“此墓是一座汉墓”,也就是说这个墓不是蒙恬墓。难道这又是一个假墓不成?但是,经过一些懂行的专家分析,认为这座墓才真正是应予以肯定的蒙恬墓。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它确实是一座墓,而不是烽燧。其次,正宁县秦汉时代无人在朝廷任大官,也没有外籍官员死在此地,只有蒙恬死在这里,不但影响了村名而且已记入史册。再次,蒙恬墓发现汉代钱币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上秦汉相接,汉承秦制,汉钱也许就是昔日的秦钱;二是,蒙恬墓有变迁。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蒙恬昔日以罪臣被赐死,他死后谁还敢将他厚葬呢?当时随便挖个坑掩埋一下就行了。可是,汉朝是以反秦夺取政权的。汉朝廷对蒙恬的死是一清二楚的,念起蒙恬曾为国家筑长城、修直道和镇守边关之

伟大功勋,重新埋葬,树碑造墓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墓中有汉钱并不奇怪。其墓中有一堆不成人形的骨头,说明此墓是后人搬迁的。这是我们从另一条思路中找出的原因,虽然这是推测,但这样分析和理解比用烽燧造假要实在得多。

说了上面这么多,只是为了证明西汉阳周在正宁。但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人还有几种说法需要澄清:

一是阳周郡之说。成书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的《中部县志》称:“秦置上郡阳周,即翟道县”。乾隆钦定《今古图书集成》在真宁县建置沿革中有“汉为阳周县……后置阳周郡”。这实在是为了将黄帝陵放在中部县(今黄陵县)作出的掩耳盗铃之举。历史上阳周一直是一个县,从未设过郡,而且阳周县先归汉上郡辖,后归北魏幽州赵兴郡辖,而汉翟道县是左冯翊下属的二十四县之一,根本不在一个郡,怎会出现这样的笑话呢?这是这些志书的作者在熟读史书后,觉得要争黄帝陵,阳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于是编造了本来就没有但必须有的一个谎言。

二是阳周侨置之说。《大清一统志》引《水经注》的话说古阳周在陕北安定县北界,真宁之阳周乃后魏侨置,非古县。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弄清什么是侨置。所谓侨置应在同一时代,即甲地政府因某种原因侨置乙地,但并不管辖乙地。在革命战争年代,庆阳地区的国民党合水县政府因县城被解放区政府占领,将县城曾先侨置于宁县南义井,后侨置于西峰镇合水巷,但它并不管辖西峰镇。这种侨置均在同一时代。而汉上郡阳周同北魏阳周中间相隔东汉、三国、晋三个朝代,长达四百余年,如何侨置。而且从正宁建置史考察,北魏阳周确属实体,并非侨置。所以北魏之后的历代志书都说正宁阳周是重置和复置的,只有清代说是“侨置”。这究竟是北魏的郦道元先生糊涂了呢?还是后人修改了呢?暂存疑。

三是隔山隔水之说。《大清一统志》的撰稿者以肯定的口气说:“唐宋诸志皆以正宁为古阳周,桥山、黄帝陵均在县境。但以地理考之,真宁在子午山西,其东北(其实是东)为中郡(下转第 51 页)

西汉天水郡平襄县碧玉关沿革再考

郭汉彪

我于2003年完成《天水郡平襄县碧玉关沿革考》后，继续研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相关的史料，发现延续1500多年的天水郡原址方位和命名原因到现在还是争论热点之一。究其原因，均为《汉书》记述不完整引起。

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獬道，骑都尉治密艾亭。兰干，莽曰兰盾。

《地理志》对天水郡作了概括性说明和注释，但对天水郡治地点、命名原因、天水郡改汉阳的缘由及迁徙、勇士县上级属国等没有记述完整，加之名称和郡治多次变动，上述问题招致1500多年的争持不休，给研究设郡前的当地文化历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在天水郡原址研究中，平襄县和碧玉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节点，同样存在许多悬疑，下面就用我自己查阅看到的史料来破解上述之谜。

一、天水属国之谜

属国制度是秦汉政府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属国居民依规定“因其故俗”，即允许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属国由中央政府任命属国都尉领护。关于天水属国的争议由以下两点引起：

《汉书·武帝纪》说：“武帝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顾祖禹(1631-1692年人)《二十一史方輿纪要》云：天水郡本陇西地，元鼎三年，分置天水郡，领平襄等县十六。今巩昌府以东秦州之境是其地。平襄，今巩昌府伏羌县西北有平襄故城。《通典》：武帝元狩初，置天水属国，治勇士。

《汉书·武帝纪》中虽然记述了边五郡，但没有注明边五郡的名称；而公元801年完成的史书《通典》以为“安定、上郡、天水、西河、五原为五属国”，武帝元狩初置天水属国，治勇士。也就是说，“天水”一词早在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勇士县就存在了，8年后的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撤销天水属国，设置了天水郡。“天水”一词应为挪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开始，勇士县渐渐被羌胡占据，不复存在了。

按上述记载，天水郡命名的由来就不需要再争论。但边五郡指哪五郡，历来说法也不一，而且元狩三年是否同时设置五属国，也尚有疑问。于是此案成了不解之谜，目前只能研究到此为止。

二、天水郡原址之谜

天水郡原址争议主要是酈道元(470-527年)所著的《水经注》、汪君梅村1862年所画的《水经注图》、公元801年完成的《通典》与1872年完成的钦定《四库全书》等记载不同引起。因这些都是中国著名史书，各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编修地方史志时，大都按本位思想选取对本地有利的史书观点编制地方史，以致争执不断。为此，很有必要对其记载天水郡原址的观点作进一步分析。

(一)《水经注》对天水郡原址记述最为不可信。他一边承认冀县是故天水郡治，一边又说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上邽县为天水郡，并以传说“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注明天水郡命名由来。且不说传说所指何地，单以“传

说”记载“天水”由来不像是出自著名地理学家笔下,倒像是有别人后补嫌疑。原文如下:

《水经注·渭水》说:“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镇戎县,曰冀治,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汉阳郡,城即隗嚣称西伯所居也”。又曰“上邽,故邦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

(二)汪君梅村1862年所画的《水经注图·西汉郡国图二》应为后汉绘制的西汉原图,涉及汉阳郡的位置本来只有“汉阳郡”三字,后又在三个字上部加了“天水”二字,且笔迹不一,字体又小,还把标示西汉置天水郡的黑圈也擦掉了,属于后来添加删改,对研究原图有很大干扰。如果认为是汪梅村或原制图之人添加,则两人都对天水郡初置地点有疑问才使其区别。特别是汪梅村在《水经注图·漆浐漓渭四水图六》题注的“班志天水郡师古(注:581-645年)曰,秦州地记云,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的引注推翻了《水经注》的“传说”。

(三)《通典·州郡》对天水郡原址记载为模棱两可观点。文中详细记述了天水郡的历史变化、重大事件、汉阳郡的由来等,但“郡有大坂,名曰陇坻,亦曰陇山”等应为泛指大的地理环境,不是郡治具体方位。此文隐含天水郡初置平襄县后移冀县,但不明确。原文如下: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说:“天水郡(当代):秦州:春秋时属秦。秦平天下是为陇西郡,汉武分陇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隗嚣据其地。初据平襄,后保冀县。后汉建武(注:汉光武帝)中平之,更名天水为汉阳郡。郡有大坂,名曰陇坻,亦曰陇山。”。

(四)《二十一史方輿纪要》记载的《献帝起居注》对天水郡原址记述最为直接,平襄,前天水郡治也。《献帝起居注》我没有看到,但顾祖禹的观点是明确的,彻底推翻了以前的学说。《献帝起居注》应该是朝廷或朝廷授权编注的,一般人是不可能有此权力,所以可信度相当高。原文如下:

顾祖禹(1631-1692年)《二十一史方輿纪要》

云:《献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上郡、汉阳置永阳郡,领平襄等三县。平襄,前天水郡治也。后汉汉阳改治冀,因置永阳郡治此。

(五)具有最高权威性的钦定《四库全书》是国家级史书,其史料不仅仅是对各地所报初稿进行层层修订校正,而且还用国家档案资料来确定有争议的事件,最为可信。当然,《四库全书》也存在个别错误引据,如:《大明一统志》颁行后,识者病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舛错抵牾,疏谬尤甚”。但《四库全书》卷六还是引用记载了《大明一统志》将《秦川地记》“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随意改动成“天水湖,在秦州南七里,其水冬夏无增减,天水郡以此得名”的错误语句。至于《四库全书》卷二十三记载的“天水古城”系唐初所建,不存在争议。原文如下:

钦定《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三(上)说:“通渭县:天水郡元鼎三年置,后汉徙康。平襄县郡治,后汉属汉阳郡”;“通渭县:汉置平襄县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后汉属汉阳郡”。又曰“伏羌县:汉阳郡后汉永平中移天水郡来治改名”;“伏羌县:古冀戎地,亲武功伐冀始置冀县,汉属天水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改郡曰汉阳,治冀”。

综上所述,天水郡(现天水市)在元鼎三年治平襄县(现通渭县)是准确的。各学说群体和各地市的争论应就此结束,用统一观点,统一地名编制史书,集中力量开发挖掘天水郡原址,为研究设郡原址的文化背景及发展做出贡献。

三、平襄县原址之谜

两汉平襄县原址因《水经注图》问世,基本圈定在现通渭县境内,但具体在那个地方一直有多种说法,现作如下考辨:

(一)《水经注·渭水》说,“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注:现为牛谷河,四库全书曰甜水河,光绪十九年版通渭县新志曰牛谷河。以下统称牛谷河)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经平襄县故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谓平相矣。其水东南流,历三堆南,又东流南屈,历黄槐川,梗津渠,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这就肯定了平襄县原址在南山温溪的下游温

谷水岸北,不存在原址在现通渭县南北的问题,因离开牛谷河则解释不通。而城西方向一说来自对《水经注图》误解。《水经注图》在标注平襄两字时位置在南山温溪位置的上方,在现通渭城西 15 公里以远,牛谷河不可能流经以西的地方,属区域性标示。所以平襄古城应定位于县城及以东位置。

(二)《四库全书》卷二十二说:“平襄古城在伏羌县(现甘谷县)西北近渭,汉置,为天水郡治,后魏县。省旧志云:即盐泉”。这个记载将平襄原址在东边一说又圈小了许多。但有关“盐泉”的资料目前还一无所知。

(三)光绪十九年版《通渭县新志》开篇图的“县境全图”把平襄古城绘制在碧玉镇(现碧玉乡碧玉村),但在补遗篇中又说:“汉平襄古城旧志无考,相传在县东三十里即今碧玉镇”。再次陷入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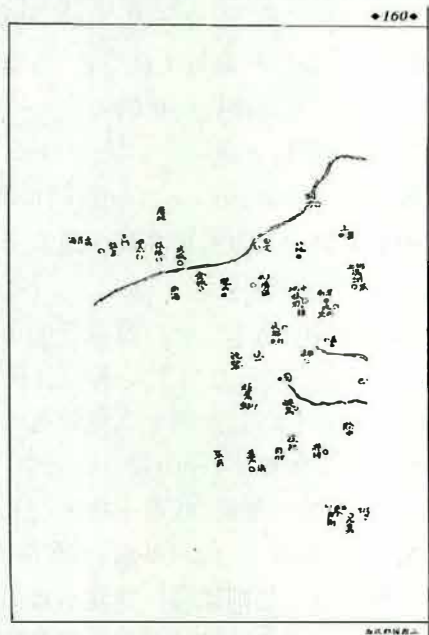
综合说明,平襄古城应在现通渭城东至甘谷散水河上游的牛谷河北岸某个地方。笔者认为,《通渭县新志》将平襄古城绘制在碧玉镇不是空穴来风,平襄古城文化淡出人们视线应与碧玉地名有关。传碧玉关是以襄戎国碧玉公主的名字命名,而历代王朝对此很忌讳,先秦羌人用人名命名的地名在后秦几乎很难再找到。碧玉关后来一直沿用“闭门关”名称(民间两名共用),直到 1764 年的

《直隶秦州志》中才出现“碧玉关”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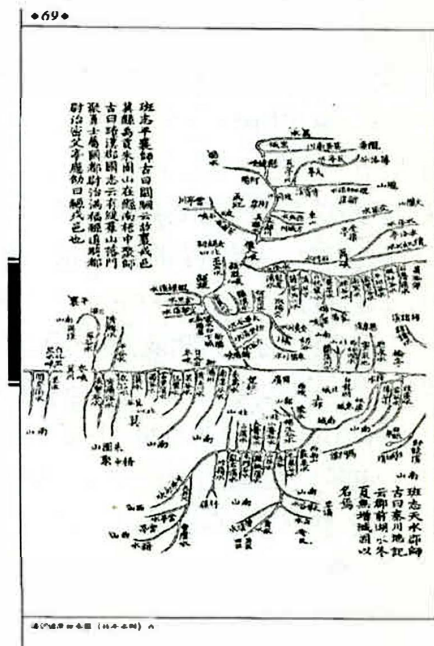
碧玉关由新石器时代遗址李家坪几千亩平川(含坪东滑坡野湾)和坪上下店子城、下店子城、大墩城堡、小墩城堡相连,与独山西亘山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万亩城池,上下店子城为总城两边犄角。周围河流围绕冲刷成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形成自然天险。李家坪西边沿的泉址和西坪下的窑上村还存在,部分城墙也存在(下店子连接上店子城的台子城墙六十年代还有痕迹),郭炳义家用秦汉旧砖瓦建成的整院房屋保存完好,城南牛谷河和郭家岔甜水湖遗址也变化不大。这里是古代通商要道,沿牛谷河古道向东一直到甘谷的散水河,有朱家峡、玉关等多处天险,向西有石滩峡、峡口等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地势十分险峻,用卫星地图也能看清上述地方,应是古代建都的理想位置,同时也符合“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的历史记载。

笔者通过相关史料和分析,认为天水郡治平襄县已无疑问,平襄县治碧玉关还需考古认证,“盐泉”和汉边五郡还需继续研究。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试图解开上述之谜,但还是存留许多悬念,只能靠后代们继续研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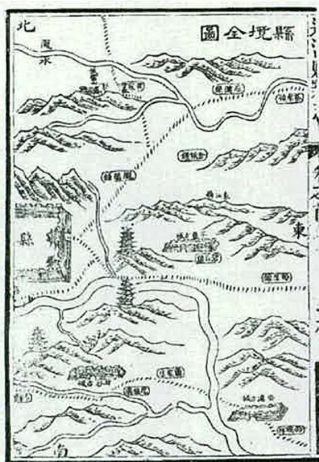
(作者系《甘肃省志·卫生志》副主编)



附图一 汪梅村《水经注图·西汉郡国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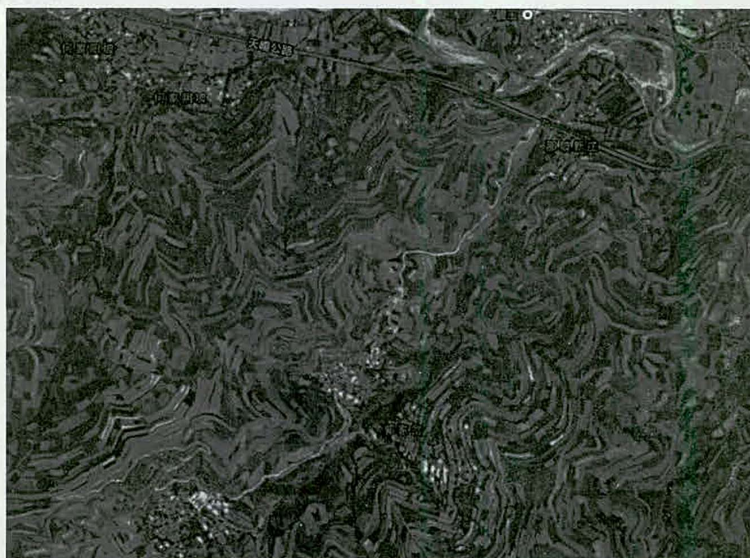
附图二汪梅村《水经注图·秦沪滤渭四水图六》



附录三 光绪十九年版《通渭县新志》开篇图的“县境全图”平襄古城



附录四 通渭县碧玉乡碧玉川卫星地图(宝兰铁路正在207省道旁边修建)



附录五 通渭县碧玉关郭家岔甜水湖(天水湖)遗址卫星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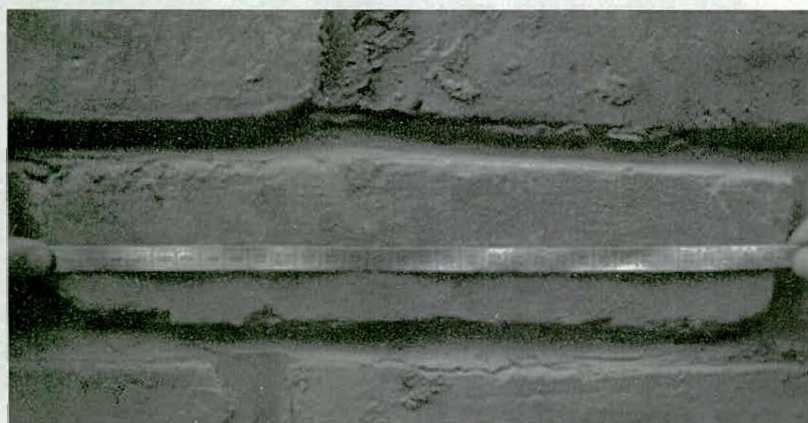


附录六 通渭县碧玉关(含李家坪、西山山)卫星地图



附录七 碧玉川全景图

附录八 郭炳义家的秦汉旧砖瓦



西周太原的地理位置

薛方昱

关于西周太原的方位,古今学者释者纷纷,至今莫能定其所在,确为周代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概况学者意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说在今天山西太原市境,即晋国之太原;一说在今宁夏固原及甘肃镇原、平凉,即唐代之原州;一说在今包头以西的河套地,即秦九原郡、汉五原郡;一说在今晋西、陕北东部之地,即汉太原、西河、河东三郡地。另外,还有说在今晋西南盆地或泛指今陕北黄土高原。说者皆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我们认为,西周时之太原,不是一地之名,而是一地区之名,笔者征诸史料,察其地形,参考近年来出土文物,初步认为:西周之太原,就是今甘肃庆阳市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具体地说,就是泾河上游以北的庆阳市中南部、平凉市东北部地区,试证如下:

一、西周太原是獫狁的居地

獫狁,夏商称獯鬻,西周称獫狁,春秋称犬戎^①,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夏代时,周人北迁与獯鬻戎狄为邻,同居于泾水上游及其支流,今马兰河流域。

到了商代后期,獯鬻逐走周人,占有豳地。迨至文王之时,伐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境),不仅收复了豳地,今陇东又为周人控制,獫狁降服于周,随武王伐纣,后被“放逐”“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②。此“泾、洛之北”正是今庆阳市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所谓“放逐”,不过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让参战者回到原来的居地。

《穆天子传》言:“毕人告戎曰:陵翟来侵,天子使孟悉如毕讨伐。”蒙文通先生说:“陵翟,即允狄,即獫狁。”^③毕国在今陕西咸阳东北,獫狁入侵,几至王畿。《西羌传》云:“穆王西征犬戎,获其

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又《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穆王征犬戎,《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载王只得四白鹿四白狼以归,如此而已,后面还说“自是荒服者不至,”未言获其五王事,亦未载王迁戎于太原,《汉书·匈奴传》同此。依笔者看,所谓穆王“迁戎于太原”,就是将入侵渭北的陵翟、即獫狁击败,退回原居地的太原,因为在穆王迁戎以前,獫狁早已居于太原。后“王北巡狩”,征犬戎,战事徒劳无功,“自是之后,荒服不至。”其后獫狁频频侵周,至宣王,乃大动干戈,“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入其居地。这个獫狁居地太原就是今天泾河上游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

二、陇东黄土高原具有古代“原”的地貌特征

所谓太原,就是高而平的大原。公羊子曰:“上平曰原”^④,古之原字,其意如同现代的“塬”字,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具备了这一特征。该地为鄂尔多斯盆地的一部分,四面环山,中间为盆地,塬区海拔一般在1200—1350米之间。由于河流的长期冲刷,把盆地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塬。其中最大的董志塬,地处盆地中心,面积达910平方公里。位处泾河以北,安家寺以南,马莲河以西,蒲河以东。南北最长处约11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50公里。今分别属于庆阳市的西峰区,宁县和合水县辖。古人云:“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塬面平坦,向东南微微倾斜,高出河床200米左右,具有“上高平”的地理特点。《诗经·公刘》中记述豳地自然地形时,就有四处提到“原”字,如“瞻彼溇原”。溇,大也。溇原,就是大原。在豳地瞻到的溇原,只能是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诗经·六月》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说的就是周

军反击獫狁,占领的太原,为一大原区。正因为是原区,作战双方才能大量使用战车。

今山西太原及汾河河谷平原,古为下湿之地,称隰而不叫原。公元前787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⑤,所指即是其地。今晋西、陕北系山区,内蒙河套为黄河冲积平原,均不具备古代“原”的地貌景观,故非西周之太原。

《左传》昭公元年,晋荀吴伐狄于太原,此太原是狄语大鹵的译音,是春秋晋国的太原,其后赵、秦国因之,但却不是西周的太原。归属各异、地理位置不同,两者之间并无因承关系。此太原系河川和山区,并无“上高平”的大原,故晋人舍车步战,大败狄人,与周伐獫狁战车彭彭景象完全两样。若西周之太原在今山西太原,当属晋国之封地,为何不见晋军参战,而由周廷单独出兵伐狄呢?事实上,宣王之时,周廷不可能大规模地出师为诸侯国薄伐离周京镐都甚远的小戎,更不可能在战胜之后为诸侯国“城彼朔方”,因为这些都是与天子无关的诸侯自己的事。同样,周天子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可能到诸侯国的封地去“料民”检括户口。故西周“太原必在周的势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⑥。由此观之,獫狁所居之太原,非以今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高原莫属。

明嘉靖杨经修的《固原州志》说:獫狁“至于泾阳,命尹吉甫将兵伐之,至于太原,原之名始见于此。此乃雍州泾河北之太原,非冀州汾河所出之太原也”^⑦。书中把雍州太原与冀州太原分开是很有见地的。雍州太原,就只能是在陇东了。蒙文通先生说:“以群狄之至,而冀州有大鹵之名”“译大鹵而后有太原之名。晋阳得命大原,自狄之来晋北始。安在西周以往,冀州得有太原耶?其误自郑注《禹贡》始,则以习于近闻而不审其实,沿伪袭非,遂迷误千载而不能正。”蒙先生在这段话里,指出了今山西晋太原的由来,时间上系晚出,已经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硬要说獫狁所居之西周太原在今山西太原呢?

西周太原即在今陇东,今之镇原南部、平凉市东北部的塬区,当为西周太原之域。至于固原地处河谷平川,其域为西周太原西部边缘山区,不具

“原”的地貌特征。故说固原为两周太原是不确切的。

三、獫狁与周战争是在陇东和关中之间进行的。

獫狁攻周之地:

西喻 见铜器《不其簋》铭文。喻,李学勤先生释作“隅”^⑧,正是。从该铭文中“王令我羞追于西”之语看,西喻是指宗周西部之地,即今陕西武功、宝鸡以北地区。

京白荀 见铜器《多友鼎》。京白,李学勤释为京师,指公刘居豳之处。其地理方位在前已述。荀,即李说的旬邑,今陕西旬邑县地。

焦获 泾阳 镐 方 见《诗·六月》:獫狁匪如,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焦获,《淮南子·坠形训》郭璞注:地在“扶风池阳县瓠中。”又《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焦获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泾阳县城北十数里。周有焦获也。”周之焦获泽,地在今陕西泾阳县西^⑨。

镐 即镐京,在西安市西南。

泾阳 当为泾水下游泾河之北、即今泾阳县境。

犬丘 见《后汉书·西羌传》。秦曰废丘,汉曰槐里,地在今陕西兴平县西、渭水北岸。

周伐獫狁之地:

洛之阳 见《虢季子白盘》铭文。洛、王国维说是北洛水。也就是洛水上游之地,地接陇东泾河流域。

邠 鬲 世 杨冢 见《多友鼎》铭文。李学勤认为是漆^⑩。即汉之漆县,亦即今之彬县。鬲,李学勤说是共。即西周初年的共国,其地在今甘肃泾川县。解放后在县城北五华里的水泉寺发现了共国都城遗址^⑪。世和杨冢无考。从《多友鼎》记述的这次战役的路线是从东南向西北的方向来看,疑其地当在今之泾河流域。

俞泉 见《后汉书·西羌传》。地在今宝鸡市之北。

综上所述,獫狁与周战争是在今陕西漆阡中及陇东之间的泾水、洛水和西喻三个地区进行的,

獯豸攻周的方向是向东南,以太原为根据地,夺取以宗周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周伐獯豸的方向是向西北,旨在保卫王畿,抗御强敌,夺取太原,以消除獯豸对周畿的威胁。

董志塬距周京约二百公里,地处周京西北近地。正因为如此,才能给周京带来威胁。如果獯豸所居的西周太原在今山西,他们向外扩张,首先攻打的当是晋国,不致舍晋而越晋封疆,千里迢迢越山河险阻去攻周畿,我们也没有看到獯豸在进军途中晋军阻击,难道晋侯不屏藩周室么?因之,可见獯豸生息的太原,是在离周京西北不远的地方,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正符此地理方位。晋太原在宗周东北,正如顾炎武所说:“计周人之御獯豸,必在泾、原之间。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⑫

综观獯豸的分布和当时的战争形势及地理环境,所谓西周太原,就是今之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泾水上游流域。这里需要指出:西周獯豸活动的地方,不止限于陇东。他控制之域,东至今陕北的洛河中、上游之地,西到陇山以西的渭水支流今葫芦河流域。地广人众,回旋余地大,故能割据称雄,与周廷抗衡。

四、西周太原的地名与建置演变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地名及建置的演变,往往使人混淆产生误解。为了正本清源,这里不妨将西周太原的地名与建置演变做些简要梳理。

西周太原,商代公刘居豳时叫“溥原”,源出《诗经·公刘》“瞻彼溥原”,秦汉至唐宋约1300年中,西周太原称彭原,其名源自《诗经·出车》“出车彭彭”。西汉早期在该原始置彭阳县。今人张多勇先生经实地考察,第一次明确提出,西汉早期的彭阳县治于今庆阳市西峰区野林村,并以当地出土的两汉古墓中铜鼎上阴刻铭文:“彭阳,重三斤四两”等物证及调查中获取的城墙、城墩等口碑资料作证,故我完全同意此说。两汉武帝元鼎时,彭阳县治迁于今镇原县东的彭阳乡,与董志塬仅一河之隔,其地属彭阳县辖。

北魏时在今董志塬的彭原乡彭原村置彭原

县,元代省彭原县其他入庆阳府辖。元明时今董志塬称太昌塬。太原与太昌塬,其意与名称相近,显然,两者之间有因承的关系。

清代一度在今西峰区的董志镇临时设置董志分县,后约定俗成,将太昌塬改叫为董志塬,相延至今。

从上述商代时的溥原,西周太原,秦汉至唐宋(金)时的彭原,清代以来的董志塬,其建置由彭阳县变为彭原县,名称虽有小异,却一脉相承。从中不难看出,西周之太原,就是今庆阳市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

关于唐代原州,初治汉代的高平县,唐代的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县),贞元十九年(803年)徙治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元和三年(808年)徙治临泾县(今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大中三年(849年)又迁回平高县,宋代又移治临泾县,元废。从名称演变上看与西周太原有联系,但不能因此就说唐原州就是西周太原就不确切了。

五、丰富的周文化遗址

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地属商周豳国之域,先周和周文化遗址比较多,仅以今庆阳市而言,据新编的《庆阳地区志》^⑬记载:“全区共发现西周遗址66处”“先周墓葬2处”“西周墓葬4处”。其中:

韩庙咀遗址,地处董志塬今西峰区温泉乡温泉村的西庄自然村。遗址内有灰坑、住室。所见一处住室长3.5米。1981年8月当地群众在此挖掘崖窖时,挖出一土墓坑,出土青铜器觚、爵、鼎各一件。

1983年地区博物馆派员对残墓再次进行清理,又出土铜戈、簇、胄抱等五件,贝币37枚。属于西周早期或商代晚期器物,即武、成之世。

焦村西沟墓葬,地处董志塬宁县焦村乡西沟村。1983年3月村民徐贵生挖竖穴庄基时挖出古墓一座,经地区博物馆调查,此墓位于周代遗址内,出土器物主要是车马饰兵器等,有两个铜人头饰,为壮年形象,造型逼真,还有铜削一件,长18厘米。该墓共出土器物169件,属西周晚期之物。

宇村谢家遗址,位于宁县湘乐镇北宇村塬上,

西距董志塬 20 公里，遗址面积 1.5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1—3 米，土层断面暴露出住室 2 处，灰坑 3 处，墓葬 1 处，1978 年，村民李德王修庄时挖出土穴墓一处，出土铜盃、铜鬲各一件，另有铜剑、铜虎饰及小件铜饰、贝币等物以及陶器残片、猪、羊残骨。

在董志塬及周边塬区出土的西周遗址、墓葬（《庆阳地区志·文物志》记述详备，笔者不再赘述），足证西周之太原，确为今庆阳市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即今甘肃庆阳市南部、平凉市东北部之地。

① 王国维《鬼方·昆夷·獫狁考》，文载《观堂集林》

② 《史记·周本纪》《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③ 蒙文通：《周琴少数民族研究》，龙门书局 1958 年版，第 9 页。后引蒙说见此书第 13—14

页。

④ 《公羊传》昭公元年。

⑤ 《后汉书·西羌传》

⑥ 于逢春：《周平王东迁非避戎乃投戎辨》，载《西北史地》1983 年 4 期。

⑦ 见明代杨经修的《固原州志》

⑧ 李学勤《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载《人文杂志》1981 年第 6 期。下引李说，均见此文。

⑨ 《鬼方昆夷獫狁考》，文载《观堂集林》。本文引王说。

⑩ 平凉地区博物馆编：《平凉文物》“泾川县”，1982 年。

⑪ 《日知录》卷三“太原”条。

⑫ 《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 年。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



甘肃的古代工业

安文迟

古代甘肃的铁铜器手工业

(公元前 770 年~公元 1368 年)

四千年前齐家文化时代(指甘肃和政县齐家坪古文物的发现),甘肃省就有了红铜器,这些红铜器多系锥具和刀具,大部分是用自然矿石锻打而成,一部分用模铸制造。东周(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56 年)的青铜器遗物,在甘肃庆阳,天水等地都有发现,主要有铜斧、铜戈、铜矛、铜车马饰品,还有周代鼎、秦公簋(音 guī)等礼器以及甘肃礼县出土的秦公鼎。在这些用铜合金制造的各种器具上有的铭刻了文字和精致的花纹。

汉代(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的生产工具,在甘肃天祝、武威、酒泉、宁县的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发现,主要有铍、锛、斲、铲、锄、刀、斧等。这些工具已多用熟铁锻造而成。其他器物有张掖出土的汉代大铜马,高 51.7 厘米,长 47 厘米;1969 年 10 月武威雷台出土的汉代铜奔马,高 34 厘米,长 45 厘米;武威出土的汉代铜连枝灯,有 13 盏,高 1.12 米;临洮出土的汉代铜镜,直径 22.5 厘米。这些出土的铜铸件,纹饰缜密,表现了很高的铜模铸造工艺水平。

造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甘肃曾多次发现汉代古纸,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突出位置。1977 年,在今甘肃金塔县肩水金关西汉烽隧遗址发现了汉宣帝(公元前 73 年—公元前 49 年)时的麻纸两块,纸色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1974 年 1 月,在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公元 25 年—公元 220 年)墓出土的牛车上,发现了写字的麻纸碎片,纸质细薄,纤维组织紧密,分布较匀,没有虫蛀的痕迹。上述出土纸张证明,甘肃是我国最早制造纤维纸的地区之一。当时先民

对麻缕原料采取碱液蒸煮、精细春捣、反复漂洗的工序,再用细密的滤水性能较好的抄纸设备抄造成纸。

唐、宋、元(公元 618 年—公元 1368 年)时期,甘肃省已经出现大型铸造器件。现存于武威大云寺的铜钟铸于唐代(公元 690 年),高 2.4 米,下口直径 1.45 米,厚 10 厘米,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钟。陇西县威远楼上的大铜钟是宋代(公元 1102 年)铸造的。兰州市五泉山的金代泰和铁钟,高 3 米,口径 2 米,系金泰和二年(公元 1202 年)铸造。泾川县泾河铜钟,庆阳县慈云寺女真文钟都是这一时期制造的。

宋代,甘肃冶铁工业不但在生铁冶铸技术上有了冶铸铁钱的精湛工艺,鼓风设备有了重大改进,而且煅钢技术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北宋初年(公元 970 年),在大的冶铁中心设有四监,次要的矿区设有十二冶和二十务,小矿区设有二十五场。仪州(现平凉市南)为十二冶之一。在清水县弓门砦有上铁窟、下铁窟和铁冶坊等三堡,当为冶铁而得名。至熙宁九年(公元 1076 年),在岷州(今岷县)滔山置监,监铸铁钱,足见当时冶铸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冶铸技术的进一步精湛。随着冶铸工业的发展,鼓风技术有了较大的改进。在安西万佛峡的西夏壁画中有一幅表现当时煅铁的图画,其风箱为一大木箱,风箱一侧装有两扇可以开合的大门,门扇上开有进气活门,风箱有送风管通入炉内,排气活门设在管内。使用时,双手交替推拉,门扇向外开时,进气活门打开,排气活门关闭,风箱充满空气;门扇向里推时,进气活门关闭,排气活门在箱内空气的挤压下打开,空气经送风管进入炉内,这种风箱称为“门扇式”风箱。因为是木制,

可以克服风囊受皮革限制难以大型化的困难,将风箱体积做得很大,以增加鼓风量;同时也保证了连续鼓风。使风压、风量都有显著提高,强化了冶炼过程。

同时,生活在河、湟、洮、岷一带的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一支“青堂羌”颇善煅甲,所煅“瘕子甲”,“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该甲为冷煅制作。煅时,在末端留一筋头不煅,以检验煅的厚薄差别。这种冷煅技术是我国早期钢铁加工处理上的一个杰出成就。而当时作为西夏王朝重镇的甘、凉诸州,亦是生产这种高质量兵器的地方。

元成宗元年(公元1295年)7月,一次从甘州调往襄阳的手工御匠500余户,说明元代河西地区手工业的普遍和发达。其实,河西盛产皮硝,人们取以熟皮,皮衣皮裤遍及民间。

明、清时期甘肃工业的发展

(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

明、清时期,甘肃的铁铜器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明洪武七年(1374年),太祖“命置铁冶所官,凡一十三所”,甘肃巩昌冶为当时铁冶十三所之一。据统计,是年全国十三冶炼铁总数9052987斤。巩昌冶为178210斤,占2%,在十三冶中排序第十。(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兰州黄河浮桥铁柱子(又称镇远桥将军柱)的铸造工程,反映了明清时代甘肃省铁铜器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卫国公邓愈监制两根,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卫国公冯胜监制两根,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黄河北岸一根铁柱被水冲入河底,总督布彦秦又补铸一根明洪武九年所铸铁栏重约10吨,长5.8米底部直径0.61米,底座长1.2米,宽0.81米,厚0.3米,上有铸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卫国公建斯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此铁柱现竖立于兰州市中山桥桥南。据史料记载铸造铁柱集中了大批铜铁器手工业者和化铁铸造工具,采用分散化铁,集中浇注的办法。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至1566年)兰州人段续(明嘉靖二年进士)修造兰州水车。兰州水车是一种利用黄河水流自然的冲击力的水利设施,水

车轮幅直径达16.5米,辐条尽头装有刮板,刮板间安装有等距斜挂的长方形水斗。水车立于黄河南岸,旺水季利用自然水流助推转动,枯水季则以围堰分流聚水,通过堰间小渠,河水自流助推。当水流自然冲动车轮叶板时,推动水车转动,水斗便舀满河水,将水提升20米左右,转至顶端倾入木槽,源源不断,流入同地,以利灌溉。这种通过水车转动,自动提水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是当时兰州代的“自来水工程”。

清同治末年,王建文、王建武在兰州黄河北岸风林关设立三益成翻砂厂,厂内临时雇用3至10人,家长即经理,子弟及雇工即为技师学徒。沿用坩锅、大风箱熔铁铸造的手工业方法,利用收购的废铜、废铁生产犁铧、火炉、火盆、碾槽、车串、链条、炉齿、炉条等手工小农具和日用金属品。三益成翻砂厂后来又陆续分出了六个翻砂厂,三益成分出永福祥、三益铭;从永福祥分出永盛祥、德盛公、永顺和;从永盛祥分出元兴福。

兰州毛褐业。“皋兰纺织之利,旧唯绩羊毛为绒,织褐衣之功作颇粗。乾隆初有绒褐之名,较诸毛褐为精,其尤精者姑姑绒”(《甘宁青史略正编》卷19)。

道光初年(1821年)兰州有织布手工业,织褐的人数很多,前来购褐的客商,每年要花费数万金。

兰州水烟。乾隆年间,兰州附近生产的烟叶被制作成水烟。“乾隆中,兰州别产烟种。铸铜为管,贮水吸之。”(《皋兰县新志》)

清代末年,甘肃现代工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有很大的发展。先后设立了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和一些官办工厂。在交通、邮电等方面,修筑道路,修建黄河铁桥,创设电政、邮政局。

一、兰州制造局 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在兰州南关开办兰州机器局,总兵赖长督办其事。制造局设备购于德国泰西洋行,技工多从浙江宁波、福建、广东雇用,并派士兵入局学习制造火药、子弹、旧式抬枪。兰州制造局年需经费白银3~5万两,在甘肃关内外办理军需款项内开支。兰州制造局于光绪八年(1882年)停办。光绪九年

(1883年)谭钟麟继任陕甘总督,制造局直属总督衙门管辖,只生产极少量的军器及器械修配。

二、兰州织呢局 清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在兰州通远门外畅家巷建成织呢局,并正式开工投产。动力设备有蒸汽机2部,纺织设备有梳毛机3套。走锭纺纱车3部,织机20台。整染设备有洗毛机、洗呢机、染色机、烘呢机、起毛机、剪毛机、蒸刷机、压光机等,另有锅炉设备,可谓相当齐全。东、西、中三个厂区,虽较简陋,但运转宽敞。道员张宗翰、杨铭浚、总兵赖长经办其事。开工后每天出呢八匹,每匹长50尺,宽5尺。产品成本高、质量差、产品销路不广。光绪五年(1879年)年底,左宗棠调离西北。光绪七年(1881年)合同期满,德人回国。光绪八年(1882年)锅炉发生破裂事故,无力修复,制呢局停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兰州道彭英甲与比利时使馆参赞阿德林签订修复合同,并增添了10台机器,主要生产各色粗细呢料和毛毯,产品运销全国。随后,时停时办。

三、劝工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兰州道彭英甲于兰州西关贡院内建起劝工厂。劝工厂主要开办4个厂。一是绸缎厂,下设络丝、染织、织造三科;二是织布厂,下设牵经、纺纱、织布、染色四科;三是裁绒厂,下设弹毛、纺织、染色、裁绒四科;四是玻璃厂,下设吹料、平光、破光三科。宣统二年(1910年)停办。

四、官铜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彭英甲与比利时参赞阿林德签订合同,订购比利时的铜矿、淘金、织呢三种机器,加运费共计银32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开工生产,日出金20两左右,日产铜2090斛。因矿砂质量低劣,运输不便,费用庞大。开办不到一年即停产。

五、官铁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办,厂址在兰州黄河北王保保城,该厂分提炼、制生铁、制熟铁三科。产品多系农具和生活用具。官铜厂开办后,官铁厂归官铜厂兼办。

六、洋蜡胰子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彭英甲与比利时参赞阿林德签订合同,购买比利时洋蜡和胰子机器各一套,在兰州城西白云观西侧,开办洋蜡胰子厂。产品主要有肥皂、香皂、洋

蜡。后因销路不畅而停办。

七、石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兰州西关萃英门内设立官报书局,有铅印机一台,工匠20余人。宣统二年(1910年)在贡院外办石印书局。由上海购置照相、胶纸、落石、铺纸,雇佣上海技术员5名,前来印刷书籍、图表、教科书者颇多,成绩显著。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督饬部队疏通和拓宽了丝绸古道。由陕西潼关自东而西直到肃州(今酒泉),横贯陕甘两省,畅通无阻。进军新疆时,又将所筑道路继续西延,北路直到精河。南路直达喀什噶尔。甘肃境内路面一般三丈至十丈,随地形而转移。陕西长武至甘肃嘉峪关3000余里,崇山峻岭,横沟河流,工程甚为艰巨。沿途设施,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庆阳、泾川、平凉及固原往北经过平远到惠安堡的道路,重加整修。狄道(今临洮)西门外建造一座桥——永宁桥,是河州(今临夏)、巩昌往来的要津。在定西先后修筑大小桥梁8座。

八、修建黄河铁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天津德国泰来洋行工程师喀佑斯来兰,陕甘总督升允,兰州道彭英甲与之协商修建黄河铁桥。10月,双方签订合同。德方由喀佑斯负责,中方由彭英甲负责。造桥材料全部由德国经海路运至天津,再由天津经郑州、陕西运至兰州。总工程师为美国人满宝本,技工多招自天津、上海、兰州本地泥、木、铁工匠亦有数十人参加施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动工,清宣统元年(1909年)6月竣工。桥长七十丈(250米),宽二丈二尺四寸(6米)。架桥四墩系钢筋混凝土制造。桥身五孔,系钢铁构成,保固期80年。铁桥一切费用,实用库平银306691.89两,均由统捐下领支。

九、电政 甘肃电路里数,东路由西安至兰州,经陕甘交界之窑店、泾州(设立报房)、平凉府(设立子局)、固原州(设立分局)至兰州省城(设立总局),计1500里;西路由省会局起,经凉州府城(设立子局)、甘州府城(设立子局)、肃州(设立分局),计1330里。东西干线共2830里。由固原北门起经宁安堡(设立报房),至宁夏府城(设立分局),南北支线共675里。

(作者系《机械工业志》主编)

1958年镇原县 “许、张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1958年,发生在甘肃省镇原县的“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简称许、张反革命集团)冤案,涉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大,受害人数之众,时至今日,仍在镇原人的心中留有抹不去的阴影。

1955年以来,镇原县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但由于年年都征了过头粮,农民家底很薄。

1957年,镇原县连续遭受自然灾害达180多天,霜冻、干旱、冰雹、虫灾接踵而至。县政府组织救灾,虽全力以赴,但收效甚微。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平凉专署派工作组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受灾总面积达30%多,五成以下收成占受灾面积40%多,绝苗绝收20%,大范围冻、旱灾近30万亩,占受灾面积的85%。

1957年8月,县人委向平凉地区专署呈报了“关于一九五七年粮食工作的报告”,同年10月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联名向专署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出,由于灾情严重,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全部完成公购任务尚有困难,请求上级考虑,给予适当减免,以减轻农民负担。专署不但未给答复,反而将购粮任务由原来2500万斤,增加到2900万斤。

1958年1月29日,甘肃省党代会期间,许国和在兰州接到县人委电话,报告群众没吃的,出现浮肿,流行病,饿死人等问题,许认为问题严重,通过大会讨论小组向当时的副省长霍维德、马青年写了“一个条子”,反映镇原的情况:

霍省长、马省长:

请在近几天内专组一工作组,前往镇原了解一下粮食收支执行中的几个问题,便于及早作适

当的安排,以免给党造成不应有的、不好的影响。

镇原的购粮任务2800多万斤,至目前实入仓的仅有2500多万斤,这是我的右倾落后保守思想,在粮食问题上的具体反映,请求组织给我处分。现在我们还在努力的促其结束和收尾中。

但据了解购粮入仓的同时或后开展农村说实话运动中,因干部水平不高关系,一时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的人,及真正说出老实话的)几种叫喊声分别不清楚,而干部被叫混了,所以有些真正说老实话的人缺乏及时支持和鼓励他的正义,有时还挫伤了他的积极性,使有些个别人一时失望而走错了路径。

对农村资本主义思想教育不够及时和未得到事实教育提高,使其叫声不断的增加了,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情况打的不十分准确和及时等。形成应及时入仓的未入和不应入仓的还入着,真正供应的未给及时供应等。要求上级去人把镇原的做法从政治上提高一下,提出措施,使正确的执行党的政策。

许国和条子递上去后,并没有得到回答。1958年初,农民还在饥饿中煎熬,而上报的粮食产量却一变再变,由原来的亩产80多斤增加到180多斤,再到210斤,最后加到327斤,总产量也从原来的1.3亿斤提高到3.7亿斤,最后加到5.4亿斤。许国和则坚持“我要对党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不能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

“1958年7月底,(平凉)地委根据省委和张(仲良第一)书记的指示”,组成了以副书记潘焕杰、专区检察长胡礼新率领的地委工作团进驻镇

原，“在镇原领导了政治斗争运动，以解决镇原县的粮食问题。在这以前，前省委和原平凉地委的负责人，曾指出镇原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潘焕杰同志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去开展工作。当他到达镇原以后，就认定镇原县社会上的地、富、反、坏确有破坏活动，因此，首先开始了打击地、富、反、坏的工作，先后共捕办了1314人，管制了172人，共计1486人。被捕办人员以后在狱中死亡了337人。在打击社会层地、富、反、坏的后期，从内部又搞出了一个以县委常委、县长许国和，县委委员、副县长张万寿为首共有124人的反革命集团（其中干部52人，社会统战人士等72人）。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以后在狱中死亡61人。”

在农村，工作组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以铁打铁、以钢打钢、以贼攻贼”（潘焕杰语）式的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以“右倾保守”、“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许多农民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和捆绑。在肖金乡（当年10月划归庆阳县，现属西峰区），在55份批捕人名单中，潘焕杰一下就批了53份，并说，“如果谁乱跳弹，就枪毙”。

工作团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打乱了一切法律秩序，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潘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立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马上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姓名同音，捕人时，该贫农社员误听应声先站起来，结果也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更有甚者，在开边张沟大队，一农民到大队要粮，潘焕杰问“你叫什么名字？”农民答“刘国章”。当地土音常把“国”字念着“关”。潘一听，大怒道：“好一个大胆的刘关张，你把三国闹得乌烟瘴气，现在又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给我抓起来。”刘国章吓得转

身就跑，结果还是被抓进监狱，死于狱中，其老母亲因无人照料也饿死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几乎天天法办人。有的言语稍不慎重，轻则批判斗争，重则逮捕入狱，而这一切不需要任何调查取证，随口认定，即时立案。潘仅在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把人捆好后串起来，一串串地往县城拉。

在社会上打击逮捕了这么多人，潘犹嫌不足，提出一定要挖出一个反革命大本营，矛头又指向了县人委。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工作团认为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要通过政治斗争运动，解决镇原县的粮食问题。

在7月1日的人代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县长许国和，说许“有粮叫缺粮”，“煽动群众闹粮”，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镇原县第三届党代会上，14天的会议潘就用9天的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个政治问题。要求大家拿出几百万张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开展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会后，许国和等人被监管，开始批斗。县上几乎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向全县人民宣讲“许张反革命罪行”。制作“许张反革命罪行”批判漫画，长期巡回展览。印刷报纸公布罪行。潘在大小会议上动员大家“要放开揭发批判，放开说”，给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强行下达写大字报和批判文章的数量指标，不能重复。干部、职工、学生夜以继日的写大字报，有的胡编乱造，有的捏造事实，陷害好人。让县委、人委所有干部参加批斗会，发言批斗。如不参加就说和许是一伙的，参加不发言，就说有同情感，划不清界线，发

言不合意就拉出来一起批斗,搞得人人自危。

1956年,镇原县组织了以许国和为团长的延安参观团,把参观团员中以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都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1957年县人委起草经县委讨论通过的财政预算和夏收预付方案,认定是反动预算、反动预付方案,把参与起草的工作人员,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

1957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后,县人委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给县人民代表、统战人士、剧团老艺人等每人赠送一本,也认定这是反革命分子的联系活动,将具体负责分发该书的干部和接收该书的人员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

潘焕杰认定镇原县镇反不彻底,是许国和等人的包庇,因此,把原来在肃反、审干中已定性,处理了的反革命分子,也拉入反革命集团。

潘焕杰认为镇原县反右派不彻底,因此把以往和许工作上接触较多,反右派后期(1958年前季)定下的右派分子,也拉入反革命集团。

潘焕杰认定镇原县的缺粮原因,不是工作问题,而是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因此,把反映了农村实际缺粮的干部都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

把日常工作中,许国和、张万寿与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之间的联系,认定为反革命活动,因此,把这些人也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

许国和早在1952年搞三反运动时或其他工作上使用过的积极分子,也被拉入集团。

县人委会会计包奎孝按正常程序报销票据,潘说“包奎孝大包小包,包屁反革命,不法办放着干啥。”被定成案内成员。王廷珍是理发匠,因给许国和理发和送过书报而被法办;赵天一是乡医,因去张万寿家里看过病而被捕;贺天恩因其弟贺天禄被捕而将他逮捕;张棋因“和张万寿是家族关系”而被捕;奕迎祥“因和张万寿吃过饭”而被捕……许国和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致使精神一度失

常,年仅6岁的孩子,也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许张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1958年8月21日,平凉地委常委会专门研究了镇原工作和潘焕杰写回的有关报告,并于22日给潘焕杰并镇原县委下发了讨论意见,认为镇原“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热情拥护。这点应该加以肯定。但是镇原县工作上的问题确实也是严重的。”要求“解决问题,必须采取坚决的方针,进行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彻底革命;采取充分发动群众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一定把问题搞深搞透,是非曲直弄清,……对敌我问题和内部问题(包括干部中和群众中)必须严格区别,不然就可能在某些地方发生打击不准不狠。辩论时不应涉及男女关系和家务纠纷。至于具体人的定性定量问题,具体问题应查对清楚,写成单型材料,按照干部管理范围,应属地委审批的报地委审批,属县委批准的由县委决定。对干部处理步骤应是:首先经过辩论,查清问题,然后进行处理;处理多少(报告中提33%)依实际情况而定,……作实事求是的决定。不论打击多少,一定要打的准,打准就会打狠。”同时要求“对已经批判的许国和、张万寿及其他一些问题严重的人,现在再不宜单独领导一个乡或一个社的工作,在问题没有彻底弄清和作出处理之前,亦不宜离开镇原(巴家咀另外调人去)。”

据时任平凉地委秘书长的王如珍回忆,“潘焕杰在镇原了解了一段时间,曾到华亭安口大炼钢铁指挥部向地委做过汇报,说镇原形成了以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专案材料他已经搞成了。地委经过讨论,让他继续调查了解,有事直接跟省委负责搞政治革命运动的王秉祥联系,按照省委指示办事。此后,潘焕杰就经常与王秉祥联系。”

据时任县长史银琚回忆,“这个案子中间,潘焕杰背上材料到华亭给李正廷、鲁践汇报过,汇报的调子就是许张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潘焕杰回来给我说,当时李正廷听罢以后说,是不是反革命集团先不定,继续揭发批判;内部一个不抓。”

1958年9月30日,潘焕杰以地委工作团的名义向平凉地委写了“关于镇原县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报告,报告称:“八月初县党代会及其后这段时间内”,“我们用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上下内外结合”,“经过广泛深入的揭发斗争,揭露出了以前县委常委、县长许国和,前县委委员,副县长张万寿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以县人委为中心,网络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等组成核心,又利用各种方式网络了社会上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内外结合,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进行反党反革命的罪恶活动”,报告最后称,“这个反革命集团已被揭露出来了,但很不彻底。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彻底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彻底斗争,彻底粉碎,连根铲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0月2日,工作团写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称,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工作团10月20日《关于镇原工作问题的报告》反映,“已捉起来1096人”。

平凉地委于10月2日向甘肃省委写了“关于镇原县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报告”,称“清查”出这个反革命集团,“找到了镇原工作落后的根子”,“是一次重大胜利”,认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活动是:(一)破坏粮食政策;(二)在财政上缩小收入、扩大开支;(三)破坏农业合作化;(四)利用时机打击陷害革命干部;(五)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组织反革命叛乱。10月20日又写了“关于镇原工作问题的报告”,称“以潘焕杰同志为首的工作团去到镇原,经过八十多天的工作,问题的根子已大体找到,现已进入全面审查阶段”。认为镇原工作确实存在着如下几个严重问题:一、镇反不彻底;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大辩论不彻底;三、整风、反右派斗争不彻底,组织严重不纯;四、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上存在着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10月20日的报告王如珍签发意见是:“此件你根据正廷同志指示,依照潘(焕杰)书记的报告压缩写成的,已经过刘(文正)书记审

阅。”

1958年10月23日下午,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镇原,其时许国和等人正在县委大厅接受批斗,张仲良听取潘焕杰汇报之后,“立即批准将许、张等人捕办,并批评潘行动迟缓”,说:“事不宜迟,迟则生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之后即离开镇原。当晚,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潘焕杰传达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指示:“许、张反革命集团是骇人听闻的,是全国的‘一颗卫星’,你们要很好准备。这个问题要通过群众,大张旗鼓的处理,开除党籍,把镣铐带上。…把前任的书记、县长都叫回来,如唐风义、鱼连波、赵志明、孟致才等,还有王子厚。…承认在他,不承认在他,死也在他,活也在他,一律逮捕,分别审讯,分别关押…”“当晚潘立即请示了王秉祥、李正廷同意后”,连夜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全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逮捕时将人踏倒在地,像捆柴草一样,脚蹬踩揉,绳入皮肉,有人骨折或昏死。捆好后,连成一串,先步行在街上游街示众。到监狱门口,又被戴20斤重的铁镣,审讯达160多天。

1958年10月29日,甘肃省委给平凉地委发出了“省委关于镇原县反革命集团问题给平凉地委的批示”(省委未正式讨论),批示称“你们以八十多天的时间,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查清了镇原县以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件大好事”,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敌人在镇原蓄谋已久的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大本营。”并批评“镇原问题,省委早有发觉,曾多次指出要平凉地委彻底查清处理,但平凉地委未认真执行,直拖到现在,这和前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同志的右倾思想是分不开的,薛程同志对这一问题应负主要责任。地委其他同志也要负一定责任。前镇原县几任书记都没有系统发现这一问题,亦未将真实情况向地、省委作反映,也应作检讨”。在粮食问题上为镇原说过真话的省、专区干部,差不多都受到批判,镇原县委、县政府历任领导均被揪回镇原,逐人接受批斗检查。镇原县最

早的共产党员、陕甘宁边区劳模、时任武都专员的王子厚,也被列了11条罪状,从中央党校召回,批斗撤职,下放劳动。

11月1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总结镇原问题教训。赵志明传达省委组织部长王秉祥的指示:“镇原人委实际上变成了反革命的领导核心,科长以上干部大部分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人,是严重的,惊人的。”同时还揭出13名反革命成员。

1959年1月2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判处许、张集团成员8人死刑,5人无期徒刑,3人20年徒刑,7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6年、14年、12年、10年,其他案犯将陆续判决。这个决定,因未得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而未能执行。

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来自另一资料),管制172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3000多人。由于生活上克扣,肉体上折磨,死于狱中398人(据时任工作团成员、后任县委书记王佐才回忆,“以后落实政策时,段成信有个报告说押了一千几百人,光死就是497人),受株连批斗而死的也很多,但因当时病饿死亡也很多而未能统计。

1960年12月西北局兰州会议及其以后,省、地、县三级分别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一起冤案,地委和省委工作组报经省委批准,决定先行放人。1961年1月12日,许国和、张万寿等33名干部在被关押27个月后首先释放。此后,在押人员绝大多数被陆续释放,并进行了甄别平反。

许、张冤案使镇原干部遭到严重的迫害,县委15名委员,有13名被批斗或逮捕;全县10名县级领导,8名被批斗,2名被逮捕;57名科级干部,37名被批斗或逮捕,其余或被列为嫌疑,或被下放劳动,或自行解职。全县被定或准备定为各类分子的干部32名,县人委机关只剩下一个科长和11名一般干部提心吊胆地坚持工作。

除“反革命集团”成员外,当时工作团以其它各种罪名批斗干部380名,处理了248名,其中逮捕劳教、管制的97名,监管13名,开除公职的59

名,留用查看的46名,降职降级的33名。镇原县的干部队伍就这样被整垮了。为了维持正常工作,不得不从外县“进口”干部,仅1958年冬季,一次就从合水县调进科级干部25名。

到1958年底,全县除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外,还在社会上逮捕了1347人(来自另一资料),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347人,批判斗争了2522人。随意扣粮扣饭、打骂批斗、体罚捆绑等等违法乱纪事件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逼迫群众驮驴粪、钻鸡窝、抱磨扇、拔胡子等侮辱人格的做法。

冤案的制造者还大肆宣扬镇原是“反革命大本营”,为削弱这个大本营,将约占1/6的土地、1/5人口的肖金等地划给周边各县。政治问题完全掩盖了缺粮实际,以致土地面积减少了,粮食任务却不断增加,1959年粮食征购增加到6757万斤,比1958年增加了36.3%。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死亡,劳力减少,牲畜数量下降。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都瘦弱不堪。

镇原县许、张冤案就是这样在潘焕杰等人“捕风捉影,曲解扩大事实,东拼西凑,不适当地联系一些人的个人历史,并把在1958年前季以前作过处理的人拉入集团”,经重重审批,最终形成了。虽然于1961年1月12日先行释放了许国和、张万寿等33名干部,并逐步进行甄别平反,镇原县委在1961年11月11日,平凉地委在1961年12月4日,甘肃省委在1962年7月17日作出甄别平反决定。1979年5月庆阳地委又协同镇原县委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年3月14日甘肃省委又经重重审批予以彻底平反。

(作者单位:镇原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之旅(十首)

张世民

沙枣树

生当朔漠际，敢抗寒冬欺。
叶碎养精魂，枝纤惠风依。
周边皆瀚海，中心无淤积。
耐得狂风卷，何惧细雨稀。

玉门关

朔漠无边碍，白日送出关。
戈壁一铲平，故垒尽荒烟。
谁挹东海水，浇却玉门田。
驼草可点缀，依依绿路边。

祁连山

疏勒西流河，高台东会歌。
大漠逼日圆，小草畏驼索。
绿篱腾水贵，黑马鬃毛阔。
但见祁连下，人烟不曾绝。

嘉峪关

西行路漫漫，苍然卧雄关。
羌笛遇雁鸣，铁门断夕烟。
光化凭印信，柔远爱兵前。
今日更完全，将军马已闲。

雅丹地貌(上)

大漠最深处，依依皆雅丹。
风舌饶舔舐，骨髓尽凿开。
应无洪涝意，偏领魔鬼衔。
平野何沃沃，峥嵘赛人间。

雅丹地貌(下)

夜行如鬼蜮，昼旅管风激。
且看雅丹貌，遥居敦煌西。
舰队初出海，桅杆鹰眼急。
贰师屯兵处，毕竟风流稀。

莫高窟

佛国留胜景，古今略不同。
一作西来教，便充东道鸿。
大乘传家久，小人当寺红。
莫恨星经散，敦学更高明。

藏经洞

藏宝垂千年，开发一瞬间。
狼烟伴恶虎，盗蹄先梁悬。
圆策不是鬼，规矩事后谈。
如今藏经洞，嚶嚶众人寒。

李广杏

将军飞塞外，匈奴孤胆寒。
鸣沙当绝境，戈壁抵足眠。
唯有杏林果，感召汉兵前。
交战莫嫌早，秋后账算繁。

夜光杯

瑶池逢嘉会，夜光常满杯。
姬满难割舍，王母且留客。
墨色非血洗，赤胆赖忠辉。
战士新饮酒，何必强作黑。

(作者单位:陕西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陋室读书笔记

潘硕珍

抿茶板板儿和骨头槽子

偶尔去故土人家串门,发现老汉们的茶罐里,插着二三寸长的抿茶板板儿,是啃净肉丝的猪腓骨制成的。家庭主妇挖取面粉的槽子,竟然也是剔净肉丝的猪肩胛骨(岷县人觉得它像一张铁锨,唤作锨板骨)充当的,有一巴掌大,呈三角形。农家人对废物利用得很恰当。

我们的老祖先山顶洞人已经懂得了磨制和钻孔技术,会制造骨针,将兽骨、兽牙钻孔,制成“项链”等装饰品。原始社会时期,为了提高挖土效率,人们将单尖木耒发展为刃部扁平的木耜,形状类似此后的铁铲。木耜的刃部在挖土时容易磨损,人们就把兽骨绑在木柄上,制成骨耜。岷地人挖面的槽子就是对骨耜功能的新运用。

打灯蛾与扑灯蛾

打灯蛾与扑灯蛾只有一字之差,应该是一种昆虫。但在广大的河湟、洮岷地区,它们是不同的动物。“打灯的蛾儿吃白菜/绿鹦哥要吃个米来/许多的人儿我不爱/一心要爱个你来”、“我维的‘花儿’是双辫子/打灯蛾儿的样子”(河湟花儿),“打灯蛾的绿翅膀/只要我在阳世上/阳世上/把你不到难处放”、“打灯蛾儿的黄翅膀/我黑个想你没瞌睡/手拿长香院里跪……”(洮岷花儿)。“打灯蛾儿”是河湟、洮岷地区人对蝴蝶的地域性称呼。在我所知道的岷县境内,人们把扑灯蛾叫做“偷面鬼”,状其行动鬼鬼祟祟,它那翅膀上抖落的粉末,是从面柜里偷来的。蝴蝶的大小、种类和颜

色可谓五彩缤纷,只在白天翩翩起舞,非漂亮、芳香的花卉不栖足,根本不在夜间活动。扑灯蛾即“偷面鬼”具有敏感的趋光性,于夜幕降临之后深入寻常百姓之家,扇动小而灰的翅膀,扇灭农家人的一豆灯光,即成语飞蛾扑火。如今,无论城乡居民,全都使用白炽灯、节能灯照明,没有了“偷面鬼”搞恶作剧的烦恼。

牛鼻套

《西游记》第五十二回里,太上老君的青牛偷下凡,给唐僧师徒带来了麻烦,最后被老君降服,给金刚琢吹了口仙气,穿了青牛的鼻子,“解下勒袍带,系于琢上牵在手中。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拘儿……”吴承恩借用神话故事解释了牛鼻环的由来。

早在商朝时期,牛马除了祭祀食用外,还用于驾车。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得到推广。陕西米脂县出土了东汉牛耕画像石,图中的两头牛牵引一犁在耕地,掌犁人可以一手扶犁,一手扬鞭驱牛,还可以通过牵引牛鼻环来控制耕牛。牛鼻环的出现,不会迟于这一时期。

“黄河沿上牛吃水,鼻套哈敬不者水里;端起饭碗想起你,尕棋花挖不者嘴里。”(河湟花儿)套(juan):穿在牛鼻上的环。岷县人也称牛鼻环呼作牛鼻套。长到三岁的牛,就得给主人拉车犁地。主人为控制牛,就把湿树枝剥皮,用火烤弯,穿进牛鼻孔里扎成圆环,拴上麻绳,那耕牛就由掌犁人任意摆布。

吹口哨

我不光佩服歌唱家的金嗓子，还佩服有些人巧舌如簧的本领——吹口哨，将我们曾经喜欢的中外歌曲《童年》《红梅花儿开》吹出了耳熟能详的感觉。

明末清初诗人冯班写道：“隔岸吹唇日沸天……”（《有赠》）“吹唇”就是金人说的吹口哨，《南齐书·魏虏传》：“吹唇沸地。”《资治通鉴》注释道：“吹唇者，以齿啮唇作气吹之，其声如鹰隼。其下者，指夹胁吹之，然后有声，谓之啸指。”《诗经·国风·江有汜》：“不我过，其啸也歌。”啸是指撮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竹林七贤之一的阮步兵擅长吹口哨：“阮步兵（阮籍）啸闻数百步。”（《世说新语·栖逸》）

芳名叫娥的美女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李白《忆秦娥》）秦娥，泛指秦地的美女。扬雄《方言》卷二：“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娥是美女们取名的首选字眼，如嫦娥、娥皇等。嫦娥别称姮娥、素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李商隐诗句）。霜神青女和月中嫦娥不怕寒冷，在寒月冷霜中争妍斗俏，比一比冰清玉洁的美好姿容。从字面意思猜测，素娥就是素面朝天的美女。娥皇的传说见于任昉《述异记》：“舜南巡不返，没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竹悉为之斑斑然。”

娑罗树

土族花儿与洮岷花儿中经常出现名叫娑罗树的树种：“天上圆来什么圆？天上圆来月亮圆。梭罗罗树儿当中显，满天的星星扎一圈。”“月亮里头娑罗树，谁把人心估得住。”娑罗树是什么树？笔者以为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娑婆树。《红楼梦曲·虚花语》：“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娑婆，上结着长生果。”

娑婆：据传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其树枝叶娑婆。我国传说中也有娑婆树，但与西方佛教无关。乐史《太平寰宇记》：“日月石在夔州东乡，西北岸壁有二石，右类日，左类月，月中空隙有娑婆树一枝。”郭立诚在其著作《中国民俗史话》中写道：“中秋节用的月光馮……上面印着月宫、梭罗树和玉兔。”

蓝桥

天上有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鹊桥，人间也有情人约会的蓝桥。“蓝桥约，怅恨路隔。”（周邦彦《浪淘沙慢》）与佳人纵有蓝桥之约，却只能怅恨路途远隔。卫琪在《人间词话典评》中，对“蓝桥”作了注释：“蓝桥，蓝溪之桥，位于陕西蓝田县。唐代裴航科考落第后在此地遇仙女云英。后常以蓝桥喻指男女约会之处。比如黄梅戏《蓝桥会》，电影《魂断蓝桥》的翻译即来源于此。”黄梅戏《蓝桥会》里，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分别被演绎为魏奎元和蓝玉莲。蓝玉莲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多年的童养媳生活使她显得有些多愁善感。一天，她在蓝桥上汲水遇见年轻书生魏魁元，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彼此了解当年身世后，也互相表达了爱慕之心，并相约八月十五在蓝桥相会。

连襟的别称

《四角号码新词典》对连襟的解释是：姐妹的丈夫之间的亲戚关系。近读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知道山东人也有对连襟近似的叫法：一担挑。“法官用屈起的膝盖从背后顶了他一家伙，说：一担挑，大姐对得起你，你这样做太没良心啦！”“就像为了显示手段一样，‘一担挑’用铁砂掌在上官金童的脖颈上砍了一下子。这法官连襟是部队转业干部，当过十年侦察兵……”洮岷地区的人们，把姐妹之间的丈夫称呼为“挑担”，是“一担挑”的缩称。

妯娌的别称

《现代汉语小词典》如此解释妯娌：“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的合称。”岷县方言里，称妯娌为先后，念作 xuanhou。《尔雅·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郭璞注疏曰：“今相呼先后，或云妯娌。”妯娌的别称古已有之，但不知郭璞注疏的先后，是哪一地区的方言，读作什么。

促织

蒲松龄写了一篇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的短篇小说《促织》。故事发生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爱斗蟋蟀，地方官媚上邀宠，胥吏借端勒索，致使百姓倾家荡产。成名因为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官府的杖责，奄奄待毙。后来历尽艰辛，捕获一只蟋蟀，不幸又被儿子不小心弄死。儿子慑于成名的雷霆之怒，跳井自杀，其魂魄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人被毁灭的命运。这篇小说何以命名为《促织》呢？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词作《齐天乐·蟋蟀》序言中写道：“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促织就是中原人对蟋蟀的别称。卫琪在《人间词话典评》中解释了“促织”的由来：“思妇无眠，起寻机杼”，蟋蟀又名促织，想来古时很多女子都是伴着这一声声无眠的虫鸣织布纺纱，思念良人吧。促织这个名字当是由此而来。”

吞象之蛇

知道蛇能吞食麻雀、青蛙、耗子，乃至家鸡野禽，想想都是毛骨悚然的事情。俗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了一个蛇吞象的奇闻异事：“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巴蛇能吃掉大象，过三年才把象骨排泄出来，有德行的君子吃了巴蛇吐出的象骨头，便没有心腹疾病。巴蛇有青、黄、红、黑颜色的。

蝾螈

《说文解字》：蝾螈，虹也，从虫。《尔雅·释天》：“蝾螈谓之雩。蝾螈，虹也。”晋代郭璞注疏曰：“俗名为美人虹，江东呼雩”。蝾螈也写作蝮螈，见于《诗经·邶风·蝮螈》：“蝮螈在东，莫之敢指。”倘若按照郭璞的注疏，“莫之敢指”就是不可对“美女”指手画脚。民俗专家郭立诚在民俗专著《中国民俗史话》中写道：“比如俗忌不可指雨后天边的彩虹，若是没有忘掉读过的诗经，就会明白这不就是‘蝮螈在东，莫之敢指’吗？只是古人没有讲指点彩虹会烂手指头而已。”在西北老百姓眼里，蛇是小龙，蚯蚓是地龙，彩虹也是一种彩色的龙。岷县方言里，将虹读作 gang，认为雨过天晴后东方天空出现的彩虹，是有两个头的龙，在吸泉水。大人教育孩子们，不能对虹指指点点，否则手指头会肿胀成蟠指，或者指甲缝里，会长出“蛇眼”，疼痛非常，最后会溃烂掉。“莫之敢指”是一种民间禁忌，体现了古人的图腾崇拜。

(作者单位：岷县二中)



《酒泉华夏文明概论》出版发行

近日,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都伟撰写前言,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史志办主任孙占鳌主编的《酒泉华夏文明概论》,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酒泉华夏文明概论》将酒泉华夏文明的主要形态、特征作了总体论述。该书涵盖了酒泉的史前文化、简牍文化、敦煌遗书、石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长城文化、五凉文化、魏晋墓画艺术、边塞文化、民族文化、书法艺术、航天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内容,13章,近35万字。

《酒泉华夏文明概论》是一部开拓创新的著作,该书将酒泉华夏文明的诸多问题从宏观、微观、史学角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梳理和理论性的阐述与探索。本书理论为先,深度挖掘;资料翔实,突出特色;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是一部较为成功的关于酒泉华夏文明的著作。其出版发行,对展示博大精深的酒泉历史文化,推动酒泉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接下页)

五、启动乡镇志、部门行业志编纂

金塔县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行业志编纂的通知》(县委办发[2007]12号)、《关于做好乡镇(城市社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金政办发[2013]8号)等系列文件,行业志编纂工作进展有序。至目前,《人大志》、《政协志》、《军事志》、《公安志》、《法院志》、《农业志》等13部行业志已出版发行。其中《政协志》荣获甘肃省第九届优秀史志成果二等奖。有21个部门和单位编纂的行业志现已进入终审和出版发行阶段。

六、重视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

近年来,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职工在《中国地方志》、《甘肃史志》、《民主协商报》、《酒泉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史类作品26篇。其中:《荒漠戈壁绿意浓》荣获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与新农村建设”有奖征文二等奖。2013年8月,金塔县地方史志办与县文体局、文物局等单位联合筹办举行了“中国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

国际学术研讨会”,22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七、创办了金塔地情信息网站

2013年,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本着“创精品、重服务”的原则,于10月1日开通了金塔县地情信息网。网站设金塔概况、建制沿革、史海拾贝、地名溯源、志鉴园地、业务论坛、印象金塔等18个窗口栏目,收录文字资料360多万字,照片530余幅,实现了地方文史资料数字化。

八、建成了金塔县方志馆和地情资料库

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多方筹措资金56万元,维修房屋220平方米,建成了金塔县方志馆和地情资料库,方志馆设地情资料库、自然地理环境、县域名篇、历史文化、农耕文化、文史展览等6个展室,通过购置、交换、征集等方式添置图书3600多册,征集展出图片660幅。2013年10月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金塔县地方史志工作稳步推进



近年来,金塔县认真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重视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和完善修志体制,强化史志队伍的培训工作,以多出作品、多创精品为目标,严把作品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编校关、印刷关。至2013年底,先后整理校注出版旧志书3部;编纂出版《金塔县志》(1990年—2008年)1部;编纂出版《金塔年鉴》2部;编纂出版《居延逸史》等地情资料丛书6部,编印了《金塔人大志》、《金塔政协志》、《金塔县军事志》、《金塔县农牧志》等23部门行业志。在《中国地方志》、《民主协商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3篇。开通了金塔县地情信息网,实现了地方文史资料数字化。建成了金塔县地情资料库,藏书量达6600余册,电子文本1200多件,免费向社会开放。

一、《金塔县志》(1990—2008)出版发行

《金塔县志》(1990—2008年)采用记述性语体文,编、章、节、目结合体编纂。凡25编、138章、466节,表述以事分类,横排纵述,以志为主。随文插入特载10篇、专记12篇、图75幅、表201份、照2008张。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独立成篇。标题中文、英文对译。卷末置索引。2009年5月完成初审,2009年10月完成复审,2010年6月完成终审,2010年8月酒泉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发行。2011年2月,荣获甘肃省第八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1月被酒泉市人民政府授予“酒泉市社会科学二等奖”

二、出版发行《金塔年鉴》2部

《金塔年鉴》按照“提高编纂质量,完善体例结构,增加信息量,增强可读性”的编辑要求,设特载、大事记、政党政权、群众团体、经济管理等20个栏目,图文并茂,全书约50万字。首部《金塔年鉴》(2009—2011卷)于2012年出版发行。《金塔年鉴》(2013卷)已正式出版发行。

三、整理出版旧志书3部

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完成了《创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新编鼎新县志》(1945年手抄本)、《酒泉市志》(1961年刻写本)等3部地方旧志整理出版工作,使濒临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利用。

四、编纂出版金塔地情丛书6部

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金塔县地方史志办高度重视地情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地情资料征集制度,多渠道,多途径、多方位地广泛收集与整理具有存史价值的各类地情信息和资料。至2013年年底,已正式编纂出版《金塔诗苑》等地情资料丛书6部。其中:《金塔史话》荣获“甘肃省第六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居延逸史》荣获“甘肃省第七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中共酒泉市委授予“酒泉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金塔历史文化瑰宝》分《地名史话卷》、《工业史话卷》、《文苑史话卷》3卷编纂。荣获“甘肃省第九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下转上页)

瓜州县启动地情信息网建设工作

根据 2014 年全市地方史志工作安排,瓜州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早动手、早筹划,春节过后上班就立即着手建设瓜州地情信息网站。现已拟定网站建设方案,包括设备购置、域名申请、栏目设置和各栏目具体内容。力争六月份开通运行。瓜州地情信息网拟设 12 个栏目:

1. 政区概况—政区名称来历简称、地理位置、政府驻地、政区沿革、政区划分、人口面积、民族构成等。

2. 史志工作—工作动态、志鉴书苑、业务知识、实践思考、历史研究等。

3. 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矿藏及其他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等。

4. 县域经济—农业、工业、商贸、财政、金融、现代物流等。

5. 社会发展—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

6. 基础设施—水利、电力、能源、公路、铁

路、运输、邮电、通信等。

7. 名胜旅游—旅游业概况、风土人情、土特产品、主要风景区、重点名胜古迹、玄奘之路体验之旅。

8. 历史回眸—重大事件、重大举措、重要行政、友好交往等。

9. 人文荟萃—历史人物、轶闻传说、领导情怀、历任领导、县外领导。

10. 市政建设—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给排水、供电、供热、燃气、园林绿化等。

11. 乡镇概览—渊泉镇、柳园镇、三道沟镇、南岔镇、锁阳城镇、河东乡、布隆吉乡、西湖乡、瓜州乡、腰站子东乡族乡、七墩回族东乡族乡、双塔乡、广至藏族乡、沙河回族乡、梁湖乡。

12. 图载瓜州—标志建筑、名胜古迹、文物珍藏、生产场景等。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成立



2014年4月28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与酒泉市委、市政府在酒泉国际会展中心联合举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成立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由市委副书记朱涛主持。仪式上,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智文、酒泉市政府副市长柴绍豪代表双方共同签署了共建协议。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福生,中共酒泉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都伟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揭牌。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智文宣读了中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关于

酒泉分院顾问、名誉院长、院长的任命决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范鹏被聘为省社科院党委酒泉分院顾问,省社科院副院长朱智文、酒泉市副市长柴绍豪任名誉院长、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孙占鳌任院长。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福生,中共酒泉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都伟做了重要讲话。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的成立,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与酒泉市友好合作的结晶,是酒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推动酒泉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将产生重要作用。

2013年甘肃地方志工作十件大事

一、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召开。3月28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在兰州市西北宾馆召开。会议总结了过去两年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研究部署了2013年的主要工作和今后一个阶段的目标任务。省上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政府分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和修志机构的负责人150多人参加会议。

二、省政府同各市州政府签订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3月28日，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广智与全省14个市州政府分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签订了《2013—2015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这是我省地方史志工作首次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三、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4月1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甘政发[2013]31号），就进一步加强全省地方志工作向各市州、省直部门提出具体要求。

四、中指组领导来甘调研指导工作。6月25—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一行来甘，深入兰州、庆阳、天水等地调研指导工作。

五、甘肃省领导首次出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12月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关于组成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通知》（中指组字[2013]2号），甘肃省副省长张广智同志代表西北地区出任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这是我省分管领导首次出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六、甘肃省地方史志网站开通。8月1日，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建立的甘肃省地方史志网站开通试运行。网址是www.gsdfszyw.com。

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首次举办全省年鉴业务培训班。5月21—24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在天水市举办全省年鉴编辑业务培训班。省直部门、各市（州）县（市、区）年鉴主编、编辑人员及《甘肃年鉴》供稿人160余人参加培训。这是省史志办首次举办年鉴业务培训班。

八、省政府对市州地方志工作进行目标考核。按照省政府领导的指示，12月下旬，由省史志办牵头、省政府办公厅参加，对14个市、州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和《2013—2015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完成情况进行了考核，兰州市、酒泉市、白银市、天水市、庆阳市等5市获得优秀等次。

九、《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完成初稿。12月，由省地方史志办组织编纂的《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完成初稿。该志共8编、约120万字，计划2015年出版发行。

十、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完成《中国方志百科全书》甘肃辞条编写。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担任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共同编纂的《中国方志百科全书》甘肃条目撰稿人，到2013年底完成辞条5万余字、30多幅图片的编纂工作。

甘肃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秦理斌
为《甘肃史志》题词

為國修志求精
讀史作文鑒古通今

壬辰之冬 秦理斌

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文
實一家之主

為甘肅史志題 秦理斌